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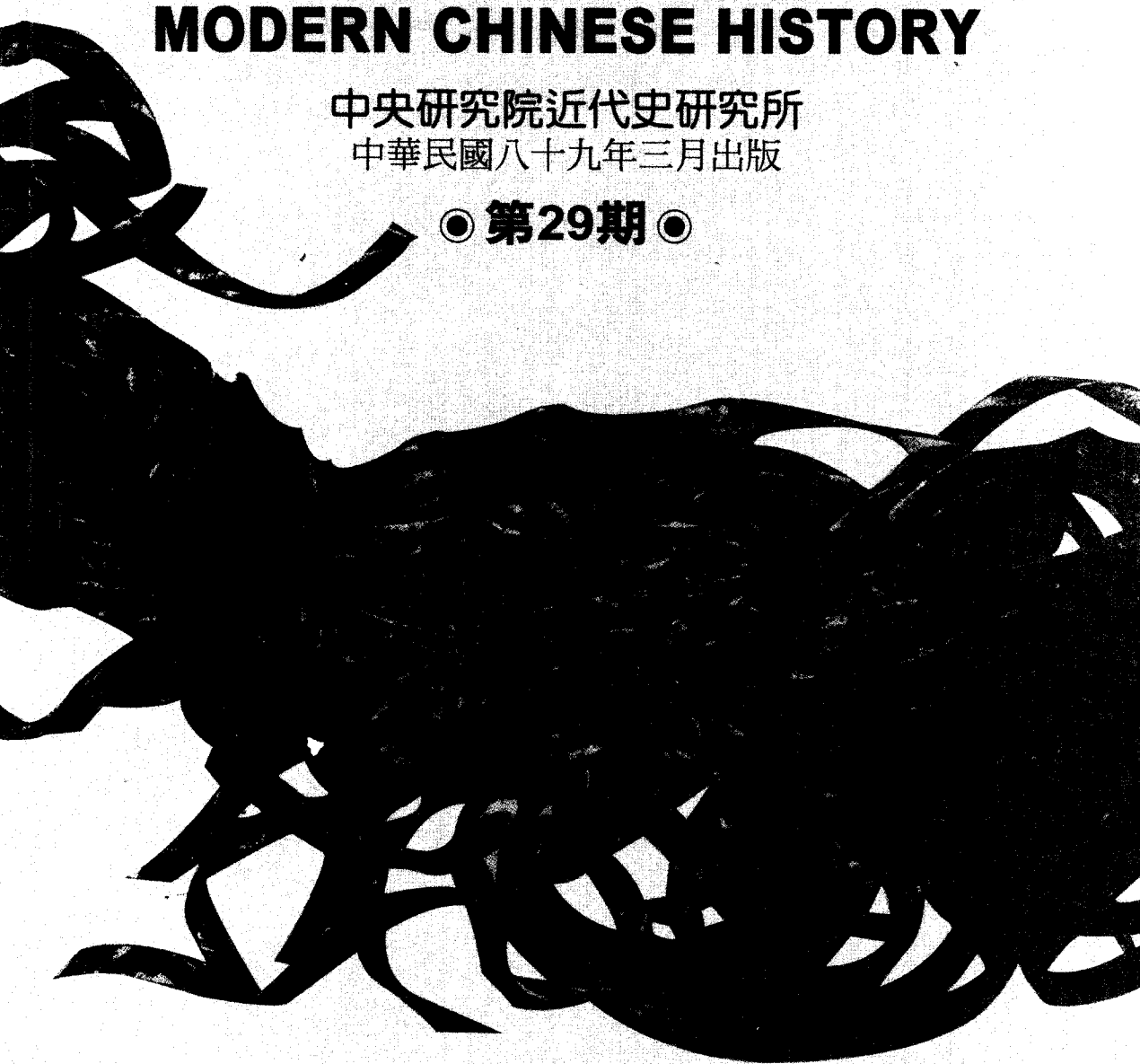
ISSN 1016-056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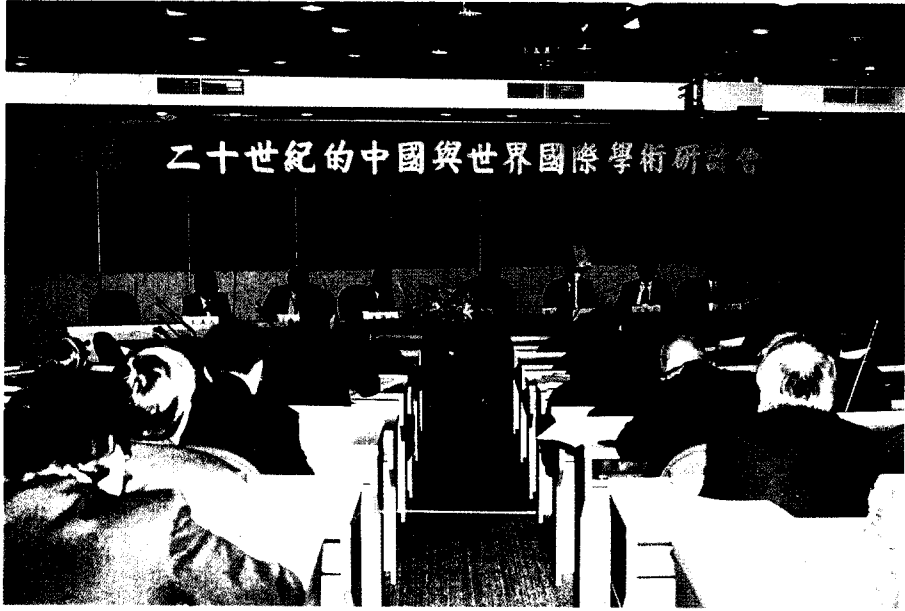
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

NEWSLETTER FOR
MODERN CHINESE HISTORY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三月出版

◎ 第29期 ◎





「二十世紀的中國與世界」國際學術研討會會場一景



部分中外學者合影

前排左起：R. Rogaski、李又寧、呂芳上、熊秉真、平野健一郎；
後排左起：張寧、江淑玲、K. Mühlhahn、石井明、茅海建、王永祥、
S. Cochran、R. Bickers、J. Fogel、洪長泰、陳三井、張啟雄

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 目錄 第二十九期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三月出版

學術會議	「二十世紀的中國與世界」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報導	
張寧	1
	「一九四九年：中國的關鍵年代學術討論會」會議紀要	
張世瑛	9
	「第六屆中日關係」國際學術研討會.....李恩涵	17
學術演講	退休茶話：把酒話桑麻.....陶英惠	23
學人簡介	李恩涵.....李仕德·周琇環	32
	魏宏運.....江沛	47
研究概況	琉中關係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赤嶺守	57
	「南開大學周恩來研究中心」簡介.....王永祥	66
	「蔣介石先生與日本」研究計畫.....黃自進	68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進行之專案研究計畫.....	
江淑玲	75
學思之旅	平津「取經」行紀聞.....陳三井	86
史料介紹	訪陶英惠先生談中央研究院院史室資料的徵集.....蔡淑瑄	92
新書評介	《二戰期間在日中國勞工問題研究》.....陳鵬仁	102
	《滿族的婦女生活與婚姻制度研究》.....賴惠敏	108
	《陳炯明與聯省自治運動》.....張世瑛	113
	《晚清七十年》.....洪健榮·范純武·吳美鳳	118
	《晚清經濟政策與改革措施》.....趙建國	130
大事紀要	近代中國史研究大事紀要(1999.10-2000.3).....蕭郁雯	135

封面設計：黃憲鐘

□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編輯委員會□

主任委員 呂芳上

編輯委員 陳三井 張啓雄 李恩涵 魏秀梅
張瑞德 黃自進 張秋雯

執行編輯 陳三井

助理編輯 蕭郁雯

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_{半年刊} 第29期

編輯者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編輯委員會

發行者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中華民國台北市南港區

電話：27824166

郵撥帳號1034172-5

印刷者 文芳印刷事務有限公司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三月出版

定價 新台幣 100 元



學術會議

「二十世紀的中國與世界」 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報導

張寧*

時值揮別舊世紀邁入新世紀之際，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為檢討過去、策勵將來，於公元 2000 年 1 月 6-8 日舉辦「二十世紀的中國與世界」國際學術研討會，邀請中外學者 200 餘人參加。希望從政治、外交、經濟、社會、教育、文化、思想的角度，廣泛省察二十世紀中國與世界的互動關係，並審視相關的研究理論與研究方法，作為邁向二十一世紀的參考。

本次研討會於中央研究院學術活動中心一連舉行 3 天，計有 30 篇論文發表，主要議題包括：理論的檢討與創新、民族主義與帝國主義、近代國家的形成、中外的互相認識、大眾文化、世界宗教與二十世紀中國、外國勢力在中國、留學生與近代中國、世界與台海兩岸等（參見文末附表）。

歷史學家在分析史實時，常必須創造或借用理論，以便有意義地解釋過去、展望未來。「二十世紀的中國與世界」第一、二場報告便以宏觀理論的探討為首要議題。日本早稻田大學教授平野健一郎指出，二十世紀中國與日本分走民族國家與帝國主義國家兩個不同的方向，以致結果完全不同。從國際關係的發展趨勢來看，未來國際關係將不只是國家與國家間的互動，而是不同實體在不同層面的多樣活動。中國由多元種族、語言、文化所構成，又素有海外移民的傳統，在未來發展上，有許多地方值得日本借鏡。美國衛斯理學院教授 Paul A. Cohen 討論十九世紀以來中西知識交流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

不平衡的現象，強調無論在文化、技術、知識等各層面，中國一直不斷學習、吸收西方，而西方則只想瞭解中國，卻無意向中國學習。

有別於強調全球化過程，第二場報告指向史家研究二十世紀，必需留意區域化或地方化的現象。美國杜克大學(Duke University)教授 Arif Dirlik 利用延安時期毛澤東提倡馬克斯主義中國化，及 1980 年代台灣、香港、新加坡、中國大陸等地華人社會推動社會學中國化兩個實例比較分析，討論這些宣稱具普遍適用價值的西方社會、政治理論，在傳進中國以後，如何與中國自身的文化認同產生激烈衝突；並進一步質疑理論、歷史與文化這些大家習以為常的概念。日本東京大學教授濱下武志進一步挑戰史家考查問題時的思考框架，他藉探討十八至十九世紀亞洲地區華人的商業貿易網絡，指出在思考中國與世界的關係時，海洋的作用其實要比陸地來得大。透過海洋和由朝貢體制發展出的商貿、金融網絡，亞洲海域內不同的種族、文化得以串連在一起，形成原先以陸地為主體的國家概念所無法概括的空間。

理論之外，民族主義與帝國主義是貫穿中國現代史的重要議題。中研院近史所兼任研究員李國祁首先在主題講演中縱論帝國主義、民族主義與共產主義對二十世紀中國，乃至台灣的影響，為議題提出宏觀架構。在微觀部份，中研院近史所兼任研究員呂實強探討五四運動的本質，主張「五四」為 1919 年巴黎和會衝擊下的一項愛國運動，而非今日史家所著眼的新文化運動；中研院近史所兼任研究員張存武探討中國在積弱時期與英、俄、美、日等列強的合縱連橫；日本東京大學教授石井明以十九、二十世紀之交的日本政論家樽井藤吉為案例，探討當時日本知識、外交界為對抗歐美勢力，期望號召亞洲各民族團結合作的心情與論理，實現主張的第一步是以日韓合邦為基礎逐步展開。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東亞學系教授周質平則探討胡適晚年的反共思想，以及在思想背後文化上的民族主義。

在近代國家的形成方面，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 Ruth Rogaski 探討冷戰初期，中共如何巧妙運用公共衛生議題，指稱美國使用細菌戰，首次成功動員所有各階層人民。她指出，長久以來被大家視為一場鬧劇的愛國衛生運動，其手法實為順天而應人，其滲透範圍不但比學者關注已久的三反、五反等高壓鎮反運動遠為廣泛，而且貫徹的效果也更為徹

底。中研院近史所助研究員林美莉探討近代中國官方與民間引介直接稅制的過程，認為與外國施加軍事與經濟壓力密不可分。中研院近史所研究員朱宏源從制度運作層面，探討二十世紀中國的政治結構，指出由專制獨裁到訓政民主的結構性原因。南開大學歷史系教授王永祥探討蘇聯式政體模式對中國政體變遷的影響，他以孫中山後期「以俄為師」的政體設計，及「紅色政權」區域的政體為例，指出二十世紀中國政體變遷主要是本土化與「外化」交互作用的結果。

中外的互相認識係探討中國與世界的重要課題。中研院近史所研究員陳三井旁徵博引，分析晚清知識份子藉他人著作或依親身體驗，形成對法國、法國人，以及法國大革命的認識與看法。中興大學歷史系教授唐啓華進一步利用外交檔案，分析歐戰結束後，中德雙方簽訂平等新約的過程與結果。除傳統的素材與關注點外，這一場中外互相認識的報告，有不少令人欣喜的嘗試，譬如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茅海建利用帝王教科書中的《外交講義》，分析晚清中國對世界的認識；中研院近史所研究員張瑞德藉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倫敦所流傳明信片的圖像分析，探討當時西方社會的中國觀；英國 Bristol 大學歷史學系講師 Robert Bickers 藉分析上海租界工部局交響樂團的歷史，探討此樂團在引進、傳播西洋古典音樂方面所扮演的角色。

在中外互相認識方面可看出研究素材的轉變，在大眾文化部份則可看出史家關懷點由上層往下層發展。中共取得政權後，以扭秧歌來慶祝新生，以清明追悼烈士，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教授洪長泰檢視這兩項生與死的慶典，分析中共如何藉此建立與鞏固政權。美國康乃爾大學歷史系教授 Sherman Cochran 藉清末民初五洲大藥房自製自銷西藥的案例，說明二十世紀消費文化除由跨國公司由上而下強勢推銷，及本地消費者擁有最後決定權外，尚有兼具兩者性質的第三種類型。中研院史語所副研究員李孝悌則以二十世紀上半葉上海和西安的改革戲曲為例，說明在一個現代化社會中，傳統戲曲如何因應時代的變局，用不同方式來取悅並教育觀眾。

在第十場外國勢力在中國部份，美國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歷史系教授 Joshua A. Fogel 探討日本居留民團在上海租界的生活實況，並涉及日本政府對華政策及當時整體國際社會的變遷。德國柏林自由大學助理教授

Klaus Mühlhahn 討論德國在青島地區的統治，當地中國居民的反抗，及德國人與中國人之間的互動。他指出，殖民統治並非由統治者所發出的單行道，相反的，被統治者經常能以不同方式迫使統治者修正政策，雙方因此形成互動關係。

宗教絕對是探討二十世紀中國不可或缺的議題。中研院史語所研究員宋光宇以中國人宗教活動的三個主要功能「普濟」、「普渡」和「普覺」為基準，檢視基督教、天主教及佛教在中國的興衰。中正大學歷史系教授王成勉接著探討 1920 年代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的困境。協進會係在華基督教會界企圖統合力量與資源的重要嘗試，因反基督教運動及各教派間爭執，未盡其功。華中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教授章開沅的論文由評論人呂實強教授代為宣讀，章開沅從教會大學歷史的視角，縱論二十世紀中國基督教與世局變遷的關係，文中述及 1949 年後中國大陸的三自愛國運動，以及改革開放以來「三自」教會的反省與改進，為「世界宗教與二十世紀中國」議題做了重要補充。

留學生是中國現代化的重要表徵，中研院院士、近史所研究員張玉法檢視 50 位 1890 年代至 1940 年代的留美學生，利用其回憶錄、日記及留美時期著作，探討其留美期間經歷與見聞，及返國後對事業的影響。美國聖約翰大學亞洲研究所教授李又寧探討 1935 至 1936 年間，留美中國學生對日本侵華反應，強調留學生與華僑研究對中國近代史的重要性。

台海兩岸是目前熱門話題之一，中研院近史所研究員張啓雄以二次大戰後亞洲開發銀行席位爭奪為例，分析海峽兩岸在名分秩序上的輿論攻防戰。所謂名不正，言不順，在「一正一偽」概念下，張啓雄預言，進入新世紀後，兩岸在國際政局激盪下，是合是戰？是分是合？「名分秩序論」仍將扮演關鍵性角色。台灣大學政治系教授石之瑜討論兩岸關係中的論述風格與論述策略。過去認為兩岸在認知上雖有衝突，但論述風格沒有差距，石之瑜則主張，兩岸其實流露出相當歧異的論述風格，引發認知上的衝突，它在情感上所造成的不安，未必亞於統、獨之間的對立。中研院近史所研究員陳慈玉跳脫兩岸關係，分析 1949 至 1985 年山西煤業與世界市場。山西是大陸最重要的煤炭工業基地，產量關係著中國煤業的發展面貌，及亞洲煤炭市場的興隆。1978 年以前，以提供國內需求為主，1978 年改革開放

以後，以日本爲主的外資投入中國煤業，使煤炭成爲中國鄉鎮企業創匯的重點商品。

研討會最後由中研院近史所所長呂芳上主持，Sherman Cochran、洪長泰及近史所副所長熊秉真引言，進行綜合討論。呂芳上首先指出，過去三天的討論看出二十世紀中國的研究已出現新的起點，其中包括對國際城市內外國社群的研究、影像史學的提出、對通俗文化的關懷，以及全球化過程的探討等。熊秉真進一步補充，在關心點方面，除政治、經濟外，開始有學者留心宗教、醫藥衛生、音樂；在方法上，也開始利用人類學、建築、藝術來討論商業和消費文化；幾乎所有的論文均嘗試以宏觀的理論結合微觀細節的檢視，令人欣喜。

引言人 Sherman Cochran 並提出所觀察到的兩個矛盾特點，有些論文對民族主義的角色持質疑態度，有些則直接或間接持肯定態度，因此民族主義在過去一百年的重要性究竟爲何，值得深入討論。另外在二十世紀中國是否更融入世界、變得更世界性，有些論文持肯定態度，有些論文似乎指向負面。洪長泰提出會議中涵蓋性較強的議題—政治與文化的關係，縱論呂實強、章開沅、茅海建、Robert Bickers、張瑞德、李孝悌等人論文中所涵蓋的意涵。平野健一郎在綜合討論中提出，理論與歷史的關係實爲貫穿二十世紀中國與世界的主题，史學家如何利用理論來瞭解歷史，展望未來，值得學者深思。Klaus Mühlhahn 指出，此次會議有許多議題未能被納入，譬如二十世紀下半葉新興科技如報紙、電視、傳播媒體的影響，中國大陸在 1950、60 年代與東歐的關係，以及對全球化科技如網際網路的角色等，有待學者進一步開發。研討會便在熱烈討論下閉幕。附會議議程表如下：

主 持 人	主 講 人	論 文 題 目
張玉法	Kenichiro Hirano (平野健一郎)	Meanings of Twentieth Century China fo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for Japan
	Paul A. Cohen	The Asymmetry in Intellectual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Kenichiro Hirano	Arif Dirlik	Theory, History, Culture : Cultural Identity and the Politics of Theory in Twentieth Century China.
	Takeshi Hamashita (濱下武志)	Overseas Chinese Networks in Asian Historical Regional System, 1700-1900
梁其姿	Ruth Rogaski	Germans and the Reach of the Modern State : Tianjin, 1949-1953
	林 美 莉	近代中國對直接稅制度的引介與認識，1896-1937
蔣永敬	朱 宏 源	從專制獨裁到訓政民主：二十世紀中國的政治結構
	王 永 祥	蘇聯式政體模式與近代中國政體變遷
周質平	張 玉 法	二十世紀前半期中國留美學生的經歷與見聞
	李 又 寧	一九三五至一九三六年間在美國就學的中國學生

主持人	主講人	論文題目
Ishii Akira (石井明)	張啓雄	戰後海峽兩岸的名分秩序論—亞洲開發銀行席位的熊熊戰火
	石之瑜	話不投機半句多：兩岸關係中的論述風格與論述策略
	陳慈玉	山西煤業與世界市場，1949-1985
陳鵬仁	呂實強	巴黎和會衝擊下國人的反應(1919)—兼論五四運動的本質
	石井明	亞洲主義者的「地域合作論」—以樽井藤吉等的著作為線索的考察
朱重聖	張存武	弱國中華與世界
	周質平	胡適的反共思想
李東華	宋光宇	二十世紀中國與世界宗教互動之回顧與展望
	王成勉	「同心合意」宣教難嗎？—論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在一九二〇年代的困境
	章開沅	世局變遷與宗教發展—以教會大學史研究為視角
周惠民	Joshua A. Fogel	“Shanghai-Japan” : the Japanese Residents Association of Shanghai
	Klaus Mühlhahn	Power and Resistance in Qingdao – Interactions between Germany and China, 1897-1914

主持人	主 講 人	論 文 題 目
張哲郎	陳 三 井	晚清知識份子法國觀的考察
	唐 啓 華	歐戰後德國對中國戰事賠償問題之初步研究
	茅 海 建	清末帝王教科書：中國第一歷史館所藏《講義》述論—以周自齊及其《外交講義》為中心
吳文星	張 瑞 德	想像中國—倫敦所見古董明信片的圖像分析
	Robert Bickers	“The Greatest Cultural Asset East of Suez”: the History and Politics of the Shanghai Municipal Orchestra and Public Band, 1881-1946
Paul A. Cohen	洪 長 泰	生與死的節日：中共的通俗政治文化
	Sherman Cochran	Chinese Agents of Consumer Culture: Five Continents Drug Stores, 1906-1937
	李 孝 悌	中國近代大眾文化中的娛樂與啓蒙—以改良戲曲為例



學術會議

「一九四九年：中國的關鍵年代 學術討論會」會議紀要

張世瑛*

今（1999）年對於海峽兩岸來說，都是一個別具意義的年代，此刻的中國大陸，正在熱烈舉行建國五十週年的盛大慶祝活動；對於臺灣而言，這一年也是中央政府播遷來臺，屆滿五十週年的日子。中國近代史學會有鑑於此，特別在12月9、10日兩天，假中央研究院學術活動中心，舉行「一九四九年：中國的關鍵年代學術討論會」。

這次的討論會共計發表二十五篇論文，從海峽兩岸、日本、歐洲來的學者齊聚一堂，討論的焦點從抗戰勝利的國共關係、戰後四年國內的經濟、社會問題，到1949年後國民政府在臺灣的建設等，若干篇論文甚至觸及到在過去的歷史書寫裡，屬於空白的一頁，以下是各篇論文的主題及摘要。

一、勝利後國民政府的內政問題

山本真教授（日本明海大學講師）的〈1940年代國民政府統治下的縣市參議會—以四川省之例為中心〉，以1940年代，國民政府最重要的控制區域—四川省為取樣對象，討論地方行政制度，特別是基層縣、市參議會的實施狀況。作者指出北伐統一全國後，依照孫中山的遺教，本應以縣為自治的單位，設置縣級民意機關，但實際上南京時期並未成立縣參議會，

*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生

一直要到抗戰爆發後，國府推行新縣制，規定設置縣級參議會，才在國府統治區內，有了地方民意機構的出現，其中推行情況最普遍的就是以四川省爲主的西南各省。

根據作者的分析，國府設立縣參議會的動機，其實是爲了要獲得地方上的支持，參議會的決議權雖然受到限制，但以成都市的例子來看，縣政府對參議會的提案，在可能的範圍內，都盡量的依照提案來執行，可以說參議會在具體的行政工作上，發揮了一定的影響力。然而，由於縣參議員是從鄉鎮民代中選出的，雖然縣參議會對縣政的監督、反映地方對縣政的要求，都有一定的貢獻，但選舉的過程卻也助長地方派系在政治上的對立，成爲擾亂地方安定的潛在因素。

世川裕史（東京都立短期大學副教授）的〈戰後國民政府的地稅行政和地域社會—圍繞地稅負擔展開的請願活動〉，探討戰後國府統治區域內，地方上抗議苛捐雜稅與呼籲平均地稅負擔的各種請願活動，這些請願活動泰半是由縣市參議會的代表所組成，他們主要的訴求是希望降低戰時過重的地稅負擔，解除戰時的經濟統制；然而，國共內戰的全面展開，國府爲了應付龐大的軍費開支，仍然繼續實行田賦征實及征借糧食等措施，造成地方上的民怨沸騰，其結果是嚴重損害了基層的行政執行能力，與抗戰時期相比，政府所能徵收到的地稅，呈現大幅度的下降，這顯示國民政府的統治基礎，在內戰的惡性循環下已經瀕臨瓦解邊緣。

二、戰後國府的接收與復員

陳立文（文化大學史學系副教授）的〈從東北接收檢討戰時國府對接收東北之規劃與部署—以黨務組織與工作發展爲例〉，本文大量參考國史館藏大溪檔案、黨史會藏東北特檔及國防最高委員會檔案、近史所藏朱家驊檔案及大陸第二歷史檔案館、瀋陽檔案館、吉林檔案館等珍貴史料，耙梳出戰後國民黨派入東北的黨務組織及人員的一頁史實。作者指出國民黨在戰後雖有心重振東北黨務工作，但由於國民政府僅能控制南滿的城市地區，在心態上又對東北地方人士多所猜忌，以致讓派系的傾軋，嚴重打擊了黨務工作的推展。

林美莉（中研院近史所助研究員）的〈抗戰勝利後國民政府處理日偽政權貨幣問題—以中儲券的收兌工作為例〉，作者指出國府早在抗戰中期即針對收復淪陷區問題預作規劃，決定在戰後偽政權貨幣禁止使用，並由政府指定兌換機關以最低比率限期收兌。由於國府將收兌偽政權貨幣定為內政問題，必須自籌收兌資金，無法向戰敗的日本取償，而戰後吃緊的財政壓力，使得國府決定接收偽政權銀行資產加以變賣後，轉交國庫以增加收入，另一方面儘量壓低收兌比價以減輕支出。作者認為國府二百比一的收兌標準，實有其現實的財政需要，但民間輿論則攻擊國府的做法，以犧牲人民的利益來換取政府的財政收入，使得勝利後經濟接收的開頭措施就已盡失人心。

劉熙明（淡江大學歷史系兼任副教授）的〈戰後國民政府整編偽軍對國共內戰的影響〉，探討戰後國府如何處置偽軍，偽軍歸向對國共軍事力量消長的影響及偽軍在內戰中扮演的角色。作者認為勝利後國府收編了絕大多數的偽軍，並在「汰弱留強」的整編原則下，將若干戰力薄弱的偽軍加以裁編；過去在國軍內部的檢討中，多將裁編偽軍的失當，造成這些被裁編的偽軍投向中共，視為國府在大陸失敗的因素。然而，國府在收編偽軍的做法上，其實是極有彈性，也有強化中央軍戰力的作用，因此，國軍在內戰中的失敗，與偽軍是否投共，並沒有必然的關係，偽軍也不具有關鍵性的角色。

羅久蓉（中研院近史所副研究員）的〈特工組織與戰後漢奸審判〉，探討戰後國府重用軍統人員參與肅奸工作，雖然在調查及逮捕方面發揮了一定功效，但也造成濫權及腐化的弊病，其影響至少有三方面：1.破壞制度，2.公私不分，3.忠奸漫無標準。而在戰後中國政治生態環境中，特工介入懲奸工作，衝擊了正常的司法制度，甚至破壞法紀與政府威信，除了有形的傷害外，更大的負面效應是造成人民對政府的失望與喪失信心。

三、戰後的民主化運動

林能士（政治大學歷史系教授）、王良卿（政治大學歷史系博士生）的〈戰後國民黨人爭取黨內民主化的背景考察〉，探討抗戰勝利後國民黨

內的CC系聯合右翼的黃復青勢力，以民主化為訴求，發動黨政革新運動，而黨內民主化的聲浪，在1946年3月的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的中常委選舉中，達到了最高峰。然而，弔詭的是，戰後國民黨的困局，迫使黨內革新勢力試圖以民主化來挽救黨的生存，卻也是國共戰爭摧毀了黨內微弱的民主呼聲，在蔣中正以「統一意志、集中力量」的口號來進行剿共戰事後，黨內的民主化運動也隨之走上尾聲。

吳淑鳳（國史館助修）的〈走不出的『第三條道路』——以《觀察》周刊撰稿群對戰後中國出路的探索為例〉，以戰後標舉自由主義精神的《觀察》周刊為對象，探討《觀察》撰稿群在政治協商會議失敗後，國共走向全面戰爭下，對戰後中國出路的看法，作者共歸納出四種提議：1. 中國不做美國反蘇基地，2. 中間派領導的不流血革命，3. 聯立之路，4. 民主國際。然而這幾條道路在戰後中國的政治環境，幾乎是滯礙難行，由於自由派人士在政治上沒有自己的力量，在國共早已兵戎相見的情況下，他們只能求助於美國的善意回應，這也註定戰後的中國是無法走出第三條道路。

四、戰後國共的軍事衝突

三好章（日本愛知大學現代中國學部助教授）的〈試論新四軍的東北調動〉，探討抗戰勝利後，新四軍第三師在師長黃克誠的指揮下，從蘇北調動到東北的經過。張玉法（中央研究院院士）的〈國共戰爭在山東的一幕：青島之守備及撤退（1945-1949）〉，以戰後國共在山東青島的衝突為焦點，由於青島是華北戰場重要的後勤補給站，美國西太平洋艦隊司令也駐於此；國共戰爭初期，共軍對青島僅作騷擾式的攻擊，但在國軍於山東及華北戰場全面失利後，蔣中正即主張將青島的兵力撤退到東南沿海，由於撤退的準備相當周全，使得絕大多數的部隊及物資皆得以安全撤離。

高純淑（中國國民黨黨史會專門委員）的〈胡宗南與東南沿海作戰——以《胡宗南日記》為中心的探討〉，以民國41年1月至42年7月的《胡宗南日記》為材料，敘述胡宗南受命前往大陳成立浙江反共救國軍總指揮部、編組游擊部隊、創辦訓練工作、反攻突擊行動的經過，以及最後裁撤的內情。西村成雄（日本大阪外國語大學教授）的〈戰後中國兩個時期的

『分疆而治』論〉，探討抗戰勝利後，國民黨內部曾經出現過的兩次與中共「分疆而治」論的背景與經過，第一次是外交部長王世杰在 1945 年 9 月參加五強外長會議後，深感美蘇對峙為戰後國際局勢的主流，而國共衝突的背後，其實潛藏著美蘇的對立，因此，他主張與中共「暫取分疆而治之策」，還可維持暫時的和平統一；第二次是在 1949 年 1 月蔣中正引退、李宗仁就任代理總統後，認為國府只要能確保長江以南地區就可以對付中共，此後的國共和平談判，國府便是依「劃江而治」的構想來進行。

五、1949 年的政治變局

劉維開（中國國民黨黨史會總幹事）的〈閻錫山組閣經過之探討〉，探討 1949 年 6 月閻錫山接任行政院長的背景與經過，作者指出閻錫山在這段時期內，主要扮演緩衝蔣中正與李宗仁之間的橋樑，而閻居間折衝樽俎的角色，也為他在 1949 年的政治危局中，找到失去山西地盤後的新的政治舞台。林桶法（輔仁大學副教授）的〈1949 年中共接管北平經緯〉，作者認為 1949 年中共和平接管北平市，採取漸進式的接管，以恢復經濟繁榮為優先考慮，嚴禁農民侵犯地主在城裡的工商企業，使得接管後的北平，迅速恢復安定，而「北平模式」也成為未來中共接管國府城市地區的典範。程玉鳳（世新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的〈1949 年前後的資源委員會〉，敘述創立於 1932 年的資源委員會，在 1947、48 年間轄有生產機構 96 個、廠礦 291 個，員工達 22 萬餘人，可說是國府經濟及生產的命脈，但在 1949 年的變局中，絕大多數留在大陸的資產及技術人員投向中共，僅剩下在臺灣的 16 個事業單位，而其監管權又被「臺灣區生產事業管理委員會」取代，以致曾盛極一時的資源委員會，在播遷來臺兩年後，就遭到裁撤的結局。

六、1949 年變局對臺灣的影響

呂芳上（中研院近史所所長）的〈痛定思痛：戰後中國國民黨改造的醞釀(1947-1950)〉，探討戰後國民黨面對國內政局的劇烈變動，開始在組

織及黨務上力求改革，其中包括黨團合一的進行及黨內革新運動的嘗試，但終無法挽回頹勢。撤退來臺後，國民黨實行改造，對黨務展開全面的重整，在起初曾考慮以分裂各不相屬的方式重新建黨，來實行兩黨政治；也試圖在一個大家長下分家，以求保有天下，但均不成功。後來甚至想過更換黨名，另立「新黨」，以新招牌號召，但最後仍走上「老店新開」的方式作徹底的改造。

薛化元(政治大學歷史系副教授)的〈陳誠與國民政府統治基盤的奠定—以1949年臺灣省主席任內為中心的探討〉，探討陳誠在臺灣省主席任內時的許多重要措施，如實施戒嚴、新臺幣改革、三七五減租，以及規劃推動戰後臺北地方自治的基本藍圖，深深的影響了此後臺灣數十年的發展。而陳誠省主席任內的作為，不僅是日後確立強人威權體制下，黨國與社會基本關係的要素，也奠定了日後陳誠成為僅次於蔣中正的第二號人物的基礎。

陳思宇(臺灣大學歷史系博士生)、陳慈玉(中研院近史所研究員)的〈臺灣區生產事業管理委員會對公營事業的整頓 1949-1953〉，1949年後，原先主管國營事業的資源委員會由於人員、設備及廠礦多未及遷臺，急需另建一有力推動經濟事務的管理單位，於是成立生管會以整合中央與地方的經濟機構，在幾年的整頓中，生管會成功的整合公營事業體系，發揮經濟統制與經濟計畫的功能，幾乎完全取代了中央的經濟部與省府建設與財政兩廳及臺灣銀行的職能。但由於生管會的成立係因應特殊情勢的需要，1953年國府重新調整財經機構，設立「經濟安定委員會」，歸併裁撤生管會，也完成其階段性的任務。

朱宏源(中研院近史所研究員)的〈孫立人與麥帥：1949年〉，探討1949年變局時，當時在臺灣僅次於陳誠的第二號軍事人物—孫立人與日本的麥克阿瑟元帥的交往與聯繫，而麥帥對孫立人的肯定與支持，也對日後幾年的臺灣政局，埋下了一枚難以預料的不定時炸彈。夏誠華(玄奘人文社會學院副教授)的〈1949年以來兩岸的僑生教育〉，在1950-60年代中，臺灣由於得到美援的支持，大量招收僑生回國升學，對爭取華僑認同及推展外交關係上，頗有斬獲。但自1970年代中期開始，中共在國際外交舞台上，已逐漸取代臺灣的地位，而僑生教育也成為兩岸角力的戰場，近年來，

在臺僑生人數日趨減少，除了因為中共擴大在海外招生外，其求學費用較為低廉，也是吸引僑生的一大誘因。

七、1949年前後的中外關係

墨軻（Peter Merker，德國埃兒福特大學漢學系主任）的〈三〇至五〇年代中德關係幕後的背景〉，敘述這段時期中德外交關係的演變與背景。金光耀（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的〈四〇年代末五〇年代初國民黨在美國的游說活動—顧維鈞為中心的討論〉，主要依據藏於哥倫比亞大學的顧維鈞文件，以古德溫、佩奇及對《遠東通訊》三個事件為例，探討國民黨在美國的外交系統，以金錢運作的方式，進行在美國政壇的游說活動。王綱領（文化大學史學系教授）的〈1948年的美國「援華法案」〉，探討1948年美國國會通過的「援華法案」，對中國政壇的影響及具體的施行成效，在這批美援中，以糧食和日用品的救濟，較有成效，在工業及軍事援助上，則因為國軍戰事的一敗塗地，難以挽救覆滅的危局。

八、國共戰爭的歷史記憶

張世瑛（政治大學歷史所博士生）的〈太原五百完人：一段國共戰爭歷史的想像與塑造〉，以太原五百完人的歷史為個案，探討國府遷臺後，對於國共戰爭歷史記憶的塑造與其所反映的時代意義。黃克武（中研院近史所副研究員）的〈一二三自由日：一個反共神話的興衰〉，本文從文化史的角度切入，探討1950年代的臺灣社會，如何集體建構出一個反共神話，即一萬四千個義士共同追求自由的形象，又是透過怎樣的書寫方式與影像表述，將一二三變成一個世界性的自由紀念日的過程。

從這次討論會所涉獵的主題來看，不難發現已經逐漸跳脫出過去學界長久關注的焦點，也就是尋找國民政府為什麼失去大陸的原因，開始著力於1945-49年間的內政、外交、經濟、社會等各個層面，以及1949年對兩岸政局的衝擊與影響，甚至近年來方興未艾的歷史記憶等課題。就新領域

的開拓及新資料的介紹而言，這次的討論會可說是成功的發揮了拋磚引玉的作用。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叢書（72）

戒嚴時期臺北地區政治案件口述歷史 第一輯至第三輯

呂芳上等訪問 丘慧君等紀錄 平裝 每冊 400 元

民國三十八年，國共內戰失利，國民黨中央政府撤退來台，基於安定政局的考量而實施戒嚴。戒嚴期間（1949-1987）政府為全面肅清反對勢力，曾賦予情治機關逕行逮捕左翼反對者與相關人士的權力。他們或遭拘押或被判刑，此即一般所謂國民黨統治下的「白色恐怖」。本書訪問當時主要發生於台灣北部之案件及設籍台北市的一百餘位受刑人，二十幾位家屬及十二位見證人。

全書計九十五篇訪問紀錄，共六十餘萬字，分為三輯。第一輯收錄三十一篇訪問稿，包括台灣省工作委員會所屬的台北市工作委員會案、台北街頭支部案、台北市工作委員會木工支部王忠賢案、基隆市工作委員會案、桃園龜山支部案、桃園街頭支部案等十四個個案。

第二輯三十二篇，包括省工委會所屬的學生工作委員會案、台大法學總支部案、學術研究會案、郵電總支部案、台南市郵電支部案、台北電信局支部案等十二個案。

第三輯三十二篇，包括外圍組織、台獨、吳聲達、蘇藝林、國防醫學院、四六事件及其他不相統屬的十四個個案。

書中除訪問紀錄、圖片、書信外，並佐以當時《中央日報》、《華報》、《新生報》等報導。同時根據判決書及相關資料簡介各案，俾官方說法與受訪者自白並列對照。此外，卷首附有各獄所位置圖，有助讀者了解當時的場景。



「第六屆中日關係」國際學術研討會

李恩涵*

「第六屆中日關係」國際學術研討會已於本年(2000年)3月3日至5日在舊金山(The Crown Plaza Hotel, Foster City)順利舉行，主辦者為美國日本侵華研究學會與羅徹斯特理工學院(Rochester Institute of Technology)，本所與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則為名義上的協辦，會議秘書長由南伊利諾大學吳天威教授與羅徹斯特理工學院朱永德教授擔任主持組織事宜。計出席學者有來自中國大陸約40人，來自日本者7人(東京女子大學校長衛藤瀋吉雖未出席，但在財政上多予支持)，台灣6人，美國25人，英國1人，加拿大2人，義大利1人，紐西蘭1人，俄羅斯2人。各學者提出的論文計為80篇，有用中文寫的，也有用英文寫的，用日文寫的只有一篇，分別在十六個分組中宣讀。著名學者參加者，計有加州大學(Berkeley)講座教授 Fred Wakeman，哈佛大學講座教授 Ezra Vogel，史丹福大學講座教授 Peter Duus，哥倫比亞大學講座教授 Carol Gluck，耶魯大學日本史教授 James B. Crowley，著名報人 John W. Powell、Iris Chang、加拿大現代中國研究會會長徐乃力教授等。各分組的主要論文題目如下：

1. 中日經濟關係(主席 Parks Coble, University of Nebraska)：

- ◇ 金普森(浙江大學)，〈論西園借款〉；
- ◇ Vitaly A. Kozyrev(莫斯科大學)，“The Guomintang Policy of State Economic Control during the Sino-Japanese War, 1937-1945: Urge Toward Dictatorship or Search for Real Power”；
- ◇ 松本東四郎(日本岡山大學)，“Miraculous Rehabilitation of the Anshan Iron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 and Steel Co. during the three years Reconstruction Period, 1949-1952” ；
- ◇ Parks Coble(University of Nebraska), “ ‘Japan’s ‘New Deal’ for China’s Capitalists, 1941-1945” ；
2. 1937 年前中日間的和戰（主席 Donald A. Jordan, Ohio University）：
- ◇ 周毅，〈蔣介石與日本對東北的早期談判〉；
 - ◇ 杜毅、杜穎，〈杜重遠與日本〉；
 - ◇ Donald Jordan, “War or Peace Factions in Sino- Japanese Relations of 1931-1937” ；
3. 中日戰爭與其解釋（主席 Peter J. Seybolt, University of Vermont）：
- ◇ 榮維木，〈誰在製造謊言：評日本右翼的軍國主義史觀〉；
 - ◇ Stephen MacKinnon, “Wuhan of 1938: The Center of War” ；
 - ◇ 白競凡，〈記冀中日本人民反戰同盟支部〉；
 - ◇ Peter J. Seybolt, “Japanese Imperialists and Their Chinese Allies: A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of the Nature of Japanese Occupation of China during the Sino-Japanese War, 1937-1945” ；
4. 從近衛到東條的日本對華政策（主席 Stephen Uhalley, Jr., Univesity of San Francisco）：
- ◇ 謝俊美，〈近衛篤磨侵略思想及其活動述略〉；
 - ◇ 齊福霖，〈東條英機與中日戰爭〉；
 - ◇ 曾景忠，〈九一八事變後日僑參與侵華反華活動述略〉；
 - ◇ 余子道，〈評戰時日本的和平運動〉；
5. 戰時日本在中國的傀儡政權（主席 Marjorie Dryburgh, University of Sheffield, England）：
- ◇ 王文鋒，〈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東北殖民教育概述〉；
 - ◇ 伊原澤周，〈檢討繆斌的和平工作〉；
 - ◇ Marjorie Dryburgh, “Representing ‘Collaboration’ : Identity, Morality and Sino- Japanese War” ；
6. 日軍在華遺留的化學彈問題（主席 Sheldon Harris,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Northridge）：
- ◇ Sheldon Harris, “The Sino-Japanese Dispute over the Disposal of Chemical

Weapons Abandoned in China at the Conclusion of WWII” ；

- ◇ Benjamin C. Garrett, “Japan’s Legacy of Chemical Weapon in China” ；
- ◇ 李亞泉，〈海拉爾日本軍事工程考察記〉；

7.戰時日本虐待戰俘與勞工問題（主席 John W. Powell, Formerly Publisher of China Weekly Review）：

- ◇ 傅波，〈論日本在我國東北虐待戰俘勞工問題〉；
- ◇ 何天義，〈日軍設在中國華北的戰俘集中營的罪行調查〉；
- ◇ 孫玉玲，〈略論中國東北淪陷時期日偽的勞工政策及其實施的後果〉；
- ◇ 居之芬，〈關於日本在華北的勞務統制〉；
- ◇ 李秉剛，〈‘萬人坑’與日本侵華罪行〉；

8.戰爭期間的國際性運動(主席 Larry Shyu, University of New Brunswick, Canada)：

- ◇ Pisarev Alexander, “Sino-Japanese Relations and the Policy of the Comintern in China(1920-1950)” ；
- ◇ Guido Samarani(Universita Ca’ Foscari di Venezia, Venice, Italy), “The Asian Connection: China, India and Sino-Japanese War” ；
- ◇ Larry Shyu (徐乃力), “The International Interpretation in the Sino-Japanese Relations, 1927-1945” ；
- ◇ Bruni Zoratto, “Evolution and Judgment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Contemplated in the Foreign Policy of Italy” ；
- ◇ 郭俊鈺，〈論歷史上的中、日、美的互動關係〉；
- ◇ Mary S. Fernandes, “Japanese- Portuguese Relations during WWII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Macao” ；

9.戰時日本的 731 活人生物細菌戰罪行(主席 Benjamin C. Garrett, Senior Researcher, Battelle Memorial Institute, USA)：

- ◇ 邢安居，〈鮮為人知的活人細菌實驗場〉；
- ◇ 關捷，〈大連日軍 731 細菌部隊研究—記大連衛生研究所〉；

10.在中國與朝鮮之日本細菌戰（主席松本高夫，日本慶應大學）：

- ◇ 松本高夫（慶應大學），〈戰時日本在中國的細菌戰〉；
- ◇ 丁曉強，〈日軍在浙贛地區細菌戰的調查研究〉；
- ◇ John W. Powell, “The Question of U.S. Use of Germ Warfare in Korea” ；

- ◇ 王選, “Civilian Activities in China over Japanese Biological Warfare: Lawsuit and Investigation” ;
11. 南京大屠殺與其相關問題 (主席 William Kirby, Harvard University—未到) :
- ◇ 胡華玲, “The Diary of Minnie Vautrin” ;
 - ◇ 孫宅巍, 〈南京大屠殺與南京周邊暴行研究〉 ;
 - ◇ 趙建民, 〈從《圖書整理報告》看侵華日軍在南京的圖書瘋狂掠奪—兼對相關的若干文獻資料的概要介紹〉 ;
 - ◇ 張連紅, 〈南京大屠殺時期日軍當局眼中的南京安全區〉 ;
12. 戰時日本販毒與其他暴行 (主席陳鐵健, 美國陳獨秀研究學會主席) :
- ◇ 蘇智良, 〈中國各地日軍慰安所的調查〉 ;
 - ◇ 李恩涵(En-Han Lee), “Japan’s Involvement in Drug Trafficking in the Occupied Northern and Central China, 1937-1945” ;
 - ◇ 李茂杰, 〈關東軍製造撫順平頂山大屠殺〉 ;
 - ◇ 陳鐵健, 〈日本政府掩蓋大島町和王希天血案的真相〉 ;
 - ◇ 楊光彥, 〈論重慶大轟炸〉 ;
13. 日本戰爭經驗 (主席祖炳民, Regent of John F. Kennedy University) :
- ◇ Robert J. Perrins (Acadia University, Canada), “Sickness and the Search for Sanitation : The Evolution of Japanese Colonial Governance in the Manchurian Port of Dalien, 1905-1915” ;
 - ◇ Theodore F. Cook, “The Soldiers’ ‘Experience for War’ ” ;
14. 中國婦女與教育 (主席 Stephen MacKinnon,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
- ◇ 崔淑芬, 〈中國近代的師範教育與日本〉 ;
 - ◇ Poland Hung, “Integration of the Sino-Japanese War(1931-1945) into the WWII History Curriculum” ;
 - ◇ 徐冰, 〈第二次世界大戰前中日教科書糾紛考略〉 ;
15. 日本的右翼政治與戰爭賠償問題 (主席本澤二郎, 二十一世紀中日和平協會主席) :
- ◇ 陳景彥, 〈拒不認罪的五十五年：再評日本政府的歷史觀〉 ;
 - ◇ 本澤二郎, 〈進行中的東亞權力爭奪〉 ;
 - ◇ 郎維成, 〈戰後日本當局應同戰前日本軍國主義劃清界線〉 ;

16. 二十一世紀中日關係展望（主席 Carol Gluck, Columbia University）：

- ◇ 薛君度，“Japan’s Past and Future: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 ◇ 袁成毅，〈1972年中國政府放棄對日索賠略述〉；
- ◇ 葉先揚，“A Preliminary Inquiry about the International Role of Japan to be Played in the 21st Century”；
- ◇ 關捷、楊惠萍，〈日美安保體制之演變及對中國之影響〉；
- ◇ 陳樹柏，“A Proposed High-technological Educational Mode of the 21st Century”。

在研討會開始之初，首先由史丹福大學講座教授 Peter Duus 以 “War and Public Memory in Postwar Japan” 為題發表「主題演講」。他認為日本大阪右翼人士之否認南京大屠殺，日本政府採取不支持、不干預的政策，與戰後德國（西德）政府採取的與納粹時代「斬斷關係」的政策，大為不同；這表示日本政府與某些日本人實無勇氣面對二戰中的戰敗與其後果的現實，實為日本人在亞洲的一項恥辱。1996年珍珠港事變 55 週年時，日本也拒表歉意。日本人雖然在大阪建立了一座和平紀念館陳列出戰時種種生活痛苦的情況，也陳列出日本侵略朝鮮與中國的重要事項；另外，在過去十年內，日本首相也屢次表示對過去侵略行為的反省與道歉，但總的來說，日本人常常認自己為「受害者」而忘記了自己是「加害者」的所作所為了。因此，使社會大眾加強對戰爭的記憶，實為歷史學者與社會大眾的共同責任，我們應在這方面進一步努力才可。中華民國前立法院院長梁肅戎則以貴賓身份，呼籲日本朝野應牢記孫中山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對日本的諍言，「應作東方王道的干城，勿作西方霸道的鷹犬」，做為二十一世紀未來中日兩國關係的基本信念，東亞大局才會永保和平與繁榮。

在第一天分組論文宣讀完畢之後的晚宴上（在舊金山萬壽宮酒家），哈佛大學福特講座東亞史教授 Ezra Vogel 應邀即席演說，以英、中文暢談當前東亞的現況。他認為日本朝野不將二戰前與二戰時對外侵略的史實講清楚，並站穩清算的立場，實為不智。不過，如說日本新軍國主義已經重新站起來了，也實為是誇大其詞的，因為日本的軍力總數極少，還不到 20 萬人呢！他並對中、美、台的當前局勢表示意見，認為台灣大選之後，即使美國會售賣新的武器給台灣（TMD），但將不會太多，也不會完整的。

在第三日全部議程結束的告別晚宴上，耶魯大學日本史教授 James B. Crowley 則應邀發表另一專題演說，主要是分析日本二戰時由「北進」轉而「南進」的歷史因素與過程，甚具學術性的意義。

綜括而言，就這次學術研討會中各方面學者所提出的論文的素質而言，其中實不乏佳著；有些調查報告也是第一次向世界學術界發布的，甚具參考價值。研討會在最後一次的全體學者參與的會議中，並通過一項決議，呼籲日本政府應向德國（西德）政府學習，就南京大屠殺、731 活人細菌試驗及其他暴行，向受害者謝罪，並予以賠償，以了結過去歷史性的事件，而勇敢地面對未來。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叢刊(42)

蔣復璁口述回憶錄

蔣復璁等口述 黃克武編撰

198 頁 平裝 200 元

蔣復璁(1898-1990)字美如，號慰堂，浙江海寧人。北大哲學系畢業後赴德留學，研習圖書館學。返國之後奉派為中央圖書館籌備處主任，民國廿九年接任首任館長，先後服務於央圖三十餘年。民國五十四年，調派故宮博物院院長，歷時十七年又四個月，於民國七十二年退休。民國六十三年以專研版本學及宋史研究，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

本書由兩部分構成，第一部份為蔣先生接受本所的口述訪問紀錄編寫而成，敘述他一生的經歷，以及民國時期政、學界之掌故。第二部分附錄包括了五位相關人物的口述訪談及其他資料。此外收錄大事年表、著作目錄與相關訪問紀錄和回憶作品，甚具史料價值。



學術演講

退休茶話：把酒話桑麻

陶英惠*

民國 53 年 7 月 2 日，承劉鳳翰先生之推介、郭所長廷以先生之厚愛，我誠惶誠恐的來到近代史研究所工作，不知不覺已過了三十五年半的時間。初到所時屬於年輕一輩；今天，除了幾位延退的同仁外，已是最老的了。記得初學作文時，不論題目是什麼，開頭總是喜歡用“光陰似箭，日月如梭”之類的陳腔濫調，那只是“少年不識愁滋味”式的無病呻吟，根本不解其意。現在總算體會出“光陰似箭”的真正意義了。今天，懷著一顆“感恩的心”，來對所有愛護我、幫助我的長輩及同輩們，表達一下衷心的感謝之意。

困窘的求學階段

民國 37 年的中秋，我離開了家鄉，開始過著流亡學生的生活。每天最重要的事，是如何把肚子填飽，挨餓的滋味實在不好受，所以無法認同“餓死事小”的名言；當初認為唸書才真正是小事。唸書既是小事，也就不會認真，自然也就讀不好。於民國 44 年能夠考上大學，連自己也感到有些意外！那一年東海大學首次招生，我考了個備取第八名，而同班的張玉法先生則是東海中文系的榜首；由行政專修班改制後的台北法商學院，那一年也是第一次招生，我也考了個備取第八名，而另一同班同學趙彥賓先生，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兼任研究員

則是法裔的榜首。我唯一的正取是台大中文系，所以就進了台大。另外三位同班的王曾才、王德毅、馬先醒等先生，均在歷史系，所以到大二時也轉入了歷史系。

在歷史系因為上了吳老師相湘教授所開的中國近代史課程，便對近代史發生了興趣。民國 46 年，中央圖書館擬將曾國藩重要幕賓趙烈文之《能靜居日記》五十四冊手稿本排印出版，由於手民無法辨認行草，檢排困難，要找人先予謄清，吳老師介紹我去抄寫，不料此事竟使我受惠無窮：除了可賺取一些抄寫費，對於生活不無小補外；又在特藏室主任徐玉虎教授不厭其煩的指導下，認識了不少草字，以後閱讀檔案文件或名人手蹟時，得到很多方便；82 年 3 月 20 日台大歷史系成立淡新檔案編印委員會，承張秀蓉所長聘為顧問，主要的工作是替他們辨認草字，真是始料未及的事。而我在中央圖書館抄寫時，也將有用的材料另作筆記，以後即成為畢業論文的主要材料，真可謂一舉數得。

民國 48 年 6 月在歷史系畢業。畢業論文由吳相湘教授指導，題目為〈湘軍攻克金陵考証〉，最主要的參考材料就是《能靜居日記》，因為此前很少有人利用過其中的材料；一篇學士論文，能用此類新材料，也算是難能可貴的。此文承陳捷先教授厚愛，在其主編的《幼獅學報》二卷二期（民國 49 年 4 月 30 日）發表。我在文末特予註明：「本文承吳相湘師指導，謹此誌謝。」以示不忘師恩。後來承王聿均先生介紹到國史館工作時，即以此文送呈羅家倫館長審閱，幸蒙錄用。由於該日記尚未引起學人的注意，後來又寫了一篇〈關於趙烈文《能靜居日記》〉，發表在民國 52 年 7 至 8 月出版的《文星雜誌》第 69 及 70 期。除了介紹其史料價值、特別是有關太平軍的記載外，也據以指出郭廷以先生所編著的《太平天國史事日誌》及《太平天國曆法考訂》中若干小錯誤。郭先生看到了這篇短文，大約認為我在研究方面還算細心，復經劉鳳翰先生進言，所以錄用了我。大家都知道，郭所長對羅館長尊敬備至；可是他們兩位都和吳教授有一些芥蒂，但都沒有將他們那一代的不愉快延伸到我這個學生身上，前輩風範，令人感佩！而郭所長對於指出其錯誤的後輩，不僅沒有在意，反予錄用，這種胸襟，尤非常人所能做到！

民國 48 年完成畢業論文後，讀到陳壽恒編著之《太平天國風雲人物

誌》，發現其中有許多錯誤，乃寫了一篇書評，登在 6 月 5 日出版的《台灣新生報》《讀書週刊》第四期，其中也引用了《能靜居日記》作為證據，加以糾正。到了民國 50 年 2 月 15 日，吳老師介紹我去拜見負責《新時代》雜誌編務的杜呈祥教授時，他仍然記得我寫的這篇書評，而給予肯定，並立即答應我去社中工作。原來他就是《讀書週刊》版的主編。想不到我一生所曾服務的三個單位《新時代》雜誌社、國史館及近史所，竟然都與《能靜居日記》有些關聯。

由《新時代》雜誌社到國史館

民國 50 年 2 月，服完了預備軍官役，承吳老師介紹到《新時代》雜誌社擔任助理編輯的工作，於 3 月 1 日到職。《新時代》設在台北市南昌街正中書局編審部，主編為毛子水教授，杜教授則負責實際編務，兩位都不在社中上班，我是第一個也是唯一的一個專職人員，所有的稿件、函札、資料等，由我送到杜先生家處理。5 月 15 日，我便轉至國史館工作。在《新時代》雖然只有短短兩個半月的時間，卻也學到一些編排校印的技巧，不料因此便與印刷出版結下了緣。

到國史館工作，是由劉鳳翰先生轉託王聿均先生介紹的。王聿老雖為介紹人，但在為我寫介紹信給羅館長時，他和我尚未曾謀面。這是我永遠不敢忘記的。

在國史館主要的工作是蒐集、整理抗戰史料。當時國史館館長和黨史會主任委員都由羅家倫先生擔任，兩個單位的資料調借非常方便，羅館長將民國 20 年至 34 年的各種報紙和期刊自黨史會調來，記得有《東方雜誌》、《國聞週報》以及各地的《大公報》、《中央日報》、《掃蕩報》、《新華日報》、上海的《時事新報》、《新聞報》等，我差不多都翻了一遍，收穫至大。一般諷刺公務員上班為喝茶、看報、聊天，而我的“看報”卻是正經事。

轉職近史所後的研究工作

53年7月轉至本所工作後，郭所長囑先圈點《四國新檔》中之「俄國檔」及《道光咸豐兩朝籌辦夷務始末補遺》；告一段落後，再奉命整理《中俄關係史料》民國9年部分，共出版了三冊：《俄政變》（57年1月）、《一般交涉—附俄對華外交試探及停止俄使領待遇》（57年12月）、《中東路與東北邊防—附外蒙古》（58年6月）。在整理檔案的同時，也在考慮自己的研究方向和範圍。由於對於近代史尚乏全盤的了解，不敢選大題目，擬先從人物傳記著手。幾經考慮，便選定了本院創辦人蔡元培先生。除多方蒐集其有關史料外，並陸續寫了一些單篇文章。在蔡先生的生平事蹟方面，已發表的有〈蔡元培的生平與志業〉、〈蔡元培與清季革命〉、〈蔡元培在香港的垂暮生活〉等，又應一些期刊之請寫過多篇小傳，內容詳略不一；原計畫編一部詳細的年譜，僅完成了1868-1916部分，至於1917-1940年間的資料，雖也大致蒐集齊備，嗣因調院擔任行政工作而輟筆；及至擺脫了行政職務後，同類的著作已有數種問世，為避免與人雷同，深感下筆為難，一再蹉跎，終未能將年譜完成。對蔡元培在教育、學術等方面的貢獻，曾撰有〈蔡元培與民國教育之發展〉、〈蔡元培與北京大學1917-1923〉、〈蔡元培與大學院〉、〈蔡元培與中央研究院〉等數篇；又曾參加中華民國建國史之撰寫工作，完成〈開國時期教育文化的創新〉、〈民初時期的學術研究〉、〈統一與建設時期學術研究之成就〉、〈戡亂與復國時期學術研究之成就〉等四篇。這兩部分的內容，原擬加以綜合整理，去其重複，可成為一本專書；亦因瑣事太多未能著手。以後若有餘力，仍將把「年譜」以及「蔡元培對教育與學術的貢獻」這兩本書寫完。已完成者有兩本小書：一為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主編的《中國歷代思想家》中第51本《蔡元培》，於民國67年6月由商務印書館出版；一為《現代中國思想家》第5輯《蔡元培》，民國67年12月巨人出版社印行。

民國77年11月，我到設在北大的「蔡元培研究會」訪問，見到了心儀已久的高平叔教授，他特自天津南開大學趕來相會，大家曾就如何推動有關蔡先生的學術研究活動交換意見，決定以高教授所編《蔡元培全集》為基礎，再廣事蒐集蔡先生的著述文字，編一部更完整的文集，定名為《蔡元培文集》。後因編者均為大陸學者，我一人在台，與之聯繫不便，不克參與實際編務，僅將自己多年來所找到未刊或《全集》未收錄的文字，悉

數提供給他們分別編入。該書於 1995 年 5 月由台北錦繡出版公司印行，共 14 本，高教授是名副其實的主編，承其厚愛，也給我掛了個副主編的名義。

我因為研究蔡先生的緣故，對於本院的歷史也特別有興趣。民國 67 年本院成立 50 周年時，錢思亮院長即計畫編寫院史，我奉命撰寫自 16 年成立到抗戰爆發一段；院長室秘書那廉君先生負責寫抗戰時期；遷台後的部分，則由秘書主任萬紹章先生執筆。三人分頭工作，但未就體例等有所協商。我根據本院早期的出版品如：《年度總報告》、《院務月報》、各所的期刊、以及黨史會所印《革命文獻》中有關本院的資料等，先摘記大事，按時間順序排列，計完成七萬餘字，供撰稿時查考之用。後因院裡再也沒有提起此事，也就未再繼續作下去。民國 77 年，為本院成立一甲子，吳大猷院長重申前議，命那先生和我負責纂輯。我因工作太忙，主要是由那先生負責。他將我的一篇舊作〈蔡元培與中央研究院〉打散、修改，作為第壹章初創時期；第貳章抗戰時期、第參章復員時期由那先生撰寫；遷台時期則由各所提供資料，再加以整合，於 77 年 6 月 60 周年院慶前夕倉卒印出，而我已先於 4 月底離開了總辦事處秘書組，未能始終其事；吳院長在序文中對我曾參與纂輯工作表示謝意，益增慚愧。

調院服務八年，案牘勞形

民國 70 年 8 月 18 日上午，忽奉錢思亮院長召見，他開門見山的說，秘書主任萬紹章先生已屆退休之年，要調我暫兼秘書組工作。（可能是萬先生推薦）我一聽之下，頓感手足無措，連忙懇辭。自忖一生甚少接觸公文，對公文真可謂一竅不通，而秘書主任一職，正是全院公文的「集散地」，千鈞重擔，怎麼能挑得起來？乃尋找種種理由向錢院長說不能從命，也不敢從命，為全院工作著想，務請另覓適當人選。可是錢院長就只有一句話：「你可以做。」談了兩小時，在心理上完全沒有準備的情形下，再也沒有理由可說了，既然固辭不獲，只有勉強答應試試，惟請每天半日在秘書組工作，半日回所整理一下未完的研究工作。當即獲得錢院長同意。自 70 年 9 月 16 日正式調任。到了秘書組以後，才體認到何謂「案牘勞形」！公文如流水，一會兒就積案如山，全天應付，猶恐處理不完，怎麼可能再半日

回所？後來錢院長談起他初任北大化學系系主任時，就知道勢必要與研究工作告別，從那時起，他便一直做行政工作。

錢院長於 72 年 9 月 15 日病逝，我在秘書組為時恰好兩年整；時值第一期五年計畫實施未久，院務特別忙，原以為等新任院長接事後，便可趁機擺脫；沒想到接任的吳大猷院長，於 11 月 1 日就職時，不帶一個私人，對各單位主管均予留任，又承切囑繼續相助。我與吳院長沒有任何淵源，深感其明快的作風及誠懇的態度，遂允暫時留任，以為過渡。錢、吳兩位院長，係多年老友，可是性格、作風截然不同，吳院長在〈念思亮兄〉文中說：「我們的脾氣有時適相反；他的謹慎、心細、忍耐、認真，而我則對人對事，喜怒形於色；有時粗枝大葉，不耐細節。」面對這種情形，我要如何調適、並與之配合，不能無慮。直到 77 年 4 月底，因為一件人事案與總幹事意見不合，乃拂袖而去，不留絲毫迴旋餘地，仍舊回所做研究工作。蔡元培先生嘗自謂「一生難進易退」，令人敬佩，我這次的憤而辭職，下意識裡或許也有一些想效法的意味！當時許多同仁對我的去職表示真摯的遺憾，讓我覺得正是我離開的最好時機，即所謂見好就收；同時也證明我在秘書組所做的一切，還沒有讓大家失望。惟事後反省，當時頗讓吳院長為難，不免有些歉意。82 年 8 月 1 日，在胡適紀念館管理委員會呂主任委員實強先生的推薦下，又承吳院長聘兼胡適紀念館主任。由此可見，他老先生對我五年前的斷然求去，似乎並沒有太介懷。

本院自成立至今，共有七任院長，除第一任蔡院長係由國民政府特任外，其他六任均經由評議會選出三位候補人，呈請國民政府（後修正為總統）遴任。在這六次選舉中，我曾躬逢一次，並承辦選務工作：即民國 72 年 9 月 15 日，錢院長病逝，第十一屆評議會於 10 月 21 日舉行臨時會議，票選吳大猷、閻振興、余南庚三位先生為院長候補人。其籌辦工作，雖然十分辛苦，但也是一件非常難得的經驗；所見所聞，更是直接的珍貴史料。

民國 83 年 1 月 15 日，李遠哲先生接任院長，22 日上午，忽約我去談，要我再「屈就」秘書主任（李院長的解釋是：在秘書主任之上已增設處長，職等較前降低，所以說是屈就）。我即答以當年好不容易擺脫，決不願再跳火坑。李院長又再三說他在國外多年，回來很想做點事，惟苦無行政經驗，希望我不要拒絕。語至誠懇。答以容慎重考慮後再行答覆。25 日上午，

已內定為處長、尚未發表之李國偉先生啣院長命來勸駕，至感允拒兩難。27日上午，一位熱心推動胡適研究的企業家陳宏正先生，陪同李院長到胡適紀念館察看，由呂主任委員說明紀念館目前之困難以及解決之道，李院長允將此事放在心上，相機協助解決。談完了紀念館的問題後，李院長便再問我考慮的結果，陳先生係多年的畏友，他也在旁敲邊鼓，令我不便再行峻拒；乃告以經連日詳加斟酌，可以重回秘書組，惟請以一年為期，李院長再三稱謝而去。3月1日，乃又回到秘書組，自嘲為「復行視事」。其實在2月17日，即開始以個人身份為李院長工作，首先就是拜讀其到院後之第一次演講稿：〈中央研究院未來的發展〉。這是一次相當重要的演講，正式宣示對院之大政方針，講稿乃其親撰，他謙虛的說：因久居國外，對遣詞用字，不無困難，且多英語式句法，故請我代為潤飾。

民國84年2月底，到秘書組一年之期屆滿，即先期呈辭，以信守承諾。延至3月15日李院長覓妥了繼任人選方辦理移交，重獲自由之身。在這一年中，大約是年齡的關係，身心俱疲，深以案牘勞形為苦。計在秘書組，歷經錢、吳、李三任院長，載筆相從，前後長達約八年之久。

回想錢院長之所以要我接秘書組工作，可能與院士會議有關。民國61年7月，本院舉行第10次院士會議，秘書主任萬紹章先生因為秘書組人手不夠，而院士會議工作太繁雜，所以臨時拉我去幫忙作紀錄。這本來只是臨時幫忙性質，不料竟成了一件推不掉的工作：63年7月的第11次、65年7月的第12次、67年7月的第13次、69年7月的第14次院士會議，都成了當然的紀錄員。70年9月，我接任秘書主任後，雖不再擔任紀錄，但要負責籌備整個院士會議的工作，這是秘書組兩年一次的重頭戲，比單純的作紀錄麻煩多了。71年7月的第15次、73年7月的第16次、75年7月的第17次、以及83年7月的第21次院士會議，都是我在「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的心情下完成的。若不是此前曾擔任過五次紀錄的工作，後來四次的籌備工作真不知會不會出什麼差錯！

88年2月6日聽了張存武先生的「退休茶話」演講，才知道本院早期所出版的《中央研究院簡訊》，他是催生者；這個刊物雖小，卻是同仁們獲得院中消息的重要來源，後來因故停刊。我到秘書組後，深感同仁們缺乏一座溝通的橋樑，乃與人二室主任閻琴南先生共同創辦了《中央研究院

週報》，於 73 年 11 月 1 日打字影印出版，分送各同仁。這份小刊物，至今已繼續出版了 15 年之久，對於研究本院歷史的人來說，應有小小的幫助。《簡訊》及《週報》之創刊，都出自本所同仁之手，似乎也可以說是“先後輝映”。

煩碎的編印工作

如前所述，我是因為第一份工作任《新時代》雜誌社，從而與編印結了緣；例如本所集刊，我曾歷任助理編輯、編輯委員和執行編輯。從創刊號到第 4 期下冊，共出了 6 本，由我擔任助理編輯，第 7 至 9 期擔任編輯委員，到第 10 期終於熬到了執行編輯。無論擔任的職務是什麼，我都是全程參與者。值得一提的是民國 58 年 8 月出版的創刊號，由李毓澍先生擔任執行編輯，用直排方式；到了第 2 期，執行編輯是李國祁先生，便改成了橫排。

自 70 年 7 月第 10 期集刊出版後，雖未再參與集刊的工作，但到了 77 年 6 月 1 日，剛擺脫掉秘書主任職務回所僅一個月，又接下了本所出版小組委員兼召集人，直到 83 年 3 月 1 日再回秘書組，方獲辭去出版小組的工作。在這 5 年 9 個月中，不少同仁們的大著，在出版前我都有機會仔細拜讀，目的雖在校改錯字，但也獲益匪淺。

此外，一些與所務無關的編印工作，則多係拜張玉法先生之賜：民國 60 年 2 月 1 日，他自美國回來後創辦了《新知雜誌》季刊，到 63 年 12 月 1 日停刊，共辦了四年。他在前三年用直排方式，到了第四年則改用橫排。《新知》停刊後，他又發動創辦《山東文獻》季刊，於 64 年 6 月 20 日出版，至今已進入第 25 個年頭了。這兩個雜誌，經常由一、二人或二、三人輪流主編，曾耗去了我不少時間。山東文獻社除出版雜誌外，也編印了一些書，其中有兩本，是我本「有事弟子服其勞」之義，為兩位老校長編的回憶錄：一為一聯中劉澤民校長的《海隅談往》，一為澎湖防衛司令部子弟學校王志信校長的《前塵往事憶述》。我又與王校長合編了一本《山東流亡學校史》。近四、五年來，山東文獻社結合兩岸學者數十人，著手編纂《民國山東通志》，全書約三百萬字，即將完稿，分派給我的《人物志》

尚未完成。此外，近年吉星福張振芳伉儷文教基金會編纂《山東人在台灣》叢書，已出版 14 冊，我也參與了一些編務，和于宗先、陳希沼兩位先生合編的《工商篇》，最近才告完稿。在將近四十年的歲月中，幾乎未曾間斷過編校的工作。退休後仍然無法擺脫，第一件事就是趕撰《民國山東通志》中的《人物志》，第二件則是奉王故校長志信先生遺命要編印的《山東流亡學生史》。

和歷任院長的一點機緣

我最初以本院首任院長蔡元培先生為研究重心，並無具體成績可言。76 年 11 月 16 日，奉張玉法所長之命兼理本所新設立之院史資料室業務，歷經陳三井、呂芳上三位所長，聘期至 88 年 8 月 31 日屆滿 65 歲為止；至 88 年 3 月 25 日，院史室併入檔案館，得以提前卸任；總計 11 年 4 個多月。對於張所長當初的期望，雖未完全達到，但也因緣際會徵集到一些檔案。如錢院長的檔案，是我經手徵集來的；王院長的檔案，係經我穿針引線從旁所促成。在 3 月 25 日交接的座談會中，我曾將徵集各檔案的來龍去脈略作說明，檔案館主任許雪姬小姐頗感興趣，承其好意，特請蔡淑瑄小姐來作口述訪問；我為了讓以後利用這些檔案的人，知道其來歷，同時也想藉機會表達一下對捐贈者之感謝，使其美意得以長存，乃欣然接受了訪問。承蔡小姐費神整理成稿，至為感謝。

在院史室中所度藏者，主要為朱家驊院長之檔案；82 年 8 月，奉命兼胡適院長的紀念館主任。本院自成立至今的七位院長，想不到我都能攀上了一點關係，確屬難得的機緣。由於職務上的關係，得常親警效者竟有三位院長，對錢院長的寬厚、周到；吳院長的風骨嶙峋、純真、以及他以“橫來逆受”（吳先生致王世杰院長函中語，見民國 56 年 8 月 25 日《王世杰日記》。）自況的性格，都獲得直接的觀察和認識！看了很多，也學了不少。行政工作雖然繁雜，不過偶爾也會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趣事，除可作為「新儒林外史」的材料外，也可以調劑一下疲憊的精神。回憶前塵，在研究方面雖然乏善可陳，念及曾為別人做過很多的服務，並未虛度歲月，這對平庸的我來說，已經很滿足了。（民國八十九年元月二十四日脫稿）



李恩涵

李仕德*、周琇環**

中央研究院為提倡中國近代史的研究，於民國四十四年（一九五五）籌設了近代史研究所。該所在郭廷以教授的主持下，迅速成為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學術中心，並培育出許多大師級的史學學者。深思篤行的李恩涵教授，即係最早被延攬至該所服務的青年才俊之一，經過多年的潛心專研，目前李教授不但是中國近代外交史、戰時中日關係、東南亞華人史等領域中的著名學者，更是少數精通英、日文，熟諳法文的國際級學者，他溫文儒雅的書生風格，學貫中西的史學素養，紮實廣博的治史方法，皆成為有志於外交史研究者之最佳典範。

李教授係於民國十九年（一九三〇）出生於山東省諸城縣。他在啓蒙的階段，因受日軍侵華影響，曾轉入諸城天主教會所辦的育德小學與山東濟南的僞辦名校就讀，並在這個階段中，奠定了日文的基礎，此後在青島市中初中部畢業，又在山東省立青島臨中高中部就讀二年半。民國三十八年（一九四九）春隨聯勤被服廠播遷來臺，次年考取省立師範學院史地系（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前身）與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兩所學校，基於經濟考量，李教授決定進入師院史地系求學。在師院史地系時，深受郭廷以、王德昭、李樹桐、藍文徵等教授的啓發，此後李教授即以中國近代史、西洋史的研究為職志，開始其四十餘年的史學研究與教學生涯。

民國四十五年（一九五六）二月，李教授應聘為近代史研究所助理員，從事編纂清季外交史料等基礎史學的工作。四十九年（一九六〇）與王璽

* 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兼任副教授

** 國史館協修

合編《礦務檔》八冊出版，並升任助理研究員，五十一年（一九六二）再與王爾敏等合編《中法越南交涉檔》、《教務教案檔》。李教授好學深思，雖受限於當時著重史料編彙的風氣，無以發揮其撰述長才，但在編纂工作之餘，仍沉潛讀書，飽覽史語所、近史所的藏書，並細讀《籌辦夷務始末》、《清季外交史料》、《曾文正公全集》等大部頭叢書，尤其對五十年代美國哈佛大學 John K. Fairbank、Mary C. Wright、Albert Feuerwerker 等的相關著作，最早閱讀。並於一九五八至一九五九年在臺北震旦補習學校攻讀法文兩年。早在民國四十七年（一九五八）時，李教授已經開始研究清季的民族主義，並撰就〈咸豐年間反基督教的言論〉（因當時近史所未有《集刊》發行，後發表於《清華學報》，新卷六，期十二）、〈北伐時期美國的對華政策〉（刊於教育部編輯的《新思潮》）等文，民國五十二年（一九六三）並出版了第一部著作《晚清的收回礦權運動》，博得學界一致的好評。

民國五十一年（一九六二）春，李教授考取美國「夏威夷大學東西文化中心獎學金」（East-west Center Fellowship, University of Hawaii，這是一項由美國聯邦政府提供、公開招考、每學科只有一人膺選，為期兩年的獎學金，不只提供學費、食宿費，還有旅遊費、日用費、書籍費的提供），當年即進入夏威夷大學歷史研究所就讀，並曾在哥倫比亞大學研讀一個學期。民國五十二年（一九六三）夏，再回夏威夷大學繼續學業。在此期間，因於夏大圖書館，發現中俄伊犁交涉的法文史料，遂選定以曾紀澤與中俄伊犁交涉為主題，撰寫學位論文。民國五十三年（一九六四）八月，李教授在 Werner Levi、Daniel W. Y. Kwok 及 James M. McCutcheon 等三位教授指導下，完成了 *Tseng Chi-tse(1839-1890): A Diplomat in the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的論文，取得歷史學碩士後，返回臺灣，民國五十五年（一九六六）升任中研院近史所副研究員。

民國五十六年（一九六七），李教授取得美國加州大學榮譽校董會獎學金（Regents Fellowship,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的獎助，再度負笈美國，前往加州大學聖巴巴拉校區攻讀歷史學博士學位。在加州大學時，受業於徐中約（Immanuel Hsu）及 Alexander DeConde, Haruhiro Fukui, Carroll W. Pursell 等教授，其中徐中約博士在中國近代史及外交史的研究領域，斐聲

國際；而 Alexander DeConde 曾任美國兩屆外交史協會主席，為當代美國外交史的權威；Fukui 為研究當代日本的著名學者，曾著有有關日本自民黨的巨著多冊；Pursell 對美國科學史的研究與著作，亦甚負盛名。在他們的影響下，李教授傾全力於鑽研中國近代史及美國外交史。民國六十年（一九七一）以 *China's Quest for Railway Autonomy* 的論文，榮獲加州大學哲學博士學位。同年，返回臺灣續任近史所副研究員，並擔任臺灣大學政治系（所）合聘副教授；旋升研究員、合聘教授。其間曾赴美國哈佛大學、哥倫比亞大學訪問研究，及出席第十七屆與第十九屆國際東方學者會議，提出論文。另在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政治大學歷史系講授史學方法、美國史等課程。

民國六十二年（一九七三），李教授赴新加坡國立大學擔任中國研究系高級講師，後升副教授（Reader, A. P.，英制全系一般只有一位教授，一位副教授，其他為高級講師、講師等）講授近代中國、東南亞華人史等課程。民國七十五年（一九八六），任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訪問教授（visiting readership），於七十九年（一九九〇）自新加坡返回臺灣任教。

李教授執教新加坡大學、新加坡國立大學期間，除忙於教學外，仍持續致力於學術研究，出版有《近代中國：知識份子與自強運動》（民國六十六年，與張朋園等合著）、《近代中國史事研究論集》（民國七十一年）、《近代中國史事研究論集》第二冊（民國七十六年）等書，及二十三篇論文，譯有《星馬華人與辛亥革命》乙書。並藉地利之便，蒐集東南亞華人史的史料，陸續發表七篇有關東南亞史的論文，同時運用當地資料，著手進行「革命外交」的研究。也曾造訪英國國家檔案館、美國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中心等學術機構，並經常參與各項國際性學術會議；在議場上，李教授本於學術的立場，每每以熟練的外語，向國外學者質疑問難，批駁偏見或錯誤的觀點。

民國七十九年（一九九〇），李教授在新加坡國立大學任教十七年餘之後，重回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服務。回國不久，李教授即出版《北伐前後的「革命外交」（1925-1931）》（一九九三），是書延續李教授長年來對近代外交史的研究，開啓國內有系統研究「革命外交」的先聲。

近年來，李教授秉持為時代作見證的使命感，全心投入戰時日本在華

暴行的研究（實際自一九八六年秋開始，他即致力於此項研究），並在民國八十三年（一九九四）結集出版《日本軍戰爭暴行之研究》乙書。該書係以多種文字和多種檔案為基礎，運用臺灣、大陸以及美國加州大學、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哥倫比亞大學等所搜集到的中、日、英文中的有關的原始資料與二手著作，以堅實的史料證據，檢視日本侵華期間，種種破壞、掠奪、屠殺和毒化等劣跡暴行，完整客觀的呈現出日本在戰時的暴行原貌。去年（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並出版另一項系列研究成果的合集，即厚達五百六十三頁的《戰時日本販毒與「三光作戰」研究》（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算是對戰時日本暴行研究的階段性總結。此項日軍暴行研究成果，普遍獲得國內外學界的重視與肯定。前不久張純如女士的《被遺忘的大屠殺－1937 南京大屠殺》，以及鄭浪平先生新著的《第二次中日戰爭史》，均曾引用李教授的大作，並敦請李教授為之作序。

綜觀李教授對於中國近代史研究的貢獻，就量來說，他在四十餘年的研究生涯中，前後出版了中、英文專書九種，論文九十四篇，書評六篇，參與編纂的晚清外交史料四種，譯書一種，可謂著作等身。就研究主題來說，李教授有關收回礦權、鐵路等利權之研究，以及對國民政府「革命外交」的研究，不但見解獨步前人，更曾開啓了國人外交史的研究風氣；他對外交人物的研究，如曾紀澤、唐紹儀、伍朝樞、王正廷、陳友仁等中國外交先驅，素來皆堅持排除英雄崇拜的觀點，而把外交人物放在中外關係的脈絡上，析評其功過，並演繹出中國近代外交史的發展軌跡。而其最近對戰時日本暴行的研究，除運用其爐火純青的治史功力外，並以非常嚴謹的學術標準，抱持著民族關懷的熱情，撰擬成客觀中肯，評論堅實的鴻文大作，為同類的研究，作了相當程度的總結。

研究之餘，李教授在教學上一向以嚴謹著稱，並長於循循善誘、諄諄教誨，曾在新加坡國立大學、臺大政治系所、師大歷史研究所、政大外交系所、歷史所，造就出不少各界人材，可說是桃李滿天下。他所訓練出來的博、碩士任教任職於各大學院校或史政機關，在政界則有服務中央擔任部會次長及某市社會局長者，也有數位學生在國外 Oxford、Paris、Chicago、Johns Hopkins 等大學攻讀博士學位者。李教授也特別注重方法的訓練，強調多文字多檔案、系統閱讀、案例研究等原則的重要性，鼓勵學生廣泛借

重社會科學的理論方法，確立歷史解釋和批判的能力。多年前李教授為師大同學撰就的論文格式參考小冊子，至今仍是各校學生撰寫論文時，極具參考價值的資料。

當然受惠於李教授如沐春風的教誨者，不單是學生們，其二位公子在李教授的培育下，如今也是成就斐然。長公子李柏恆為柏克萊加州大學電機學博士，研究半導體、光學與材料，成績優異，現任加州大學爾灣校區（U. C. Irvine）副教授。次公子李柏毅獲普度大學電機系學位，現任美商大企業 Astec 香港分處下 Director 之管理工作。本年（二〇〇〇）八月，李教授將屆榮退之齡，相信這對於李教授而言，當不是他學術生涯的結束，而是擺脫公職生活的羈絆後，達成另一個研究高峰的開始（聽說他退休後的第一項著作將是大學教科書性質的《東南亞華人史》的撰著，這是他在新加坡大學任教十七年多教學資料的總彙，預計可有三十萬至三十五萬字的篇幅）。在此我們不僅衷心祝福他，更期待李教授繼續筆耕，為史學領域增添更多精彩可期的鴻篇鉅著來。

李恩涵教授著作目錄

專書

1. 《晚清的收回礦權運動》。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8），民國52年，371頁。
2. 《曾紀澤的外交》。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15），民國55年，398頁。
3. 《近代中國：知識份子與自強運動》（與張朋園等合著）。食貨歷史叢書，民國66年，262頁。
4. *China's Quest for Railway Autonomy, 1904-1911: A Study of Chinese Railway-Rights Recovery Movement*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1977), 316p.
5. 《星馬華人與辛亥革命》（顏清煌原著，李恩涵譯作）。台北：聯經出版公司，民國71年，453頁。

6. 《近代中國史事研究論集》。台北：商務印書館，民國71年，602頁。
7. 《近代中國史事研究論集》（第二冊）。台北：商務印書館，民國76年，464頁。
8. 《北伐前後的「革命外交」，1925-19931》。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69），民國82年，356頁。
9. 《日本軍戰爭暴行之研究》。台北：商務印書館，民國83年，429頁。
10. 《戰時日本販毒與「三光作戰」研究》。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年12月，563頁。

論 文

1. "Tseng Chi-tse, 1839-1890: Diplomat in Modern China," in *Synopese of Monographical Studies on Chinese History and Social Sciences*, vol.III (Taipei, 1964) ,22p.
2. "Tseng Chi-tse, 1839-1890 and His Role as A Diplomat of Modern China," M.A. Thesis, 1964, University of Hawaii, 220p.
3. 〈清季史實的線索與其解釋〉，《大陸雜誌》，卷32期12（民國55年6月），6頁。
4. 〈清末金陵機器局的創建與擴展〉，《大陸雜誌》，卷33期12（民國55年12月），8頁。
5. 〈研究中國近代史的趨向與必要參考書目〉，《思與言》，卷4期5（民國56年1月），10頁。
6. 〈清季同光自強運動與日本明治維新運動的比較〉，《思與言》，卷5期1（民國56年6月），11頁。
7. 〈咸豐年間反基督教的言論〉，《清華學報》，新卷6期1、2合刊（民國56年），28頁。
8. 〈同治年間反基督教的言論〉，《大陸雜誌》，卷35期3-6（民國57年8月至9月），32頁。
9. 〈論清季中國的民族主義〉，《思與言》，卷5期6（民國57年12月），9頁。
10. China's Response to Foreign Investment in Her Mining Industry,

- 1902-1911," in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U.S.A.), vol.28, No.1 (Nov. 1968), 21p.
11. 〈中美收回粵漢路權交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1（民國58年），67頁。
 12. "China's Quest for Recovery of Railway Rights, 1904-1911: Economic Nationalism in Action,"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Barbara, June 1971, 378pp.
 13. 〈中英廣九鐵路權交涉〉，《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期1（民國61年），34頁。
 14. 〈中國近代之收回鐵路運動〉，《中國現代史專題研究報告》（輯2），民國61年，34頁。
 15. "Chekiang Gentry-merchants vs. the Peking Court Officials: China's Struggle for Recovery of the British Soochow-Hangchow-Ningpo Railway Concession, 1905-1911," in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No.3 (1972), 46p.
 16. 〈唐紹儀與晚清外交〉，《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4（民國62年），73頁。
 17. 〈曾紀澤與中俄伊犁交涉〉，《新社學報》（新加坡），卷5期4（1974年12月），5頁。
 18. "China's Response to Foreign Scramble for Railway Concessions, 1895-1905," in *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HongKong), vol.XIV, No.1 (Jan. 1976), 22p.
 19. "China's Struggle for A Self-financed Railway Network, 1904-1911," in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No.5 (June 1976), 85p.
 20. 〈同治年間陝甘回民事變中的主要戰役〉，《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7（民國67年），30頁。
 21. 〈左宗棠早期剿攻太平軍的戰績〉，《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期7（民國68年），18頁。
 22. 〈剿捻期間湘淮軍間的合作與衝突〉，《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

- 刊》，期8（民國68年），32頁。
23. 〈同治、光緒年間（1870-1885）湘淮軍間的合作與衝突〉，《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集刊》，期9（民國69年），26頁。
 24. “China’s Recovery of the British Hankow and Kiukiang Concessions in 1927: a Study of the Chinese Nationalist Party’s Revolutionary Diplomacy During the Northern Expedition Period,” (Monographic Series, No.4, Centre for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Western Australia), 1980,34p.
 25. 〈北伐前後收回關稅自主的交涉〉，《中華民國建國史討論會論文集》（第三冊）。臺北，民國70年8月，54頁。
 26. 〈收回利權運動與立憲運動〉，《中國近代的維新運動—變法與立憲》。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70年8月，31頁。
 27. 〈南洋華人對孫中山反滿革命的貢獻及其與香港的聯繫〉，香港，珠海學院主辦，「孫逸仙博士與香港國際學術會議」論文，1981年9月，25頁。
 28. 〈北伐期間收回漢口、九江英國租界的交涉—國民政府「革命外交」的研究之一〉，《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期10（民國71年），35頁。
 29. 〈左宗棠的經世思想〉，《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12（民國72年），12頁。
 30. 〈左宗棠收復新疆的幾次重要戰役〉，《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學術論文》（第十九種），1984年，25頁。
 31. 〈孫中山先生對星馬華人文化與教育的影響〉，《近代中國》雙月刊（臺北），期45（民國74年），6頁。
 32. 〈辛亥革命前革命派與維新派在新馬的思想論戰〉，香港珠海學院主辦，「孫中山先生與中國現代化國際學術會議」論文，民國74年，8頁。
 33. “Rivary, conflicts and collaboration between the Hsiang (Hunan) and Huai (Anhui) Armies, 1860’s-1880’s,” in the *Journal of the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of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vol.XVI, 1985,12p.
 34. 〈新馬華人的抗日救亡運動，1937-1941〉，《南洋學報》（新加坡），卷40期1、2（1985年），42頁。

35. 〈抗日戰爭前期（1937-1941）星馬華人的抗日救亡運動〉，《孫中山先生與近代中國學術研討集》。高雄，國立中山大學，民國74年11月，20頁。
36. 〈九一八事變前中美撤廢領事裁判權的交涉—二、三十年代「革命外交」的研究之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15（民國75年），35頁。
37. 〈一九四二年初日本軍占領星洲「檢證」之役考實〉，《南洋學報》（新加坡），卷41期1、2（1986年），21頁。
38. 〈九一八事變前南京國民政府撤廢不平等條約的成就〉，國史館等編，《蔣中正先生與現代中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冊2），民國75年，26頁。
39. "The Sino-American Diplomacy over the Building of the Canton-Hankow Railway, 1897-1905: A Case of the American Investment in China during the Late 19th and Early 20th Centuries," *Bulletin of Historical Research*,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No.14 (1986), 38p.
40. 〈清季自強運動的失敗與清廷中心領導層的關聯〉，《清季自強運動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76年8月，25頁。
41. "China's Response to the Full-fledged Christian Challenge, 1860-1900: An Analysis of Chinese Anti-Christian Thought during the Second Half of the 19th century," *Asian Culture* (Institute of Asian Culture Studies, Hallym University, Korea), vol.4 (1988), 24p.
42. 〈中國外交史的研究〉，《六十年來的中國近代史研究》（上）。臺北：中央研究近代史研究所，民國77年6月，26頁。
43. 〈九一八事變（一九三一年）前中英撤廢領事裁判權的交涉—北伐後中國「革命外交」的研究之四〉，《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17（民國77年6月），45頁。
44. 〈一九四二年初日本軍占領星洲「檢證」之役考實〉，《中央研究院第二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明清與近代史組》（下）。臺北：中央研究院，民國78年6月，23頁。
45. 〈日本南京大屠殺的屠殺令問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 期18（民國78年6月），23頁。
46. 〈日軍南京大屠殺的屠殺數目問題—戰時日軍暴行的研究之三〉，《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期18（民國79年6月），44頁。
 47. 〈南京大屠殺的事實豈容抹殺—駁石原慎太郎之兩度狂言〉，《傳記文學》（臺北），卷58期4（民國80年4月），6頁。
 48. 〈日軍南京大屠殺所涉及的戰爭國際法問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20（民國80年6月），33頁。
 49. 〈王正廷的「革命外交」（1928-1931）與九一八事變〉，《中華民國建國八十年學術討論集》（第二冊）。臺北：國史館，民國80年12月，22頁。
 50. 〈有關南京大屠殺的屠殺數目與其所涉及戰爭國際法問題〉，《近代中國》雙月刊，期86（民國80年12月），8頁。
 51. 〈中英收交威海衛租借地的交涉，1921-1930〉，《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21（民國81年6月），20頁。
 52. 〈王正廷〉，《中華民國名人傳》（第七冊）。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民國77年，22頁。
 53. 〈伍朝樞〉，《中華民國名人傳》（第七冊）。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民國77年，16頁。
 54. 〈論王正廷的「革命外交」，1928-1931〉，《抗日戰爭研究》（北京），1992年期1（1992年2月），24頁。
 55. 〈日本軍南京大屠殺的屠殺數目問題〉，蔣永敬、張玉法主編，《近百年中日關係論文集》。臺北：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民國81年，36頁。
 56. 〈抗日戰爭期間日軍對晉東北、冀西、冀中的「三光作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22（下）（民國82年6月），28頁。
 57. 〈伍朝樞的外交事業〉，《近代中國歷史人物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82年6月，22頁。
 58. 〈日軍對晉東北、冀西、冀中的「三光作戰」考實〉，《抗日戰爭研究》（北京），1993年期4（1993年11月），27頁。
 59. 〈左宗棠與清季政局〉，《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23（上）（民國83年6月），32頁。

60. 〈日軍對晉東南、冀南、魯西的「三光作戰」〉，《第三屆近百年中日關係研討會論文集》（下）。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84年1月，44頁。
61. 〈日軍在山東的「掃蕩戰」與「三光作戰」〉，《中央研究近代史研所集刊》，期24（下）（民國84年6月），41頁。
62. 〈中日甲午戰爭後列強對中國鐵路、礦務利權的攫奪〉，《甲午戰爭一百週年紀念學術論文集》。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民國84年，30頁。
63. 〈北伐前後（民國十四年至二十年）廣州、武漢、南京國民政府的「革命外交」〉，《國父建黨革命一百週年學術討論集》（冊2），民國84年，35頁。
64. 〈抗戰期間日軍在華北的「三光作戰」暴行〉，「中華民國史專題第三屆討論會」，民國84年10月，23頁。
65. 〈抗戰期間日軍對晉東北、冀西、冀中的「三光作戰」考實〉，《第二屆近百年中日關係史國際研討會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頁319-333。
66. "China's Recovery of the British Hankow-Kiukiang Concessions in 1927," in *Modern China in Transition: Studies in Honor of Immanuel C. Y. Hsu*, eds, Philip Yuen-sang Leong and Edwin Pak-wah Leong (Claremont, Calif.: Regina Books, 1995), pp.127-170.
67. 〈九一八事變前後日本對東北（偽滿洲國）的毒化政策〉，《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25（民國85年6月），43頁。
68. 〈日軍南京大屠殺及其所涉及的戰爭國際法問題〉，《漢學研究之回顧與前瞻國際會議論文選集》（下）。新加坡：新加坡國立大學，1996年，頁184-193，10頁。
69. 〈中法戰爭期間（1881-1883-1885）湘軍與淮軍之間的合作與衝突〉，《海峽兩岸紀念劉銘傳逝世一百周年論文集》。安徽合肥：黃山書社，1998年，頁327-341。
70. 〈中日甲午戰爭後列強對中國鐵路、礦務利權的攫奪〉，見戚其章、王如主編，《甲午戰爭與近代中國和世界：甲午戰爭100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頁933-953，21頁。

71. 〈陳友仁與北伐前期（1926-1927）的「革命外交」〉，見《紀念北伐七十週年學術討論文集》。臺北：中華軍史學會，1997年，全載於《中華軍史學會會刊》，第2期（民國86年，1997），頁585-612，計28頁。
72. 〈日本在華北的販毒活動（1910-1945）〉，《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27（民國86年6月），頁45-91，46頁。
73. 〈左宗棠在浙閩粵勘定太平軍的主要戰役〉，見《近世中國之傳統與蛻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8，上冊，頁343-364；22頁。
74. 〈本世紀30年代前後日本對華北的毒化政策〉，《近代史研究》（北京），1997年第4期（1997年7月），頁92-139，48頁。
75. 〈戰後戰勝國對南京大屠殺日本戰犯的審判〉，見《紀念「南京大屠殺」六十週年學術研究會》（臺北）論文（民國86年12月14日），24頁，（發表於《近代中國》（雙月刊，臺北），第122期（民國86年12月25日）），頁6-22。
76. 〈耶穌會士與中俄尼布楚條約交涉〉，《清代前期在華天主教國際學術研討年會》（輔仁大學，民國86年12月12日至13日），24頁。
77. 〈日本在華中的販毒活動，1937-1945〉，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29（民國87年6月），頁179-222，43頁。
78. “The Rape of Nanking Re-assessed: A Study of the Sino-Japanese Controversy over the Factual Number of Massacred Victims” (manuscript, 41pages),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n the Nanking Incident to be held at the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on April 17-18, 1998 (in printing by the Princeton University Nanking 1937 Conference).
79. 〈辛亥革命前革命黨與維新立憲派在南洋的思想論戰〉，見《華僑與孫中山先生領導的國民革命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張希哲、陳三井主編），臺北：國史館，民國86年8月，頁9-20，12頁。
80. 〈戰後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對南京大屠殺日本戰犯的審判〉，見《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1998），頁367-385，19頁。

81. 〈德國對山東礦權的侵奪與山東收回五礦利權運動〉，《德占膠澳100周年學術研討會》論文，山東青島市，1988年8月，21頁。
82. 〈日本在華南的販毒活動，1937-1945〉，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31（民國88年6月，頁133-166），34頁。
83. "Japan's Involvement in Drug Trafficking in the Occupied Northern and Central China, 1937-1945" (Manuscript 20pp. Paper presented at the 6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Sino-Japanese Relations to be held at San Francisco, U.S.A on March 3-5, 2000 (in printing).
84. 〈南方軍政府時期的外交（1911-1925）〉，見國史館編，《中華民國外交志》（初稿47頁，即將出版）。
85. 〈南方軍政府時期的外交行政（1911-1925）〉，見國史館編，《中華民國外交志》（初稿18頁，即將出版）。

編纂

1. 《礦務檔》（八冊，與王璽合編）。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45年，5094頁。
2. 《中法越南交涉檔》（七冊，與王爾敏等合編）。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51年，4649頁。
3. 《教務教案檔》第一輯（三冊，與呂實強合編）。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63年，1709頁。
4. 《教務教案檔》第二輯（三冊，與呂實強合編）。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63年，1805頁。

書評

1. 〈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的抉擇〉，《美國研究》，期3（民國60年9月），8頁。
2. 〈美國外交政策的方向〉，《美國研究》，卷2期1（民國61年），11頁。
3. "Chuan Han-sheng's A Brief History of the Hanyeping Iron and Coal Mining and Smelting Company, 1890-1926," A (Book-review), in *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University of Hong Kong), vol. XIII, No.1, Jan. 1971,2p.

4. 〈譯述顏著《星馬華人與辛亥革命》一書之緣起〉，《近代中國》雙月刊，期13（民國68年10月），6頁。
5. 〈評入江昭著《超越帝國主義，1921-1931：遠東新秩序的尋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11（民國71年6月），6頁。
6. 〈評介鄧著《美國人與太平天國》〉，《文藝復興月刊》（臺北），期141（民國72年4月），2頁。

其他

1. 〈北伐時期美國的對華政策〉，《新思潮》，期83（民國47年），7頁。
2. 〈環繞「科學的歷史」的有關問題〉，《思與言》，卷3期1（民國54年），7頁。
3. 〈同文館〉、〈外債築路政策〉、〈收回礦權運動〉，《雲五社會科學大辭典—歷史學》（增訂本），民國62年，6頁。
4. 〈南洋方面研究孫中山先生的史料與史學〉，《研究孫中山先生的史料與史學》。臺北：國史館，民國64年，6頁。
5. 〈《希臘歷史思想》緒言〉，王任光、黃俊傑編，《古代希臘史研究論集》。臺北：成文出版社，民國68年，17頁。
6. 〈當代漢學研究的趨勢與特徵〉，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史學會刊》，期26（民國71年4月），6頁。
7. "Chengting T. Wang's moderate 'Revolutionary Diplomacy', 1928-1931: An Analysis of the Diplomatic Endeavours of the Chines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Presented at the Asian Studies on the Pacific Coast: A Regional Conference of 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Salem, Oregon, U.S.A.) June 1987, 21p.
8. 〈東南亞華人的種族同化問題〉（譯作），《海外華人研究》（臺北），期1（民國78年6月），14頁。
9. 〈日本不配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見《聯合報》（臺北）「民意論壇」，民國86年2月15日。
10. 《被遺忘的大屠殺：1937年南京浩劫》（張純如著、蕭富元譯）序：〈日本應為戰時暴行反省、道歉、賠償〉，7頁。

11. 〈南京大屠殺鐵證如山，不容日人狡賴〉，見《中國時報》（臺北），「民意版」，民國88年2月24日。
12. 〈序：略論第二次中日戰爭史的研究〉，鄭浪平著，《不朽的光榮—第二次中日戰爭史》，7頁（1999年）。
13. 〈中國百年奮鬥的反思與前瞻〉，《海峽評論》，109期（2000年1月），頁19-24。
14. 〈日本右派否認南京大屠殺，中華民國為什麼不抗議？〉，見《聯合報》（臺北），民國89年1月25日，第15版。

《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第7期

本期內容要目

241頁 平裝 300元

論著

劉人鵬：「中國的」女權、翻譯的慾望與馬君武女權說譯介

王秀惠：種族歧視中的性別意涵：美國白人洗衣業主眼中的華人洗衣館
（1870-1920）

演講

Dorothy Ko：Rethinking Sex, Female Agency, and Footbinding

學術討論

翁玲玲：漢人社會女性血餘論述初探：從不潔與禁忌談起

Pamela Cox：Gender, Power and Penalty

研究動態

賴惠敏：檔案介紹：清代〈內閣題本刑科婚姻命案類〉

洪麗完：契約文書與性別研究：以《台灣社會生活文書專輯》為例

張淑卿：近年來台灣地區的「台灣婦女史」學位論文研究回顧（1991-1998）

書評

張哲嘉：A Flourishing Yin：Gender in China's Medical History, 960-1665

蔣竹山：從產婆到助產士：評介三本近代歐洲助產士與婦科醫學的專著



魏宏運

江沛*

魏宏運先生是國內外有影響的著名歷史學家，現任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小組成員、中國現代史學會名譽會長、天津市歷史學會名譽會長、香港學術評議局成員、《歷史教學》雜誌副總編、南京大學民國史研究中心名譽研究員、河南大學、安徽大學、河北大學歷史系兼職教授，曾任國務院學科評議組成員、中國史學會理事、中國現代史學會副會長、天津史學會理事長、南開大學學術委員會委員、南開大學歷史系主任等重要職務。

魏宏運先生一生致力於中國近現代史的學術研究，在孫中山研究、武漢國民政府、周恩來研究、抗日戰爭研究和近現代華北農村社會史研究等課題上，取得了許多令人注目的成就。

圍繞著對一代偉人孫中山的研究，是魏宏運先生涉足史壇的最初指向。

孫中山是一代偉大的革命家、思想家、政治家，他對於近現代中國社會的發展起到了舉足輕重的影響。因此，孫中山研究自然而然地成為史學界注目的焦點。魏先生初涉史壇的第一篇論文〈革命民主主義者孫中山〉（《歷史教學》1953年第3期），對中山先生所處的時代、其思想演變進行了深入的探討，迅速引起史學界的關注。隨後，他又發表了〈孫中山晚年的農民運動觀〉（收入《中國近代歷史的進程》）等有份量的論文，繼續推動著孫中山研究的深化。魏先生對孫中山的研究一直持續到70年代末，曾推出積多年心血之作《孫中山年譜》（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這部年譜是新中國出版的第一部關於孫中山的年譜，其側重於孫中山先生思想形成及發展的體例、夾敘夾議的獨特風格，獲得了史學界的讚許，被

* 南開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譽為資料詳實、繫年清晰，去偽存真，字簡事豐的精品。先生因之被視為孫中山研究的重要學者之一。

武漢國民政府雖然存在了較短時間，但由於處於北伐戰爭與第一次大革命轉折時期，成為民國史上一個重要問題。但限於資料與政治因素，史學界一直未能給予並得出較為準確的評價。1951年起，魏先生在講授《中國現代史》課程的同時，率先開始對武漢國民政府時期的政治史進行系列探討，先後發表了〈1927年武漢革命政府反經濟封鎖的鬥爭〉（《歷史教學》1963年第9期）、〈1927年武漢革命政府是怎樣走向反動的〉（《歷史教學》1963年第11期）、〈1927年武漢革命政府的北伐〉（《歷史教學》1964年第3期）、〈略談1927年大革命的失敗〉（《歷史教學》1964年第5期）、〈1927年南昌武漢之爭的實質〉（《歷史教學》1964年第6期）等十幾篇論文，就武漢國民政府時期的政治運作、性質及其對民國政治發展的影響進行了具有說服力的評析，其開拓性的學術成就贏得研究武漢國民政府史的專家所廣泛認可。

周恩來是南開校友，更是一代偉大的政治家，為億萬民眾所敬仰。魏先生在中國現代史的研究中，深感周恩來人格的偉大。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對周的研究中，他從《檢廳日錄》中發現1920年5月到6月初周恩來在獄中向難友講授馬克思主義的材料，這是過去鮮為人知的。於是，他相繼發表了〈周恩來和“五四”新文化運動〉（《光明日報》1979年4月24日，收入《紀念五四運動六十週年學術討論會論文選》）、〈覺悟社的光輝〉（《南開大學學報》1979年第4期）、〈周恩來共產主義思想形成初探〉（《光明日報》1983年4月20日，收入《中國近代歷史的進程》）等文，提出周是中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者之一的觀點。這幾篇文章在國內外得到了廣泛傳播。

抗日戰爭時期，是中國社會的一個顯著的分界線，國民黨的統治在戰爭中日益暴露出不少難以克服的頑症，中國共產黨則在戰爭期間日益壯大並最終奪取全國政權。這一時代的巨變，是探求中國現代歷史發展規律的“題眼”。不深入細緻地研究抗日戰爭時期的中國社會變化，就無以明白此後中國社會的發展走向。魏先生認為，中國共產黨的勝利開始於抗日戰爭時期，孕育在中共領導下的抗日根據地。於是，從80年代初起，先生開

始著力於對抗日戰爭歷史，尤其是華北抗日根據地史的研究。

先生從收集基本的資料入手，對浩若煙海的材料進行整理歸納、條分縷析，先後主編了《抗日戰爭時期晉察冀邊區財政經濟史資料選編》1-4 冊（南開大學出版社 1984 年版）、《抗日戰爭時期晉冀魯豫邊區財政經濟史資料選編》（上下）（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 1990 年版）兩部高質量的大型資料集。這兩部近 700 萬字的資料集，以“資料收集豐富、詳實可靠、分類恰當”的優點，成為今天抗日根據地史研究必備書，也為先生贏得了聲譽。

先生對抗日戰爭史的研究是全方位、多視角的。他發表有〈論晉察冀抗日根據地貨幣的統一〉（《近代史研究》1987 年第 2 期）、〈抗戰初期國民政府的經濟政策透視〉（《民國檔案與民國史學術討論會論文集》，檔案出版社 1988 年版）、〈關於抗日戰爭時期亂後戰場的幾個問題〉（《歷史檔案》1985 年第 3 期）、〈“不抵抗主義”剖析〉（《文史哲》1988 年第 4 期）、〈抗戰初期中國人口大遷徙〉（《中國史論集》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4 年版）、〈重視抗戰時期金融史的研究〉（《抗日戰爭研究》1994 年第 2 期）等代表性論文，顯示出其作為一位歷史學家對中國現代歷史深刻的理解。在其著重研究的華北抗日根據地史方面，先生由經濟史入手，循序漸進至全面分析，先後發表了〈論華北抗日根據地繁榮經濟的道路〉（《南開學報》1984 年第 6 期）、〈抗日游擊戰推動了抗日戰爭的歷史進程〉（《中外學者論抗日根據地》，檔案出版社 1993 年版）等有關論文，推出《華北抗日根據地記事》（主編，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晉察冀抗日根據地財政經濟史稿》（主編，檔案出版社 1990 年版）、《抗日戰爭與中國社會》（遼寧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等專著。其中《華北抗日戰爭根據地史》（主編，檔案出版社 1990 年版）獲得天津市第 5 屆社會科學成果評比一等獎，1995 年又獲國家教委人文社會科學成果評比二等獎。眾多的科研成果，為其贏得了極高的聲譽，他被國內外公認為抗日戰爭史專家。在他的主持下，1984 年 8 月、1991 年 8 月兩次舉辦抗日根據地史國際學術討論會，極大地推動了抗日根據地史的研究。南開大學歷史系中國現代史學科成為國內外注目的抗日戰爭研究中心。目前，由先生主編約 150 萬字的《抗日戰爭史》也即將完稿，備受國內外同行的關注。

在不斷深入的歷史研究中，社會史的研究成果往往可以為宏觀分析提供更加有力的證據。先生認為，現代中國革命的勝利，實質上是中共獲得了占中國 90%以上人口農民支持的結果。那麼，民國時期的中國農村社會究竟是怎樣一種實態？農民為什麼選擇了中共？這些問題成為史學界研究現代中國史不可迴避的課題。與國外學者著眼於中共農村政策的切入點不同，魏先生認為，一個社會革命的成功，是必須要有相應的社會變動為前提條件的。於是，他探求的目光在充分肯定中共農村政策的基礎上，自然而然地落在了華北農村劇烈的社會變動上。從 1986 年起，魏先生開始承擔國家“七五”社科規劃重點項目“三四十年代華北農村調查與研究”的研究工作，他帶領一批研究人員長年奔波在華北農村的山山水水，通過調查、訪問收集到大量鮮為人知的資料，十年艱辛得出的研究成果之一《三四十年代華北農村調查與研究》（主編，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出版後頗受好評，1998 年獲得教育部第二屆高等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歷史類評比三等獎。從 1990 年開始，魏先生率諸同仁又與慕名而來的日本一橋大學社會學部三谷孝教授等人組成中日華北農村社會聯合調查團，對原滿洲鐵路株式會社所做的調查進行跟蹤調查，其成果《農民が語る中國現代史》已由日本內山書店出版。在掌握大量資料的基礎上，魏先生寫出了諸如〈抗戰第一年的華北農民〉（《抗日戰爭研究》1993 年第 1 期）等一批極富新意的論文，顯示出其不凡的學術見解。先生還指導其博士生、碩士生集中力量對民國時期華北農村社會進行研究，經過幾年努力，這些博士論文、碩士論文形成了對華北農村社會諸方面的研究成果系列。目前，先生正主持著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太行山區農村調查與研究”的工作，力求把華北農村社會史的研究推向更高的層次。

自 1951 年留校任教以來，魏先生為南開大學歷史系的建設與發展貢獻了自己全部精力，為南開大學贏得了不少聲譽。他先後開設了中國現代史、五四新文化運動史、武漢國民政府研究、南昌起義、土地革命史、中國現代史研究、抗日戰爭史研究、中國現代史研究概論、博士生專業英語等課程。為配合教學，由他主持編寫的國內第一本中國現代史教材《中國現代史稿》（上下）（主編，黑龍江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以內容充實、資料詳盡、語言生動、觀點鮮明等特點受到普遍歡迎，先後被 100 多所大學

的歷史學科中國現代史專業作為本科基礎教材，行銷數十萬冊。針對教學需要，先生又主編了《中國現代史資料選編》（1-5冊）（主編，黑龍江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中國現代史大事記》（黑龍江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等教材配套書，這些書一直是國內中國現代史本科教學的基礎用書。1992 年，由先生主編的《中國通史簡明教程》（主編，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2 年版）問世，這是一本面向國外高校學習中國歷史的專用書，先生及合作者以簡明的層次、生動的文筆和高度的概括，將中國五千年燦爛文明生動地展現在世界青年的眼前，被稱作“了解中國歷史的捷徑”，書出版後不久即被新加坡國立大學列為指定教材。從 1982 年至今的十幾年中，在魏先生培養下，有 7 人獲得了碩士學位、26 人獲得了博士學位；日前仍有就讀博士生 13 名。已畢業的博士中，大多晉升為教授、副教授，成為各地的學術骨幹。

魏先生的學術成就，在海內外史學界引起廣泛注目。他先後應邀到美、日、丹麥、德、英、法、澳等國和港台地區的 20 多所大學和研究所講學，頗受好評。1983 年 8 月至 1984 年 3 月，應美國國際學者交流委員會的邀請，先生作為 Fulbright 教授赴美講學。在 Montana University 期間，他主講了中國近代史、中國現代史、今日中國、中國文化，中國現代史諸問題研究等課，後又應邀到 University of Wisconsin、Brandeis University、Boston College、Billings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 演講並參加 Lewis-Clark State College 主辦的 International Exchange Conference。他在中國歷史研究上深厚的造詣和幽默風趣的演講方式，使其成為 Montana University 最受歡迎的教授之一。該校人類學系主任在給南開大學校長的信中熱情地寫道：“Montana University 非常尊重和欣賞魏宏運教授！他的課和與我們共同舉辦的討論會有很多人參加，非常受學生們歡迎。因此，魏教授為師生更好地了解中國做出了不容置疑的貢獻。”1984 年 4 月、1990 年 10 月，先生應邀赴日講學，先後在立命館大學、中央大學、一橋大學、中國農村慣性調查研究會、日本辛亥革命研究會、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金澤大學、鹿兒島經濟大學就中國現代史諸問題發表演講，引起了日本史學界的關注。1994 年 9-11 月，魏先生又赴丹麥、德國、英國、法國訪問講學，就中國抗日根據地經濟建設、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的經濟政策及“文化大革命”

等問題進行了專題講座，獲得了較大的成功。他不僅與英國、日本的一些學校進行聯合培養博士，還多次為自己的博士生爭取出國深造、講學的機會，這種教學方法使得博士生們得以迅速成長。

魏先生認為，加強國際間的學術交流，不僅有利於開闊眼界，容納新的思維方式和方法，站在國際學術的最前沿，而且也可以讓國外學術界了解中國史學家的研究成果，提高中國史學在國際上地位。1984年8月及1991年8月，在魏先生主持下，南開大學先後主辦了兩屆「中國抗日根據地歷史國際學術研討會」，來自美、加、荷、英、法、澳、日、韓等國的學者匯集南開校園，就中國抗日戰爭及抗日根據地時期的諸問題進行了廣泛的學術交流。先生在兩次會議上所做的主題報告，成為會議的中心議題，受到與會專家的普遍好評。這兩屆會議，是中國目前僅有的兩次關於抗日根據地史的國際學術研討會，在國內外學術界引起了很大反響。《光明日報》、《天津日報》、《歷史研究》、《歷史教學》、《中共黨史研究》、《抗日戰爭研究》、《高校社科情報》以及日本的《歷史學研究》等報刊先後予以報導。會後出版的兩冊論文集，被國內外專家譽為“中國抗日戰爭史研究的最新進展和最高水平的體現”。

作為一位傑出的史學家，年逾古稀的魏宏運先生仍然勤奮地工作著，始終保持著旺盛的學術創造力，在為事業的薪火相傳而努力著，他依然在憧憬著新世紀的曙光！

魏宏運先生論著目錄

專 書

1. 《史可法》，上海新知識出版社，1955。
2. 《八一起義》，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
3. 《南昌起義》，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
4. 《孫中山年譜》，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
5. 《中國近代歷史的進程》，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
6. 《抗日戰爭與中國社會》，遼寧人民出版社，1997。

論文

1. 〈革命民主主義者孫中山〉，《歷史教學》，期3，1953。
2. 〈關於武漢革命政府的幾個問題〉，《歷史教學》，期5，1958。
3. 〈1927年武漢革命政府反經濟封鎖的鬥爭〉，《歷史教學》，期9，1963。
4. 〈1927年武漢革命政府是怎樣走向反動的〉，《歷史教學》，期11，1963。
5. 〈1927年武漢革命政府的北伐〉，《歷史教學》，期3，1964。
6. 〈略談1927年大革命的失敗〉，《歷史教學》，期5，1964。
7. 〈1927年南昌武漢之爭的實質〉，《歷史教學》，期6，1964。
8. 〈周恩來和“五四”新文化運動〉，《光明日報》，1979，4月24日。
9. 〈覺悟社的光輝〉，《南開大學學報》，期4，1979。
10. 〈周恩來共產主義思想形成初探〉，《光明日報》，1983，4月20日。
11. 〈論華北抗日根據地繁榮經濟的道路〉，《南開學報》，期6，1984。
12. 〈關於抗日戰爭時期亂後戰場的幾個問題〉，《歷史檔案》，期3，1985。
13. 〈論晉察冀抗日根據地貨幣的統一〉，《近代史研究》，期2，1987。
14. 〈“不抵抗主義”剖析〉，《文史哲》，期4，1988。
15. 〈1947年終國內戰的驚人發展〉，《歷史教學》，期5，1988。
16. 〈抗戰初期國民政府的經濟政策透視〉，《民國檔案與民國史學術討論會論文集》，檔案出版社，1988。
17. 〈中國現代史〉，《中國歷史學四十年》，書目文獻出版社，1989。
18. 〈檔案整理與歷史研究〉，《北京檔案史料》，期1，1989。
19. 〈鐵肩擔道義，熱血灑中華〉，《天津日報》，1989，10月18日。
20. 〈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探索〉，《中州學刊》，期3，1990。
21. 〈吳店村を事例とした中國農村變革の歴史〉，《日本專修大學社會研究所月報》，1991。
22. 〈抗日游擊戰爭推動了抗日戰爭的歷史進程〉，《光明日報》，1991，10月23日。
23. 〈三四十年代日本的鴉片侵略政策〉，《檔案史料與研究》，期4，1993。
24. 〈太行山和中國革命的勝利〉，《光明日報》，1993，6月21日。
25. 〈抗戰第一年的華北農民〉，《抗日戰爭研究》，期1，1993。

26. 〈孫中山晚年的農民運動觀〉，《中國近代歷史的進程》，1993。
27. 〈不抵抗主義的產生及其後果〉，《抗日戰爭與中國歷史》，遼寧人民出版社，1994。
28. 〈抗戰初期中國人口大遷徙〉，《中國史論集》，天津古籍出版社，1994。
29. 〈重視抗戰時期金融史的研究〉，《抗日戰爭研究》，期2，1994。
30. 〈中國抗日戰爭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重要組成部分〉，《人民日報》，1995，7月27日。
31. 〈抗日根據地奠定了抗日戰爭的勝利〉，《歷史教學》，期9，1995。
32. 〈歷史不會忘記〉，《光明日報》，1995，8月28日。
33. 〈關於三四十年代冀東農村的調查〉，《光明日報》，1995，2月13日。
34. 〈從沙井村的變化看中國農村的現代化〉，《中國歷史與史學》，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
35. 〈1939年中日贛鄂湘戰爭評述〉，《南開大學歷史系建系七十五週年文集》，南開大學出版社，1998。
36. 〈1939年華北大水災述評〉，《史學月刊》，期5，1998。
37. 〈反“九路圍攻”和台兒莊大捷的歷史思考〉，《今晚報》，1998，7月7日。
38. 〈台兒莊戰役論述〉，《檔案史料與研究》，期2，1998。
39. 〈台灣之學派〉，《歷史教學》，期7，1998。
40. 〈抗戰時期中國西部地區的開發與進步〉，《紀念七七抗戰六十週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國史館印行，1998。
41. 〈抗戰時期孤島的社會動態〉，《學術研究》，期5，1998。
42. 〈陳嘉庚筆下的延安與重慶社會〉，《北京日報》，1998，7月12日。
43. 〈華北農民之源流及其在三十年代的群體活動〉，《中國歷史上的農民》，常建華主編，台北：馨園文教基金會，1998。
44. 〈論晉察冀抗日根據地的社會變遷〉，《華北抗日根據地與社會生態》，馮崇義、古德曼編，當代中國出版社，1998。
45. 〈八路軍和新四軍反限制鬥爭的勝利〉，《光明日報》，1999，3月26

日。

46. 〈三四十年代太行山的農業發展〉，張國剛主編，《中國社會歷史評論》，卷1，天津古籍出版社，1999。
47. 〈抗戰初期工廠內遷的剖析〉，《南開學報》，期5，1999。
48. 〈南京保衛戰初探〉，《江南學院學報》，期2，1999。
49. 〈內容詳實，刻意求新—《評孫中山與國民革命》〉，《學術研究》，期5，1997。

主 編

1. 《中國現代史資料選編》（1-5冊），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1。
2. 《抗日戰爭時期晉察冀邊區財政經濟史資料選編》（1-4冊），南開大學出版社，1984。
3. 《中國現代史大事紀》，與梁寒冰主編，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4。
4. 《華北抗日根據地紀事》，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
5. 《抗日戰爭時期晉察冀邊區財政經濟史資料選編》（一），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2月版，1990。
6. 《抗日戰爭時期晉察冀邊區財政經濟史資料選編》（二），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7月版，1990。
7. 《晉察魯抗日根據地財政經濟史稿》，檔案出版社，1990。
8. 《華北抗日根據地史》，與左志遠主編，檔案出版社，1990。
9. 《中國通史簡明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
10. 《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冀東農村社會調查與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
11. 《民國史紀事本末》，（共七卷），遼寧人民出版社，1999。

其 他

1. 〈《百色起義與龍州起義》序〉，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2. 〈《中央蘇區土地革命研究》序〉，南開大學出版社，1991。
3. 〈《山西抗日戰爭史》序〉，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
4. 〈《社會的縮影—民國時期華北農村家庭研究》序〉，西北大學出版社，1993。

5. 〈《農民が語る中國現代史》序〉，日本內山書店，1993。
6. 〈《羅素與中國》序〉，三聯書店，1993。
7. 〈《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河南冀東保甲制度研究》序〉，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
8. 〈《保衛滇緬路》序〉，雲南人民出版社，1994。
9. 〈《晉綏革命根據地研究》序〉，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4。
10. 〈《第三次國內額銘戰爭時期的土地改革》序〉，杭州大學出版社，1994。
11. 〈《中國現代史教學與研究》序〉，吉林大學出版社，1995。
12. 〈《理想、歷史、現實—毛澤東與中國農村經濟變革》序〉，山西高校聯合出版社，1995。
13. 〈《臨時大總統和他的支持者》序〉，中國文史出版社，1996。
14. 〈《中日民間經濟外交》序〉，人民出版社，1997。
15. 〈《蔣介石和他的幕僚們》序〉，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
16. 〈《蔣介石與國民黨的腐敗》序〉，安徽大學出版社，1997。
17. 〈《抗戰時期大後方經濟研究》序〉，中國檔案出版社，1998。
18. 〈《鄉村集市與近代社會：二十世紀前半期華北鄉村集市研究》序〉，當代中國出版社，1998。
19. 〈《閩浙贛根據地的金融》序〉，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
20. 〈《太行烽火紀事》序〉，《中共檔史研究》，期5，1999。



研究概況

琉中關係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

赤嶺 守*

琉球問題研究在台灣或許少受重視，然而琉球與台灣之間，除了地理位置相當接近之外，更有相當多層且密切的關係。比方說，假若某一天台海發生戰爭，琉球必定受到波及。因為美國為了維護亞太地區的安全，以琉球為基地做軍事佈署，亦即亞太地區所有的軍事活動都需以琉球為起點，因此琉球與台灣可以說是生命共同體。此外，琉球的認同問題與台灣的國家意識形態也有其相似且值得去做比較研究之處，所以我們彼此之間應有更深一層的認識與了解。現在，我先來簡單說明一下琉球發展的歷史，然後再談研究的情況，大家比較容易了解。

一，琉球史略

琉球的面積為二千二百四十九·九一平方公里，約是台灣的十六分之一。人口有一百三十萬多，現稱為沖繩縣，是日本都道府縣四十七個行政單位之一。在考古的發掘中，有中國唐朝的開元通寶、南宋、元朝陶磁器的出土，甚至春秋戰國時代燕國的明刀錢在琉球也有發現，而到底琉球與中國何時開始有了密切的關係仍有待考證。

琉球與中國之間，國與國關係的建立則是在明朝。1372年明洪武帝派遣楊載招諭琉球中山王察度進貢，察度命其弟泰期為進貢使第一次向中國

* 琉球大學教授

朝貢。1404年，明永樂帝冊封武寧（中山王察度世子）為中山王，是中國第一次冊封琉球國王。從此琉中進貢・冊封的宗屬關係開始確立。琉球對中國朝貢之初並無定期，1475年起開始了兩年一貢，並在中國皇帝登基時派遣慶賀使；駕崩時派遣進香使；冊封時派遣請封使及謝恩使，琉中之間多年來維持着和平穩定的關係。在此同時，琉球對日本亦展開善隣外交，直至1592年，豐臣秀吉出兵朝鮮，並施予薩摩藩（現在日本九州南部鹿兒島縣）對琉球的軍事指揮權，1609年薩摩藩派遣一百艘船、軍隊三千人侵略琉球，琉球戰敗，國王尚寧被俘。1611年與論島（位於沖繩本島北方）以北割讓給薩摩藩，開始向薩摩藩納貢，貢品起初為琉球特產，而後依次以錢銀、米、糖等為貢品。薩摩藩允許琉球的內政由琉球國王自治，並繼續向中國朝貢，受中國的冊封，而部分的朝貢貿易却受其控制，其中所謂的「御糸荷」是薩摩藩委託進貢船在福州販賣的日貨，並命其由中國購回生絲、藥材等物。此外，琉球在幕府將軍即位及琉球國王即位時分別對江戶幕府有派遣慶賀使和謝恩使的義務。於是琉球既為中國冊封體制下的藩屬國，亦是日本幕藩體制下薩摩藩的附庸國，成為中日兩屬的國家。

明治維新時期，日本在領土劃定上便將南方的琉球問題與北方領土問題共同視為主要的政治課題。就琉球歸屬問題的處理上，日本對冊封體制的宗主國中國心存顧忌，未敢冒然將琉球合併。1871年10月發生了「宮古島民遭難事件」（「牡丹社事件」）琉球宮古島民六十六人因遭暴風漂流到台灣東南端的八瑤灣，登陸後，其中五十四人被原住民殺害）。日本政府獲知此事後，開始為兼併琉球而有所行動，採取循序漸進的步驟，先於1872年9月設置「琉球藩」，由外務省管轄。又見中國對牡丹社事件怠於處理並推托生蕃為化外之民，日本乃藉此聲稱琉球人民為其屬民而出兵台灣，製造了1874年的「台灣事件」。之後，中日簽訂互換條款，其中第一條便為「日本國此次所辦，原為保民義舉起見。中國不指以為不是。」，此中「保民義舉」一詞無形中給予日本併合琉球行動之合理與正當化，日本於是積極展開對琉球一連串的強制「處分」，1875年7月日本政府派遣處分官松田道之到首里城向琉球國王交付命令書，命令書中載明，禁止再對中國進貢，受中國冊封，以及派遣慶賀使，並且命令琉球使用明治年號，改革藩政，廢止福州琉球館（琉球向中國進貢時先到福州，因此在福州設

有琉球館稱爲「柔遠驛」，是供使節住宿之處），以及命令藩王尚泰留居東京等。琉球對日本政府的處置並非無抗拒的接受，最初琉球王國被改制爲「琉球藩」時，琉球王府便派員向日本外務省要求維持原有之國體、政體，並獲日本政府的承諾。「台灣事件」之後，日本政府的命令書再度引起琉球王府的恐慌，如命令書中所規定，已將琉球國體、政體完全瓦解，也就等於是琉球王國的滅亡，琉球王府一再的請願未果。接着日本政府又於 1879 年 4 月有所謂的「廢藩置縣」，動員警力 160 餘人、步兵 400 人，在武力威嚇之下，將琉球以內政問題處理的形式，強制編入中央集權國家體制，設置「沖繩縣」。

1879 年的「廢藩置縣」正式將王國體制解體。面對日本政府強行的「處分」，各種形態的救國運動以士族爲中心積極地展開。當時在琉球，發起了對縣政的不服從運動以及罷工運動等，但大都在日方的鎮壓之下平息下來。置縣處分後，爲維持國家存續唯一能求助的對象就是中國，琉球以王府高層官員爲中心陸續密航中國，並以福州、北京、天津爲據點長期地展開救國運動，其運動被當時警察等取締當局稱爲「琉球復舊運動」。

日本對改置後的沖繩縣施行同化政策，在日本教育體制的實施下，琉球獨享有教科書及學費全免的優惠，儘管如此琉球 80 年代前半的就學率仍然很低，僅佔全就學人口的 3% 左右。1885 年中法戰爭之後，中國放棄越南的宗主權，接着又於 1895 年甲午戰爭後簽訂的馬關條約中放棄對朝鮮的宗主權，至此中國在東亞的冊封體制已完全瓦解，琉球復國運動唯一的寄託也隨之成泡影。同化政策也因此琉球產生了極大的成效，由 1907 年就學率上昇至 93% 顯然可見。日本對琉球所施行的同化與台灣和朝鮮的不同，琉球並非殖民地，而是被定位爲「內地」，琉球的同化是在受逼迫之下多少帶有自發性的，其主要的動力就是「日琉同祖論」。「日琉同祖論」最早是於 17 世紀後半，由攝政向象賢所提出，近代英國語言學者 Basil Hall Chamberlain 將二者在語言學上所做的比較研究以及鳥居龍藏在考古、人類學上的論證再次肯定了「日琉同祖論」，而影響最大的要屬伊波普猷（沖繩學之父），統合了言語、文學、歷史學、民俗學、人類學等近代科學的學術成果來論證兩民族的同源同種，其理論廣泛地被琉球社會所接受。於是「日琉同祖論」成爲日本明治維新後，在政策上和學術上引導琉球的主

流，也在琉球王國解體後，在認同上給琉球人帶來莫大的影響。

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戰敗，1946年1月GHQ（同盟軍總司令部）宣佈日本與琉球列島行政分離（開羅會議時，蔣介石與羅斯福討論過琉球問題，國史館蔣介石的隨員日記中提到蔣希望戰後琉球和朝鮮一樣獨立）。因為行政分離的實施，戰後琉球人民若選擇獨立並非不可能實現，確實戰後不久琉球內部也有部分人主張琉球獨立，當時日本共產黨亦表支持，然而琉球一般大眾却没有獨立之意願。1951年4月，琉球人民組織了「日本復歸促進期成會」，聲明日本與琉球列島的行政分離是民族的分裂，希望民族統一，早日回歸日本並停止美國的託管。當時的民調顯示有86%贊成復歸，7%贊成美國託管，獨立派有2%，不表態的有4%。1951年9月，舊金山和約締結，其中第3條規定北緯29度以南的奄美·琉球列島交由美國託管（美國承認日本對琉球的潛在主權）。琉球由美國託管之同時琉球人亦積極展開祖國復歸運動，1969年11月美日政府雙方終於達成協議，於1972年5月將琉球歸還給日本，併入日本而成爲沖繩縣。

琉球人現在的國家認同是：我們是日本國沖繩縣民，我們是日本人。日本雖是我們一致的歸依，但如前任沖繩縣知事在記者會上說過「雖然努力要做一個日本人，但却做不到」。琉球人的心態上似乎仍有些矛盾存在，這是無可否認的事實，至今彼此之間似乎總有一道難以逾越的鴻溝。

二、琉中關係史的研究情況

明治維新以後，學術研究在「日琉同祖論」大力的影響之下，琉中關係史研究顯得相當低調，1920年代，《隋書》流求國傳中流求國地理位置的認定引起爭議，一說是台灣，一說是沖繩，未有定論，至今兩派說法仍舊相持不下。關於戰前的琉中關係史研究，最值得一提的就是《歷代寶案》的發現。《歷代寶案》是集琉球王國歷1424（永樂22）年以至1867（同治6）年的外交往來文書而成。編列由一集（49卷）、二集（200卷）、三集（13卷）、別集（4冊卷）、目錄（4卷）共計270卷（冊）。文書往來以冊封體制下的宗主國中國爲中心，範圍擴及朝鮮和暹羅、安南、滿刺加、佛太泥、爪哇、蘇門答刺、三佛齊，巡達等東南亞諸國。《歷代寶案》是

依原保管於天妃宮的外交文書，即所謂「舊案」之文書所編集而成的。在王國時代完成了兩部並分別由首里王府與天妃宮收藏。然而，1879年廢藩置縣政策強制執行之際，內務大臣伊藤博文命處分官松田道之沒收琉球與中國之關係文件，並將其携至東京。

於是從此原由首里王府保管之《歷代寶案》以及琉中關係文獻史料大量被携出王府，轉而由內務省保管。但內務省保管之《歷代寶案》在1923年因關東大地震而遭焚毀。另一方面，由天妃宮保管的《歷代寶案》在廢藩置縣之後，一直被當作秘密文書收藏着，曾由天妃宮移至明倫堂，後又先後流入久米村各世家。而1931年，《歷代寶案》意外地被發現藏於久米村神村家。《歷代寶案》之發現，立刻受到日本學術界的注目。將之視為國寶級的史料，並託由沖繩縣立圖書館保管，製作複本，供人調閱。台北帝國大學也完成了《歷代寶案》全卷的抄寫，當時任教於台北帝大文政學部史學科的小葉田淳就是利用《歷代寶案》從事琉明關係史的研究，其研究成果收錄於《中世南島通交貿易史の研究》（日本評論社，1939）。此外，利用《歷代寶案》進行研究的有東恩納寬惇《黎明期の海外交通史》（帝國教育會出版部，1941），安里延《沖繩海洋發展史—日本南方發展史序說—》（三省堂，1941）。以上的研究成果主要是利用《歷代寶案》第一集的資料所完成的。

戰後，日本被迫與琉球列島行政分離，琉球在交由美國託管的情況下，1950年起積極展開祖國復歸運動，認同的問題因而受到矚目，分裂民族的統一問題也成為學會上熱門的議題。一般的學說將明治政府強制執行的「琉球處分」定位為民族統一的第一階段，然而明治政府的兼併措施，究竟該屬何種民族統一，就此統一問題，較具代表性的論證有井上清所定義的「侵略性的統一」，又有新里惠二所主張的「日本政府主導的民族統一」，學者之間各持不同的看法展開議論。1950年代起，在民族統一問題熱烈討論之際，琉中關係史研究的焦點也集中於琉球的歸屬問題，直至1970年代，清末的琉球歸屬問題交涉一直是學界的主流。

1972年，琉球復歸日本，琉球的復歸運動也終於落幕，可說是琉中關係史研究上劃時代的一年。縣立圖書館收藏的《歷代寶案》在1945年的第二次大戰中遺失，當時為避戰火，《歷代寶案》及縣立圖書館的其他藏書

一度被移送至沖繩本島北部的羽地村源河，但美軍的北部攻陷，使得縣立圖書館的藏書遺失殆盡，僅留下戰前的影印本（晒藍圖）和抄寫本，1972年6月台灣大學發行影印本之後，利用《歷代寶案》第二集·第三集從事研究者增多。再且，1972年也正是日本與中國恢復邦交的一年。之後，不僅和台灣的研究者，即和中國大陸的研究者做學術交流的可能性也提高了。特別是自1980年以來，在各種國際學術會議當中，研究發表領域除歷史以外，還包括有考古、語言（官話）、文學（漢詩）、民俗（道教、風水等）、音樂（御座樂、路次樂〈明清系音樂〉等）、衣食（官服、冠船料理〈接待冊封使節的料理〉）等各領域。定期舉辦的國際學術會議如下所列，學術會議論文集並於會後出版。

（一）中琉歷史關係國際學術會議

- 第一屆中琉歷史關係國際學術會議（台北、1986年11月23~25日）
《第一屆中琉歷史關係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1987年10月印行）
- 第二屆琉中歷史關係國際學術會議（那霸、1988年10月13~14日）
《第二回琉中歷史關係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1989年3月印行）
- 第三屆中琉歷史關係國際學術會議（台北、1990年11月16~19日）
《第三屆中琉歷史關係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1991年6月印行）
- 第四屆琉中歷史關係國際學術會議（那霸、1992年11月21~22日）
《第四回琉中歷史關係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1993年3月印行）
- 第五屆中琉歷史關係學術會議（福州·泉州、1994年11月24~27日）
《第五屆中琉歷史關係學術會議論文集》（1996年7月印行）
- 第六屆中琉歷史關係學術會議（北京、1996年10月29~31日）
《第六屆中琉歷史關係學術會議論文集》（預定出版）
- 第七屆中琉歷史關係國際學術會議（台北、1998年10月31~11月1日）
《第七屆中琉歷史關係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1999年12月印行）

（二）琉球·中國交涉史研討會

- 第一屆琉球·中國交涉史研討會（那霸、1992年8月30日）
《第一屆琉球·中國交涉史研討會論文集》（1993年3月印行）
- 第二屆琉球·中國交涉史研討會（北京、1993年10月9日）

- 《第二屆琉球・中國交涉史研討會論文集》（1995年3月印行）
第三屆琉球・中國交涉史研討會（那霸、1995年8月3日）
《第三屆琉球・中國交涉史研討會論文集》（1996年9月印行）
第四屆琉球・中國交涉史研討會（北京、1997年10月28日）
《第四屆琉球・中國交涉史研討會論文集》（1999年3月印行）
第五屆琉球・中國交涉史研討會（那霸、1999年3月6日）
《第五屆琉球・中國交涉史研討會論文集》（1999年10月印行）

「琉中歷史關係國際學術會議」、「中琉歷史關係國際學術會議」曾由琉中關係歷史會議事務局（那霸），中琉文化經濟協會（台北），中琉關係研究所（福建師範大學）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北京）各單位負責主辦，「琉球・中國交涉史研討會」是由沖繩縣教育委員會與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互為主辦單位。

沖繩縣史料編集所自1989年起27年計畫進行《歷代寶案》的校訂本譯注本，辭典等的編集事業。其紀要《歷代寶案研究》之刊印如下。

- 《歷代寶案研究》創刊號（1990年3月）
《歷代寶案研究》第二號（1991年3月）
《歷代寶案研究》第三・四合併號（1993年3月）
《歷代寶案研究》第五號（1994年3月）
《歷代寶案研究》第六・七合併號（1996年3月）
《歷代寶案研究》第八號（1997年3月）
《歷代寶案研究》第九號（1998年3月）
《歷代寶案研究》第十號（1999年3月）

日本國內尤其是復歸後，中琉關係叢書的出版增多。其中出版有野口鐵郎《中國と琉球》（開明書院、1977），宮田俊彦《琉球・清國交易史》（第一書房、1984），王耀華《琉球・中國音樂比較論》（那霸出版社、1987），赤嶺誠紀《大航海時代の琉球》（沖繩タイムス社1988），窪德忠編《沖繩の風水》（平河出版社、1990），徐恭生《中國・琉球交涉史》（西里喜行・上里賢一譯、ひるぎ社、1991），上原善哲《歷代寶案の文書構成及び文書收發経路の研究》（1992），邊土名朝有《歷代寶案の基礎的研

究》（校倉書房、1992），西里喜行《琉球救國請願書集成》（法政大學沖繩文化研究所、1992），《中國福建省・琉球列島交渉史の研究》（第一書房、1995），宮田俊彦《琉明・琉清交渉史の研究》（文獻出版、1996），邊土名朝有《琉球の朝貢貿易》（校倉書房、1998），金城正篤《沖繩から中國をみる》（沖繩タイムス社、1998），夫馬進《使琉球録解題及び研究》（榕樹書林、1999）等。

戰後，台灣以及中國國內亦陸續有琉中關係史研究的專書發行。在台灣出版的有陳大端《雍乾嘉時代的中琉關係》（明華書局、1956），梁嘉彬《琉球及東南諸海島與中國》（東海大學、1965），徐玉虎《明代琉球王國對外關係之研究》（學生書局、1982），徐玉虎《明代與琉球王國關係之研究》（1986），楊中揆《琉球古今談》（台灣商務印書館、1990）等。

在中國大陸出版的有吳壯達《琉球與中國》（正中書局、1948），傅角今・鄭勵儉《琉球地理志略》（上海商務印書館、1948），瀨戶口律子《琉球官話課本研究》（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1994），丁鋒《琉漢對音與明代官話音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謝必震《中國與琉球》（廈門大學出版社、1996），米慶余《琉球歷史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等。

中國在東亞的屬國之中，關於冊封使錄類的記載要屬琉球最多。其譯注的出版如周煌《琉球國志略》（平田嗣全譯注、三一書房、1977），徐葆光《中山傳信錄》（原田禹雄譯注、言叢社、1982），李鼎元《使琉球記》（原田禹雄譯注、言叢社、1985），陳侃《使琉球錄》（原田禹雄譯注、榕樹社、1995），汪楫《使琉球雜錄》《中山沿革志》《冊封疏鈔》（原田禹雄譯注、榕樹書林、1997），張學禮《使琉球紀》《中山紀略》（原田禹雄譯注、榕樹書林、1998）等。此外也有琉球漢詩的譯注本，如島尻勝太郎・上里賢一譯注《琉球漢詩選》（ひるぎ社、1990），輿石豐伸《北燕游草》《閩山游草》《續閩山游草》（オフィス・コシイシ、1997）等。

另外，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清代中琉關係檔案選編》（中華書局、1993年〈收錄宮中硃批奏摺與軍機處錄副奏摺〉）、《清代中琉關係檔案

續編》（中華書局、1994年〈收錄內閣題本〉）、《清代中琉關係檔三編》（中華書局、1996年〈收錄內務府的咨文、移會、知會〉）以及《清代琉球國王表奏文書選錄》（中華書局、1997年〈收錄琉球國王表文·奏文〉）之發行之後，利用此類檔案的研究者增多。最近利用「內閣禮科史書」、「內務府奏案」、「內務府月摺」等未出版之檔案史料完成的研究報告亦不少。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收藏之「明清檔案」、近代史研究所收藏之「清季外交檔」、故宮博物院收藏之「軍機檔」、「宮中檔」等檔案中的琉中關係史料亦頗受矚目。最近又有從「方志」、「族譜」、「文集」之中取材琉中關係史料者，其他又如台灣大學所收藏的「冠船日記」、「親見世日記」及東京大學法制史資料室，國立公文書館收藏的「琉球王國評定書文書」也是有關進貢與冊封的重要史料，此外相關的滿文史料收集、引用，也是目前研究的趨勢。

有關琉球的人文、社會、自然諸科學等研究總稱為「沖繩學」，琉中關係史研究也在其中確立其學術領域。原保管於首里王宮之琉中關係史料於廢藩置縣之際遭日本政府沒收之後，並於關東大地震時被燒毀，殘餘的史料又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禍波及而遺失，史料在經歷了兩次大浩劫之後，使得戰前、戰後的研究都需在史料發掘、收集、重刊之中展開，此項作業仍是今後研究上極重要的一環。現在琉中關係史研究以日本國內、台灣以及中國大陸三地為中心展開，各領域的研究都有相當的進展，目前唯缺各項研究領域的體系化統合作業，於是各領域的體系化研究將成為今後的課題及努力的方向。



研究概況

「南開大學周恩來研究中心」簡介

王永祥*

該「中心」是南開大學為推進「周恩來學」的發展經校長辦公會研究決定設立的全校性專門研究機構，為中國各高校中唯一的周恩來研究中心。其成因，與周恩來係南開大學校友有一定淵源。該「中心」成員，不僅包括南開大學歷史系、歷史研究所、中文系、哲學系等單位對周恩來研究有素的專家、學者，而且適量吸收了天津市有關單位如天津師範大學、天津教育學院、天津社會科學院、天津「周恩來、鄧穎超紀念館」中，在周恩來研究方面有較高水平成果的研究人員。此外並吸收北京的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大學、軍事科學院等單位的著名學者參加。現有正式成員 64 人。

該「中心」在 1997 年 6 月 13 日正式成立，當時其中心工作是籌備召開「第二屆周恩來研究國際學術討論會」（南開大學曾于 1988 年 10 月召開了「第一屆周恩來研究國際學術討論會」）。「第二屆周恩來研究國際學術討論會」以南開大學和天津市政府的名義于 1998 年 2 月 27 日至 3 月 2 日在天津舉行，有 180 位國內外學者與會，其中來自 13 個國家和地區的 40 位境外代表出席。會後出版了論文集《中外學者再論周恩來》。該書計 70 萬字，由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

「南開大學周恩來研究中心」的學術研究工作，以周恩來的生平和思想為主線，深入到相關的政治、經濟、外交、軍事、哲學、文化藝術、倫

* 南開大學歷史系教授兼周恩來研究中心主任

理學等重要領域，開展重大課題的研究，形成系列成果。現階段該「中心」確定的重點研究課題包括：周恩來青年時代研究；周恩來與共產國際和蘇聯；周恩來與中日關係；周恩來與中美關係；周恩來人格論；周恩來哲理觀；周恩來與中國華僑和華人等等。

「中心」按計畫定期開展規範的學術活動，邀請海內外的著名專家、學者作學術演講，舉辦系列講座。同時，努力拓展資料來源，尤其著重國內外檔案資料、口碑史料、音像資料的收集和整理。

「中心」的長遠目標，是以南開大學為基地，會同校內外、海內外同道，長期、持久地推進「周恩來學」的建設與發展，不斷取得高水平研究成果，逐步把「南開大學周恩來研究中心」建設成為全國民間最具實力的周恩來研究的學術中心、資料中心、海內外周恩來研究的聯絡、交流中心。

「中心」聘請了前周恩來總理辦公室副主任、現任中央文獻研究室顧問的李琦先生、著名英籍華裔女作家、《周恩來和他的世紀》一書作者韓素音女士和著名國際活動家、日本創價學會名譽會長、國際創價學會會長池田大作先生為名譽主任。「中心」主任由兼任中國現代史學會副會長的南開大學歷史系博士生導師王永祥教授擔任，並設有由劉焱教授為主任的學術委員會。

「中心」設有專門的「周恩來研究學術基金」，用以支持重大研究課題的立項、出版；支持周恩來研究資料的收集、整理和出版；獎勵優秀研究成果；支持舉辦周恩來研究的學術會議；並設立研究生參加周恩來研究的專項獎學金。該基金嚴格按《周恩來研究學術基金管理條例》及《實施細則》進行管理。

「中心」聯繫地址：（郵政編碼）300071，地址：天津市南開大學周恩來研究中心，聯繫電話和傳真號碼：0086-(0)22-23508002，電子郵件：wyx@nankai.edu.cn



研究概況

「蔣介石先生與日本」研究計畫

黃自進*

一、緣起

中日兩國唇齒相依，關係密切，惟回顧中國近代史，日本對中國所造成的嚴重傷害，是無庸贅言的，但論及中國現代化，日本的影響，也是不容抹殺。中日關係之演變，為影響亞洲太平洋地區歷史發展的首要因素，面對二十一世紀即將到來的亞太世界新紀元，中日兩國應如何加強合作與交流，尤為時代問題之重心。歷史研究的目的是在於瞭解過去，把握現在，策勵將來；因此國內外精研近代中日兩國歷史的學者，為了共同促進中日關係歷史演變的深入研究，以提供未來中日兩國合作發展方向之參考，特別籌組了「蔣介石先生與日本」研究群。

二、研究架構與方法

蔣介石先生一生的史事，與中國近代史密不可分，也是近代中日關係史上最重要的一頁。一九〇六年（光緒 32 年）蔣介石先生以十九歲弱冠之年遠赴東京深造，此一舉動不僅展現出蔣先生對近代文明的仰慕，也間接的表徵出當時的時代風尚，認為以傳統的中國文化，已不足以抗衡西方文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化，中國惟有以日本為師，借重日本吸取西方文化的經驗以謀國家改造，才可避免亡國亡種之虞，已成為當時憂國志士的共同體認。這份自覺觸動了東瀛留學熱，也啟動了蔣先生遠赴日本留學的決心。

一九〇七年（光緒 33 年）蔣介石先生再度赴日。這是蔣先生在日本原欲學軍事不成，不得已返國後，以全國陸軍速成學堂在籍學生身份，被清廷甄選為留日陸軍學生，派遣到東京振武學堂接受陸軍軍官學前教育。蔣先生的再度赴日，是屬官派，因而有其個人意願成份，也有國家政策為其奧援。先是，一九〇五年（光緒 31 年）清廷廢除科舉制度，轉而以留日學生為從新培養國家政軍幹部的捷徑。蔣先生的公派留學，就是此種學國以日本為師下的一連串措施中的一位才俊。

既然國家政策已轉成以日本為師，這也使得中國近代化過程中，日本的影響無所不在。此一時代背景，落實到蔣先生的生涯，就成為蔣先生的一生事業皆與日本息息相關。東瀛留學之旅，是蔣先生加入革命陣營的關鍵，而留學生的學生生活，是他近代文明知識的奠基，尤其是在日本所培養的軍事素養，使他在往後的戎馬生涯中，締造撥亂反正的不世軍政之功，進而能一躍成為國家領導人的原由之所在。

一九一四年（民國 3 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也是日本的大正三年，日本開國元勳井上馨稱這次大戰為「大正新時代的天佑」。天佑使日本成為協約國軍需品的供應者，也使日貨取代了歐洲產品在中國所擁有的市場，這些商機解決了日本財政因日俄戰爭期間所帶來的龐大外債及連年赤字貿易所面臨的破產危機。使日本從國際上的債務國轉為債權國。經濟上的獨立發展，無疑的加強了日本推展帝國主義的雄心。一九一五年（民國 4 年）的二十一條要求，展現出日本有鯨吞中國野心的同時，也揭露出日本已自認有排除所有西方勢力而獨霸中國的實力。

日本的國家政策既然已定位於鯨吞中國，當然會逼使以追求中國國家主權獨立為己任的中國國民革命運動非以日本為主敵不可。這也使得一九二六年（民國 15 年）蔣先生先後出任國民政府的軍事委員會主席、國民革命軍總司令之後，在實際擔負中樞責任之同時，他與日本的關係自然成為一部抵抗侵略，維護中華民族獨立自尊的抗爭史。

一九四三年（民國 32 年）蔣先生應美國總統羅斯福之邀，出席開羅會

議，這是國民政府繼解除不平等條約以後，在爭取國家主權獨立及生存空間上的另一外交上的重大建樹。開羅會議中，確立中國收回東北三省、台灣、澎湖主權以外，也因蔣先生的建言，日本的天皇制才得以保存。天皇制的存續以及蔣先生對日本的「以德報怨」政策，可謂是建構戰後日本經濟奇蹟的兩大支柱。戰後日本的再起，不僅是有關日本國民的福祉，也是西太平洋地區能夠免於赤化的重大關鍵。是以，蔣先生的高瞻遠矚，替中日兩大民族拓展國運開創未來，提供了可資合作的無限空間。

蔣先生一生的學習，一生的事業以及終極一世的遺產，既然皆與日本息息相關。職是之故，如欲徹底理解蔣先生，必得以徹底掌握蔣先生與日本的關係為前提。如欲徹底釐清恩怨相交的近代中日關係，也必得以徹底解析蔣先生與日本的關係為首要。是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特別網羅了三十六位中日學者，擬就教育、文化、政治、經濟、軍事等不同的角度對蔣先生與日本的關係作一全面性的探討。再則，為求周全，本計畫分兩階段執行，第一階段則以大陸時期的蔣先生與日本的關係為主，至於國民政府遷台後蔣先生與日本關係的後續發展，則擬為第二階段的研究主軸。

三、參與計畫人之簡介

(一)日本部分

1. 山田辰雄：慶應義塾大學教授，國際知名學者，以研究國民黨左派而聞名於世，負責政治史。
2. 山室信一：京都大學教授，以研究滿洲國以及日本法制官僚制度的形成而為學術界稱道，負責政治史。
3. 小林英夫：早稻田大學教授，為日本學術界研究「大東亞共榮圈」的首席，負責經濟史。
4. 久保田文次：日本女子大學教授，以研究辛亥革命而活躍於日本學術界，負責外交史。
5. 川島真：北海道大學助教授，為日本學術界研究國民政府外交政策的後起之秀，負責外交史。

6. 石川禎浩：神戶大學助教授，以研究中國共產黨與日本關係而嶄露頭角，負責政治史。
7. 玉井清：慶應義塾大學教授，以研究大正時期的政黨政治而為日本學術界重視，負責政治史。
8. 佐藤公彥：東京外國語大學教授，以研究義和團事件而享譽日本學術界，負責文化思想史。
9. 松浦正孝：北海道大學助教授，以研究戰前的日本政商關係而一鳴驚人，負責政治經濟史。
10. 姬田光義：中央大學教授，為第二次世界大戰華北戰場「三光作戰」研究的專家，負責軍事史。
11. 野島陽子：東京大學助教授，以研究日本軍事現代化而為日本學術界稱譽，負責軍事史。
12. 陶德民：關西大學教授，原出身於上海復旦大學，日本大阪大學文學博士，以研究日本漢學而為日本學術界器重，負責文化思想史。
13. 狹間直樹：京都大學教授，國際知名學者，以研究五四運動及中日文化交流史而聞名於世，負責文化思想史。
14. 細野浩二：早稻田大學教授，以研究中日文化思想史而被日本學術界推重，負責文化思想史。
15. 淺野和生：平成國際大學助教授，以研究大正時期的陸軍軍事教育而受人注目，負責軍事教育史。
16. 飯島涉：國立橫濱大學助教授，以研究殖民地經濟而享有盛名，負責殖民地經濟史。
17. 藤井昇三：電氣通訊大學名譽教授，為日本學術界研究孫中山的首要代表，負責文化思想史。
18. 鐸木昌之：聖學院大學助教授，以研究韓國獨立運動史而獨樹一格，負責研究日本殖民地時期蔣介石先生與韓國獨立運動的關係。

(二)國內部分

1. 朱重聖：國史館副館長，負責外交史。
2. 朱浚源：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負責外交史。
3. 呂芳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兼所長，負責政治史。
4. 李恩涵：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負責政治史。
5. 林滿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負責經濟史。
6. 林美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負責經濟史。
7. 陳三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負責政治史。
8. 陳慈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負責經濟史。
9. 陳存恭：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兼任研究員，負責政治史。
10. 陳在俊：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會前專任委員，負責政治史。
11. 張玉法：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負責政治史。
12. 張瑞德：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負責軍事史。
13. 許育銘：國立東華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負責政治史。
14. 黃克武：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負責文化思想史。
15. 黃自進：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負責文化思想史。
（兼任總召集人）
16. 劉鳳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兼任研究員，負責軍事史。
17. 劉維開：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會總幹事，負責政治史。
18. 謝國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負責政治史。

四、執行辦法

本計畫自民國八十九年四月起以三年為期，擬以大陸時期的蔣先生與日本的關係為研究主軸，對近代的中日關係作一全盤了解。為求客觀、公信，本計畫以建立資料庫重返歷史現場為訴求。是以，本計畫一成立後，首先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設立工作室，負責蒐集國史館、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會以及其他相關機構所收藏的蔣先生與日本的有關資料以外，也同時在東京、北京及南京分設工作據點，負責搜集珍藏在各處的有關檔案。工作室之主要目標，一、為統籌整理各地搜集來之資料，以便三年計

畫期結束後，可彙編成資料集出刊。二、為支援學術研究。工作室在統籌彙編資料集之同時，將隨工作之進度定期將新搜集到的資料分送給參與學者，以便掌握到最新的資訊。此外，工作室也接受學者委託，代為搜集史料，務求每位學者皆能掌握十全史料，出爐論文篇篇皆具公信力。

本計畫以國內及日本學者為主，但在推展期間，也會斟酌商請世界各地具有代表性的學者參與，總計名額擬定為五十位左右。力求此一研究計畫，有其時代性的指標意義。

計畫之第一年，成立工作室及各分支據點，展開資料的搜集工作，並建立通訊網，確立參與每位學者的研究領域。

計畫之第二年，工作室根據參與研究同仁所提交的研究計畫進度表，彙編呈報給參與同仁外，並根據同仁所提交的進度表，對每位同仁的研究領域再做調整及確立的工作，力求避免重覆的勞動。

計畫之第三年，工作室將所搜集之資料，彙編成資料集以便出刊；同時要求參與學者提交研究成果。

五、成果及意義

本計畫在三年執行期滿後，可望有兩項具體成果。一是出版資料集。這是設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工作室在三年期內整合來自台北、東京、北京及南京各地的資料後，由近代史研究所、國史館及黨史會合作下，一年之內負責出版。二是召開國際學術會議。本計畫在執行期滿後六個月內由近代史研究所領銜舉辦成果展示會議，除參與學者提交論文出席報告以外，並對外公開廣邀國內外學者共襄盛舉。會議論文集在會議召開後一年之內，以中、日文同時出版。中文方面是由近代史研究所負責出刊，日文方面則委由總召集人在日本另擇出版商。

本計畫以三十六位中日學者為基軸，並準備陸續邀請中國大陸、美國、歐洲、澳洲、東南亞等各地具有代表性學者參與。因此本計畫將可望有五十位學者貢獻智慧。以一個人物為主題，並動員全世界各具代表性的區域學者參與，這種研究規模，在國內學術界實屬創舉，在國外歷史學界也是罕見。是以，本計畫的研究成果不僅可期待有新意之外，也可視為是世紀

交替之際全球性的歷史學界菁英針對近代中日關係史群策群力的歷史性回顧，其智慧結晶也必定可被視為跨世紀的文明遺產。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三十二期

本期論文要目

347 頁 平裝 250 元

林滿紅：日本政府與台灣籍民的東南亞投資

游鑑明：近代華東地區的女球員（1927-1937）：以報刊雜誌為主的討論

賴惠敏：從契約文書看清代旗地政策與典賣（1644-1820）

呂妙芬：儒釋交融的聖人觀：

從晚明儒家聖人與菩薩形象相似處及對生死議題的關注談起

金觀濤、劉青峰：近代中國「權利」觀念的意義演變—從晚清到《新青年》

陳儀深：自由民族主義之一例：論《獨立評論》對中日關係的處理

李達嘉：1920年代初期上海商人的民治運動—對軍閥時期商人政治力量的重新評估

本刊「研究概況」欄，歡迎讀者撰文介紹各學術機構有關中國近現代史之研究情況，以及對各個研究領域進行回顧與檢討。



研究概況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進行之 專案研究計畫

(民國 87 年 7 月 1 日~91 年 6 月 30 日)

江淑玲*輯

一、日治時期台灣人的海外經驗—以赴「滿洲國」的台灣菁英為中心
(中央研究院主題計畫「日治時期台灣的官僚與商紳」之子計畫)

計畫主持人：許雪姬

計畫執行期：民國 87.7.1-90.6.30

計畫內容：

「滿洲國」成立於一九三二年三月一日，由於是新成立的「國家」，需人孔亟；且在台灣總督府的官員亦有調赴滿洲的，援引台人赴滿洲，再加上「滿洲國」建立後加強對台貿易並設大同學院(官吏養成學校)、建國大學等對台招生，也對外舉行官吏考試，這些都是台灣人赴滿洲的重要誘因。此外由於當時島內只有一所醫學校，因此滿洲醫科大學等醫學校(哈爾濱醫科大學、新京醫科大學、開拓醫學院、滿洲醫科大學、盛京醫科大學)就成為台灣子弟嚮往的深造場所。本計畫擬研究日治時期在滿洲活動的台灣人有何意義，即：1.對當地及引進滿洲經驗回台灣有何影響；2.台籍醫生對滿洲國公共衛生之貢獻為何；3.戰後這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審

批活躍在東北的台灣人，如何面對中共勢力及如何回到台灣，其以後發展如何；4.日治時期台灣人到海外，其「國家認同」為何？對戰後台灣人的認同問題，是否起了一定的影響。

二、日治時期台商的台日經貿活動(中央研究院主題計畫「日治時期台灣的官僚與商紳」之子計畫)

計畫主持人：林滿紅

計畫執行期：民國 87.7.1-90.6.30

計畫內容：

在日本統治台灣的五十年當中，日本是台灣最主要的貿易對象。在台日這項重要的貿易之中，台灣商人究竟扮演何種角色？針對此一課題，本計畫擬再細分以下子題加以探討：1.台灣商人經營台日貿易的方式為何，與日商之間有何關聯？2.台日貿易是否以台日為貿易範圍而已，還是台灣商人經由日本進行更大規模的跨國貿易？3.台灣商人對日本的貿易地區，在神戶、大阪、橫濱、長崎、函館等之中，以那些港口往來較多？4.因日本各港口，原有華僑商人進行東亞海域的貿易，台商在推展台日貿易的過程中，與華僑的關係為何？5.來自台灣不同地區的台商，其在參與台日經貿活動的過程中又有何種商業網絡的編織？6.所有這些商貿網絡的編織對戰後仍極重要的台日貿易，乃至台灣對外貿易發生了何種影響？對越來越受國際學界重視的亞洲內部關係史又具有何種意義？

三、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文化建設基金管理委員會、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補助計畫)

計畫主持人：呂芳上

計畫執行期：民國 87.7.1-90.6.30

計畫內容：

本計畫係在 1992 年本所展開為期三年的「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的基礎上進行的第二期三年計畫。計畫包括承續與創新兩項，即繼續出版備受學界重視的《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年刊、繼續徵集近代中國婦女史資料並召開小型研討會；創新部分是建立「近代中國婦女史」

電子資料庫及研究網，編纂並出版近代中國婦女史史料、進行婦女口述歷史訪問，並預備於 2001 年召開「近代中國婦女史」國際學術會議同時出版論文集，進一步推動近代中國婦女史的研究。

四、抗戰時期黨國體制的運作：「國防最高委員會」研究，1937-1945
(中央研究院主題計畫「抗戰時期國民政府的政策制定與實施」之子計畫)

計畫主持人：呂芳上

計畫執行期：民國 88.7.1-90.6.30

計畫內容：

本計畫係以抗戰時期之「國防最高委員會」作為對象，這是戰時國民政府與中國國民黨之間的聯繫機關，實具戰爭決策功能的角色。本計畫完成後，對學術研究之貢獻：1.對二〇年代以來形成的「黨國體制」，在戰時中國的發展會有新的認識。2.國防最高委員會，係由戰前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及戰爭發生後的「國防最高會議」遞變而來，為戰時黨政軍最高指揮機構。對這一機構的了解，將是進一步了解戰時的中國軍事、內政、外交、財經狀況的樞紐。3.透過這一機構的附屬機關，如財政、經濟、教育、法制委員會的運作，可明瞭政府部門重要措施在戰時的決策模式與影響，對戰時中國的了解有積極的意義。

五、侍從室與戰時中國，1936-1945(中央研究院主題計畫「抗戰時期國民政府的政策制定與實施」之子計畫)

計畫主持人：張瑞德

計畫執行期：民國 88.7.1-90.6.30

計畫內容：

侍從室係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的簡稱，由於性質特殊，因此一直充滿神秘色彩。早在抗戰時期，即已有人稱之為蔣中正的「智囊團」，也有人稱之為國民政府的「鳳凰池」。二次大戰以後，學者對其評價依舊不一。本計畫完成後之貢獻為：1.對侍從室的組織、功能、影響，以及侍從人員的來源、訓練、升遷、出路、日常生活和心態等

問題，能有全盤的瞭解。2.對抗戰時期國家與社會的關係，以及國民政府政權的本質，能有更為深入的認識。

六、禦敵與國家重建：抗戰時期高等教育的角色，1937-1945(中央研究院主題計畫「抗戰時期國民政府的政策制定與實施」之子計畫)

計畫主持人：胡國台

計畫執行期：民國 88.7.1-90.6.30

計畫內容：

民國二十六年「抗日戰爭」發生後，國民政府採行「抗戰與建國並行政策」，期望「抵禦外侮與建設國家」這兩方面的重大任務，能夠同時完成。抗戰時期，日軍佔領大部分沿海精華區域，政府財稅收入大量減少，而在軍費驟增的情況下，如何兼顧教育投資，是當時政府推行此一政策的重大考驗。本計畫的目的，在探討戰時高等教育政策擬訂的過程如何？其內涵為何？為配合執行新政策，有何新措施以確保政策的完成？在執行期間，是否遭遇人事、財務、行政的困難？如何克服？最後，評估其高等教育政策，是否配合達成原定「抗戰與建國並行政策」的目標。

七、抗戰時期國民政府的物資統制與物價管理(中央研究院主題計畫「抗戰時期國民政府的政策制定與實施」之子計畫)

計畫主持人：林美莉

計畫執行期：民國 88.7.1-90.6.30

計畫內容：

抗戰時期的經濟發展，是以統制經濟為主軸，故本計畫以物資統制與物價管理這二件攸關民生的政策，檢討戰時國民政府對於戰時生產與消費統制活動。透過研究戰時國府為了解決經濟問題而從事的政策擬定及其執行成果，將有助了解國府如何在戰時封鎖的困境中鞏固政權，以及大眾百姓如何適應時變謀求生計的歷史實景。透過本計畫的研究成果，能夠全面檢討抗戰時期國民政府的經濟統制活動，提供學界了解戰時國家與社會互動影響的具體現象。

八、明清文化脈絡中的男女之別(中央研究院主題計畫「明清文化中

的情、欲與禮教」之子計畫)

計畫主持人：熊秉真

計畫執行期：民國 88.7.1-91.6.30

計畫內容：

本計畫擬利用明清婦幼科醫學生理學與家庭、個人傳記性資料為主軸，輔以哲學思想、法律文獻等素材，進一步探究在當時社會中，從生命週期的角度看來，男女兩性性別差異之成立與加強階段(青春婚育期)，與男女兩性性別差異減弱與不分的情況(嬰幼、老年期，及其餘特殊社會文化場合)。最後，二者合觀，以及綜論明清歷史文化脈絡中男女之別之各種不同面相，及與當時社會文化習俗中對兩性生命週期之瞭解與建構之關係。

九、清代禮制與人情之衝突(中央研究院主題計畫「明清文化中的情、欲與禮教」之子計畫)

計畫主持人：張壽安

計畫執行期：民國 88.7.1-91.6.30

計畫內容：

傳統的禮制建立在「宗法觀念」上，由宗法導引而鋪展開一蛛網細密的尊卑上下親疏遠近的彝倫秩序。傳統中國的社會秩序就立基在此一宗法秩序下。十七、八世紀以降，情欲與人之價值的省覺，導致此一禮制受到挑戰。本研究即以宗法制度的中心，亦即人倫秩序最核心的「父子關係」為題，討論一架跨在「血緣」與「嗣統」之間的尖銳課題：即，「為人後者為其本生父母宜服何喪？」此一議題。本研究即針對十八世紀學者對此議題的討論、爭辯，觀察學界如何在情與禮制的對峙下，作出權衡。並藉以觀察血親價值與宗法理念之間的升降變化。

十、明清諧謔文學中的情色與倫常(中央研究院主題計畫「明清文化中的情、欲與禮教」之子計畫)

計畫主持人：黃克武

計畫執行期：民國 88.7.1-91.6.30

計畫內容：

本計畫以明清諧謔文學為基本史料探討其中所反映的情色意識與倫常觀念。採取「情緒史」(emotional history)的研究方法，探討明清時代笑話書、笑話小說所反映古人笑的世界。此一視角強調人類的情緒反應並非亙古如常，而是因時代、地域、階級、性別、族群等文化因素而有所改變。本計畫乃從此一角度分析明清時代有關情色、倫常笑話的心理意涵。探討一些出版於不同時代的笑話書與笑話小說，分析各書如何處理情色、倫常等主題；並進而觀察其處理方式的變遷，以及此一變遷與時代思潮、社會生活之變化的相互關係。以歷史研究為主軸，但是此一研究所應用的史料與所討論的議題涉及明清思想史與社會經濟史，以及文學、哲學、心理學(尤其是近年來所謂「本土心理學」)等專業，亟須科際整合式的交流討論，以提昇研究深度。

十一、亞太經濟中台灣、香港間之競合關係—日治台灣時期之經驗(中央研究院東北亞區域研究分支計畫)

計畫主持人：林滿紅

計畫執行期：民國 88.7.1-89.12.31

計畫內容：

在亞太經濟之中，台灣與香港均居於重要中轉地位。日治台灣時期，台灣與香港之間，存在著競合現象。香港是台灣進口洋貨的重要轉口地，也是台商從事證券投資的重要金融中心。在此同時，日本政府刻意以台灣取代香港扮演亞太營運的中轉角色，如拒絕在亞太地區廣設分行的匯豐銀行設分行到台灣或大連，另設台灣銀行於台灣，並將台灣銀行分行設於大連以南中國沿海及東南亞各主要城市。原經由香港轉口至東南亞之台貨亦轉而由台灣直接出口至東南亞。本研究擬根據前此探討日治時期台商島外經貿活動所累積的大量資料，再蒐集香港地區檔案資料及存放英國的怡和洋行檔案、匯豐銀行檔案、英國駐臺、駐日領事報告，本院已徵集之台灣總督府檔案、台灣日日新報、日本的通商彙纂等資料探討日治台灣時期台灣、香港間的競合現象，以加強了解亞太經濟的歷史根源，並為當前的發展提出若干建言。

十二、海峽兩岸的名分秩序交涉(中央研究院東北亞區域研究分支計畫)

計畫主持人：張啓雄

計畫執行期：民國 88.7.1-89.12.31

計畫內容：

海峽兩岸的交涉，約可大分為原則與實務二種。實務，一般都是指實際而切身的問題，常有迫切的需要感，較容易從理性層面來加以判斷。相反的，原則多與文化價值有關，在主觀情感上，卻有無法割捨的強烈存在。因此，難以用理性的字眼來加以判斷。這就是海峽兩岸交涉之所以在實務上容易有所進展，但在名分秩序論上卻不易有所突破的道理所在。剖析海峽兩岸交涉停滯不前的原因，或企圖推動海峽兩岸的談判，非先理解名分秩序論的構造不為功。戰後海峽兩岸的名分論爭，約有國號、年號、政府名義、國旗、國徽、國際機構、國際會議、區域組織、外交締結、奧林匹克代表權、領袖互訪、姐妹市締結、定點直航等問題，甚至於牽涉到漢賊不兩立、一國兩制(一個國家兩個實體)、改朝換代等問題，這些都是我們處理兩岸交涉之問題、剖析名分秩序論構造之時的最佳素材。

十三、日本經營東北亞煤業之研究，1937-1945(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計畫)

計畫主持人：陳慈玉

計畫執行期：民國 88.8.1-89.7.31

計畫內容：

東北亞的煤炭資源主要是在日本、中國和朝鮮，中日戰爭爆發以後，日本當局實施戰時經濟體制，煤炭是各種產業的原動力，所以成為被統制的物品之一。日本政府為調整煤炭的軍需和民需，乃公佈相關法令，成立「石炭統制會」，以國家權力來經營煤業。而對於中國和朝鮮亦採取不同的煤業統制方式。本研究計畫擬利用中日雙方的檔案、滿鐵和相關財閥的資料，探討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煤業統制政策的形成過程、在中國和朝鮮的不同的統制經營方式和成果，以及中、日、朝之間煤和人力資源的互補性，並比較當時各國以煤業為基

礎的相關產業的發展。

十四、中國近世同性親子關係研究(2/2)—明清母女關係之演變(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計畫)

計畫主持人：熊秉真

計畫執行期：民國 88.8.1-89.7.31

計畫內容：

本計畫將在父子關係演變基礎上，將母女關係之演變與父子關係之演變，作一對照研究。明清時期的母女關係，研究軸線有三，一是女性身體為代代生物性繁衍(biological reproduction)之工具，母女之間，如何傳遞經驗，接替進行。二是婦女在家族中，亦為社會文化、道德倫常傳遞(socio-cultural reproduction)之主要媒介，其於代代母女之間，如何交換經驗賡續執行。三是此生物性繁衍與社會文化上之傳遞，實際上在代代母女之間，每個個人的生命循環(life course)中，如何由幼而少，由少年而長成，由婚育而衰老。此一週而復始的過程，是明清社會、政治、文化史之大論述，交互影響之關係又如何。

十五、兩岸僑務公私機構變遷之比較研究(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計畫)

計畫主持人：朱浚源

計畫執行期：民國 88.8.1-89.7.31

計畫內容：

本計畫擬探討兩岸公私僑務機構自 1949 年以來的種類、層級，以及其運作的成效。就組織結構言，可以分為種類與層級兩種：1.種類：兩岸處理僑務的機構其實不只限於台北中華民國的僑務委員會與北京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務院僑務辦公室。其他仍有一些公立的(如人大)；半公立的如僑聯總會、華僑協會總會等。2.層級：這些公私機構的層級，兩岸也不同，大陸有六個以上的層級，台灣則似乎祇有中央，底下似乎別無層級。就運作功能言，這些種類與層級的公私僑務機構，其運作起來功效如何，也是本研究的一大課題。希望藉著結構與功能兩大研究途徑及定量與定性分析，從歷史發展的角度，以 1949 至 1998

爲主要範圍，初次一探其究竟。

十六、清前期懲辦八旗貪官的案件與分析(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計畫)

計畫主持人：賴惠敏

計畫執行期：民國 88.8.1-89.7.31

計畫內容：

清代前期是歷史上少有的盛世時期，到了十八世紀下半葉，乾隆皇帝逐漸揮霍豪華、恣意聚斂、廣徵捐輸、強令報效，使得官員不得不下交徵、層層剝削，督撫司道取之州縣，州縣則取之百姓。當時懲辦貪污案件雖一時遏止了官吏對百姓的盤剝，安定社會秩序，長期看來終究是一個不可治癒的痼疾。本計畫擬在幾個研究角度下探討：皇權與紳權的消長、法制史與經濟史的研究觀點。此外，從查抄貪污官員的家產中不但可以找到田產資料，而且他們經營的各種商舖店號也不勝枚舉。過去學者研究清代的經濟發展時，較忽視官僚資本的累積與運用，本計畫將從官員的家產檔案來瞭解這些問題。

十七、一九五〇年代中美關係之探討(3/5)(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計畫)

計畫主持人：張淑雅

計畫執行期：民國 88.8.1-89.7.31

計畫內容：

一九五〇年代是台灣生死存亡的關鍵時期，也是台灣近年來政、經與兩岸關係發展方向的奠基時代，美國則在此發展過程中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本計畫係在前此就美國對台政策的本質之研究基礎上，利用已獲准閱覽的檔案，探討國府遷台後，在冷戰高峰期間的一九五〇年代，爭取生存與發展的過程。除了探討國府對於韓戰與兩次台海危機的因應策略外，對於國府安定民心、爭取正統的策略(包括有關台灣法定地位、國際承認、聯合國代表權的爭取、對美國與中共談判之因應等)，以及對於反攻大陸觀念的演變與政策執行等等，均希望能加以探討，以期對我國生存發展的關鍵能有所瞭解。另一方面則融

合過去的研究成果，對中美間的互動作較深入的分析。

十八、傳統婚姻觀的內在轉化—十八世紀經學與社會文化史的探討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計畫)

計畫主持人：張壽安

計畫執行期：民國 88.8.1-89.7.31

計畫內容：

近代婚姻觀念最大別於傳統的是：婚姻從「兩個家族」的事，轉變成「兩個人」的事。從晚清一直到民初的修法運動，可說是中國法律由家族主義轉向個人主義，由家族制轉向契約制的過程。本計畫將焦點置於鴉片戰爭前的中國，即十八世紀後期到十九世紀中葉，亦即考證學最盛之時，論述焦點為分析清儒的婚姻觀念，如何從「成婦之意重於成妻之意」，轉變為「成妻之意重於成婦之意」，並指出「貞潔」觀念在此一轉變中的弔詭性的助力，藉以說明在西方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等觀念傳入中國之前，中國的知識界是如何在傳統禮制、禮意與人性情欲覺醒之間，針對傳統提出抨擊，針對現實要求變革。

十九、抗戰時期國民政府的直接稅制度(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計畫)

計畫主持人：林美莉

計畫執行期：民國 88.8.1-89.7.31

計畫內容：

民國成立以來，政府稅收以關稅、鹽稅和統稅為主，三稅均為間接稅，稅收無法充裕成長。國民政府奠都南京後，為籌劃國家建設，提倡有所得者即應徵稅的「直接稅」，徵稅對象包括個人工資、利息、財產租賃和遺產稅，以及公司行號的營業稅、契稅和印花稅等項目。抗戰爆發後，政府喪失關鹽統三稅的財源大宗，開發稅源成為當務之急，直接稅受到高度重視。一九四〇年六月，財政部設立直接稅處，該稅處業務龐雜，一九四三年三月升格為直接稅署，負責建立直接稅體制的工作。直接稅在抗戰時期成為國民政府重要的財政來源，同時也改變傳統中國的間接稅制度，完成中國近代租稅史的重大變革。

二十、中醫醫案的社會史分析(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計畫)

計畫主持人：張哲嘉

計畫執行期：民國 88.8.1-89.7.31

計畫內容：

本計畫擬從社會關係的角度探討歷史上醫案這種醫書體裁的編寫、使用、以及評價，從醫生的社會地位與學術互動這兩方面著眼，以現存 1949 年之前的相關醫籍探索醫案與世變的關係線索。研究時擬著重以下數點：1.醫生編寫與出版醫案的動機為何；而從醫生的角度來看，編撰醫案與其他體裁的醫書有何不同的效果？2.醫案的文體與其出版目的有無關連？3.其他醫生如何評價及閱讀出版的醫案？4.醫案在醫生之間學理說服中佔有何等角色？本研究計畫以宏觀的視野鳥瞰出傳統中國社會醫生間藉由醫案所搭建的群體互動關係；並為傳統醫者認證與接受醫學知識之活動與準則提供具體的例證。

二十一、孫立人案調查報告失落部分鑑定研究計畫(監察院補助計畫)

計畫主持人：朱宏源

計畫執行期：民國 88.10.1-89.7.31

計畫內容：

民國四十四年所發生的「孫立人·郭廷亮叛亂嫌疑案」，經由以副總統陳誠為主任委員的九人小組調查後，由總統府宣佈：准二級上將孫立人辭參軍長職，並由國防部隨時察考以觀後效。在此同時，國防委員會五人小組於十一月完成報告。這份調查報告，當時受到政治壓力，而無法公佈，一直列為最機密文件。俟三十三年(民國七十七年)之後，總統蔣經國去世，監察院應輿論的要求，公佈這份報告。這份報告的結論，至少否定了國防部總政治部提供予總統府的所謂「兵變」報告的關鍵性內容。可是，這份報告之內，出現許多「X X X」，至今尚未解讀。本學術調查的目的，就在透過文件內容分析與歷史背景探討，來嘗試解讀。



平津「取經」行紀聞

陳三井*

一、楔子

去歲十月下旬，筆者又有一趟大陸行。屈指一算，自兩岸「開放」、「通航」之後，近五年來這已經是我的第十次大陸之旅了。平均每年大約二次，雖不算密集頻繁，但已稱得上彼岸常客了。

研究中國近、現代史的工作者，不能不定期親至大陸看看，實地考察一番，否則不但會有「百聞不如一見」的遺憾，就研究工作而言，而且可能走上重覆勞動，造成時間的浪費而不自知。去大陸的目的，通常不外出席學術會議、參觀訪問暨觀光旅遊三種性質。是誰說過：「天下第一件好事，還是讀書。」因此，我這次以搜集研究資料，訪求新書為名，以北京、天津做為活動直徑範圍，把自己定位在（訪友）取經、尋寶（挖書）和觀光三方面，既無開會的壓力，也少演講的負荷，閒來則探幽攬勝，與三五好友把酒論史，真正「諸法皆空，自由自在」，好不逍遙。囿於本通訊的性質，此文只報導訪友尋書的一些見聞和心得。

二、三訪南開收穫多

周恩來曾說過：「我是愛南開的」。研究周恩來的我與南開特別有緣，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算來這已經是三度參訪，前兩回都由歷史系的王永祥教授接待，這次也不例外。所不同的是，十月的南開校園，仍是花團錦簇，到處張燈結彩，懸掛著歡迎校友返校的紅布條，一片喜氣洋洋，因為她剛度過了建校八十年校慶。據聞，南開爲了辦理八十週年校慶，花費了一千多萬元人民幣，這與去年北大百年校慶一億多元的大手筆相比，雖屬小巫見大巫，但已足夠讓南開負債累累了。南開的下一步是，在高教政策由過去的單科大學（文理分家）逐漸走向綜合大學的大前提下，以及爲了追求「重（點學校）中之重」以列名「十大」的目標下，如何與以理工著名的天津大學合併的課題。兩校各有其悠久的歷史，合則有利亦有弊，各人想法不同，彼此立場有異，最困擾難決的恐怕還是校名的問題。究竟是棄「南開」保「天津」？抑選擇「南開」棄「天津」？有待各方討論再做決定。比較令人擔心的是，前年杭州大學與浙江大學合併，杭州大學從此在歷史上消失，南開會不會步上後塵，變成下一個杭大呢？

爲了紀念南開建校八十週年，該校出版了一系列叢書，其中由新聞中心所編的《回眸南開》一書，特別具有史料價值。誠如該書後記所云：「南開是一卷歷史，八十年風雨兼程，步履匆匆，足跡深深；南開是一方沃土，八十載春華秋實，桃繁李茂，柏翠松青；南開是一個赤子，允公允能，日新月異，愛國、敬業、創新、樂群；南開是一曲壯歌，她匯聚了幾代青年立志成材的理想與豪情，呼喚著一個古老民族魂牽夢繞的偉大復興。」是書分爲五個板塊，依序是往事悠悠、名師風采、學苑滄桑、名人之風、南開情懷，追憶著南開特有的學術精神和文化風格，記載了南開重大的歷史事件和重大歷史事件中的南開，錄下了歷屆校友在南開生活中的難忘經歷和點點滴滴。

以校爲家，悠遊在校園的教授們不但別來無恙，而且紛紛推出筆耕不輟的新作，令人敬佩。身體硬朗、老當益壯的魏宏運先生完成了國家和個人學術生涯的重大規劃，他主編的《民國史紀事本末》，共分七大冊，精裝本，都四千餘頁，甫由遼寧出版社出版。本書採傳統的紀事本末體，將政治、外交、軍事、經濟、社會、文化、科技等條目四百餘條，依時間順序排列，詳加敘述、評析並加注釋，允爲治民國史者不可不參考之工具書。治明清史有成的馮爾康先生，除《雍正傳》等學術專著外，也擅長寫歷史

小品文，最近修訂再版的《古人生活剪影》與新付梓的《清人生活漫步》（均由中國社會出版社出版）兩書，反映了作者的廣博知識和社會關懷深度，讀來輕鬆有趣，既能增長知識，又可愉快地度過閒暇時光。以研究《近代中國的留學生》聞名的李喜所先生，結合了幾位年輕後起之秀，在美國黃興基金會贊助下，新出版了《黃興的軍事理論與實踐》（北京人民出版社）一書，認為黃興是位新式軍事家，他不但有自成體系的軍事理論，而且腳踏實地的予以實踐。

老友王永祥先生在一九九八年三月所主辦的「第二屆周恩來研究國際學術討論會」，除論文集以《中外學者再論周恩來》為名由中央文獻社出版外，自己也有一本新著《中國現代憲政運動史》（北京人民出版社）問世，分別對孫中山的憲政思想、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的憲政、新民主主義憲政進行比較研究。他的結論是，孫中山的政黨觀、政權觀、黨政關係乃至黨軍關係各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均仿效了蘇聯模式，但他的仿效是有選擇的，在仿效的同時，仍保留和堅持了他認為有益的、本土的東西。換言之，他的主張，既非完全的「俄化」，亦非單純的本土化，而是兩者的結合。王先生目前正帶領著一批研究生進行《雅爾達協定與中蘇、日蘇關係》課題研究，大量利用了蘇聯的俄文檔案、日本外務省、防衛廳檔案以及台灣的總統府機要檔案（俗稱大溪檔案），全稿已完成三分之二，相信出版後不但對學術具有重大貢獻，且能改寫歷史，造成突破與轟動！

走出靜謐的南開校園，天津市的市容變化並不大。天津是三大院轄市之一，但與北京、上海近幾年各方面的突飛猛進，簡直無法相比。撇開硬體的重大建設不談，工資是最顯而易見的指標，從計程車司機的營收到同是大學教授的待遇，難免都有矮人一大截的無奈感，以致抱怨連連。位於天津的美食街，除了早已聞名中外的多家真假招牌的「苟（狗）不理」包子店外，新近復開設一家「貓不聞」餃子店，兩者互別苗頭，都是熟客老饕常常光顧的地方。貓狗爭奇鬥妍，傳為天津「美談」，也為天津的「五化」順口溜添姿增色，令人叫絕！所謂「五化」是：「城市鄉村化，馬路市場化，生活貧困化，飲食貓狗化，領導沒文化」，這是城市知識人口耳相傳的心聲，也相當程度地反映了天津人生活的寫照！

三、北京書店新猷

北京是個文化古都，不但名勝古蹟多，就是訪書買書也以北京最稱齊全方便。過去有人喜歡跑琉璃廠，買古董兼逛書店。現在情況改變了，我喜歡到北京大學周邊及位於海淀圖書城的幾家書店作一番巡禮。這些書店往往有一個非常典雅富有詩意的店名，如「風入松」、「國林風」、「二酉堂」等，讓買書人印象深刻，打從心底產生好感，聽說有些書店還是北大師生合夥斥資經營的。讀書人搞創收，下海開書店，除了「文化擔當，傳播真知」外，標榜的是「服務讀書人」，這就是「國林風」圖書中心的宗旨。「國林風」除了迴旋空間廣大，充滿書香氣息，人文及社會科學類圖書齊全外，並為讀者提供郵購、熱線諮詢、上門發送、圖書預定、缺書代購等多項服務。對海外購書者而言，現場所提供的代包、代寄等親切服務，才真是無量功德一樁！

除北大附近富有書香氣息的新舊書店外，北京西長安街最近新開設了一家「北京圖書大廈」，樓高四層，雄偉壯觀，佔地之廣，規模之大，陳列書籍種類之多，堪稱全中國第一而無愧。我所見的台灣幾家連鎖大書店，從誠品、新學友、金石堂到何嘉仁，幾乎沒有一家可以比得上。開書店，若沒有讀者上門，門可羅雀，那是頗煞風景的事。而圖書大廈的開幕，象徵圖書托辣斯經營時代的來臨，它像百貨公司一樣刺激了消費，帶來了新的人潮、並意味著北京人還是有濃濃的文化氣息的。相形之下，我所下榻的王府井大街的幾家老字號的書店，如中華、商務、新華等，似顯得生意清淡多了。不過，我跑遍天津、北京各大小書店屢尋不獲的《牛棚雜憶》（季羨林著），倒是在新華書店買到了，也算不虛此行！

四、中央黨史研究室尋「寶」

中央黨史研究室與中央文獻研究室同是研究中共黨史的兩大重鎮，以前座落在頤和園路，與中央黨校比鄰而居，目前已獨立門戶，另遷入北大附近的雙橋東甲一棟十餘層的新大廈內。他們的出版品和發行的刊物，外

間是不容易看到和買到的。這次重訪的時間雖短，但跟上次一樣收穫是豐盛的。

第一研究部主任黃修榮所主持的俄文翻譯班子，繼《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0—1925）第一卷之後，又出版了第二卷（1926—1927），包括檔案文件和資料選輯共出刊四冊，紅皮燙金，稱得上皇皇大著，再蒙主譯者慷慨相贈。據黃修榮先生相告，第三卷初稿已殺青，很快便可付印。翻譯、整理和編輯史料，是一件費力大而辛苦的工作，沒有他們的辛勤付出，何來研究工作的開展和提升。相信這一套叢書出版後，對於研究早期中俄外交以及俄共與共產國際和國民革命運動關係，必有突破性的進展。

老友任貴祥先生多才多能，除了以前出版的《華僑第二次愛國高潮》、《華夏向心力—華僑對祖國抗戰的支援》兩本專書外，最近並與朋友合編出版了《細說周恩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1月）、《周恩來·鄧小平在法蘭西》（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1月）兩書，我一見如獲至寶，通通變成行囊中意外的擄獲品。任先生得知我正在研究「抗戰期間的知識精英」，除了立即把書架上魏繼昆所著的《國統區抗日知識分子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5月）一書轉贈外，並特別介紹我認識在同一部門工作的李蓉女士。李蓉博士，四川成都人，從師於東北師大的鄭德榮教授，當場把她與葉成林合著的《抗戰時期的大後方的民主運動》（華文出版社，1997年6月）一書相贈。她的新著尚有《走向輝煌—毛澤東統戰理論的形成和發展》（華文出版社，2000年1月），同時，編輯部主任趙自立也從書架上取出一本《群眾周刊史》（鄭新如、陳思明著，中共黨史出版社，1998年3月）相贈。人人為我，深入寶山，真是滿載而歸！

任貴祥先生的主要工作在刊物的編輯。中共黨史研究室出版有《中共黨史研究》雙月刊，每年六期，至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共已出版七十二期。此外，並與中央檔案館合編出版《中共黨史資料》，每年四期，至一九九九年底已出版七十二輯，亦對外公開發行，可惜本所圖書館並未訂閱，未能盡窺全貌。我手中拿到的一期是第六十三輯（1997年9月出版），其中仍刊載不少珍貴資料，例如〈旅歐、旅英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的工作報告〉、鄭超麟的〈留法瑣憶〉、毛齊華的〈追憶在莫斯科中山大學期間的幾個問

題〉等，均值得注意。

五、王府井大街新貌

中共爲了慶祝建政五十週年，據聞包括市容整建等投資在內，至少耗費了一千多億人民幣，其中受惠最大的當然是北京城，難怪原先看來並不起眼的王府井大街，一下子脫胎換骨，面目一新，跟著時髦現代化起來。從北京飯店迤北，大半條的王府井大街現在闢成了行人徒步專用道，除公車外任何車輛不准進入。明顯易見的是馬路拓寬了，人行道與過去有顯著的不同，平坦寬廣，無障礙空間的設施，黃色的街燈，使用 IC 卡的電話亭，人性化的座椅，廣場加噴泉，還有那民俗人物的雕刻，把整條街點綴得多采多姿，像少女般的清純俏麗；再加兩旁的辦公大樓、百貨公司和商店也精心地粉刷成悅目的顏色，更襯托得像常見的外國城市的某一個角落一樣。至少在這裡，我們看不到新舊雜陳與髒亂落後。

於是一到下班或每逢假日，逛街散步的人潮便傾巢而出，把偌大的王府井大街擠得像迎神賽會般熱鬧。在人群當中，亦不乏碧眼紅髮的外國觀光客，可見他們早已聞風而至，把王府井列入值得一逛的新景點。

跨入新的千禧年，現代化是一個國際都市必備的條件，也是早晚必經的道路。北京市走上現代化，已在王府井大街看到端倪，一切就從這裡做個良好開始的起點吧！



史料介紹

訪陶英惠先生談中央研究院 院史室資料的徵集

蔡淑瑄*

民國 76 年，我尚奉調在中央研究院總辦事處擔任秘書組主任時，近史所張玉法所長因我職務上有搜集院史資料之便利，囑我兼管近史所新設立之院史資料室（簡稱院史室）。在 11 月 16 日接到聘書當天，我到總辦事處（時尚未改建今行政大樓，為一工字型建築）儲藏室找一份資料，意外的在廢棄的報紙堆中找到五個上面寫著「中英文教基金會檔案」的木箱。詢問之下，沒有人知道究竟是哪一個單位的。檔案跟雜物放在一起，既然無人經管，我便找工友以板車拖回所來，暫放到檔案館；在尚未弄清楚來源及歸屬之前，先不開箱。經過多方打聽後才了解，朱家驊院長曾任「中英文教基金會」董事長，該會結束後，朱院長交存本院；朱院長逝世後，未列入移交清冊。在知道檔案緣由，不會有問題後，才請院史室開箱。這算是我一接任院史室就送給所裡的一份禮物。

此前，我在偶然的機會中，也曾徵集到一些與院史有關的檔案，茲依時間先後簡述如下：

王世杰院長檔案

民國 71 年 3 月 15 日，王故院長世杰先生的二女公子王秋華教授（名建築師，在台北工專任教）來院至美國文化研究所（現改名歐美研究所）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約聘助理

瞻仰甫塑好的王院長銅像是否安置妥當，並禮貌性拜會錢院長思亮先生。是日中午，錢院長在蔡元培館宴請自美回台的前近史所所長梁敬錚（和鈞）先生（曾任一年所長後辭職），讓我派車去接他，便順道送王秋華教授回台北。在車上聊起來，我提到說：「王院長的檔案放在家裡，一方面保管、整理很難，一方面是水災、火災及蟲災等也難於防治，不如送交近史所整理、保管；開放與否，將會尊重家屬們的意見。」

她當時聽了說：「這樣太好了！」欣然同意。國史館之前對此批檔案亦深感興趣，尤其屬意王院長的日記，因為王院長在政府機構任職多年，參與過許多機密決策的工作。國史館多次接洽，家屬始終未同意。我這樣一提，她很贊成，並囑說逕與她弟弟王紀五先生接洽。我回來立刻報告當時的所長呂實強先生，請即刻著手進行。

從民國 71 年 3 月呂所長跟王紀五先生聯絡，至民國 72 年 9 月第一批檔案送來，交涉細節須問呂先生，我不清楚。我只是在此期間，請總務主任趙保軒先生從旁敲敲邊鼓，協助促成。趙先生為武漢大學畢業校友，王院長曾任武漢大學校長，他請趙先生來院當總務主任，足見師生關係密切，而趙先生也與王家上上下下都熟稔。我對趙先生說：從學歷史的角度來看，個人檔案存在私人手中，頂多是當成收藏品，無法發揮檔案本身的作用，十分可惜。以王院長豐富之經歷，若將其檔案捐給中研院，不僅有專人妥為保管、整理，以解決家人庋藏的困難；治近代史的學人，也可以參考此項珍貴史料，撰寫論文，解開一些重大事件的謎題，可以說對雙方面都有好處。

在趙先生熱心幫忙下，民國 72 年、74 年分別送來兩批王院長的檔案，目錄也先後編成。趙先生除居間幫忙催促外，他也感覺這是深具意義的事，也將他自己保存的一些王院長檔案陸續整理出來送給近史所。其數量雖不太多，但使王院長的檔案更見充實。

王院長百年誕辰前，張玉法所長交待我，把王院長的日記印出來，作為紀念。經徵得王秋華教授、王紀五先生同意後，承本所張力先生協助，在很短的時間就影印出版了《王世杰日記》，趕上百年誕辰紀念。該日記一套十本，始自民國 22 年 5 月，止於民國 68 年 9 月，歷時 47 年。出版後聯合報有意再出版排印本，並加製索引，除解決辨認行草的困難外，查閱

也更爲方便。但苦於手民不認識其字，遲遲未能進行。我說：「只要你們肯出印刷費，我願義務校對一次。王院長的字，除非他討論書畫或某些專有名詞外，我可認得百分之九十以上。」可惜此事並無下文。

王院長的日記中有提及李敖先生的地方，用了很不好的字眼。在日記中作任何批評都無所謂，可是一旦印行，公諸於世，便會惹來麻煩。後來引起李先生的控告，他告吳大猷院長、張玉法所長和授權將日記送給近史所的王紀五先生。日記是由我和張力先生編的，以近史所的名義出版，未用我們的名字。我與李敖係大學同班同學，私交也不錯，在出庭時我跟他開玩笑：「這日記是我編的，你真正該告的人是我。」他說：「我告書上有名字的，你沒名字，沒你的事。」訴訟最後以不起訴處分，也算是一個小插曲。

日記出版後，王家十分滿意，所以後來王秋華教授一找到與院裡有關的資料，就通知我去拿。一次，她家裡找到胡頌平先生編的《胡適院長年譜》油印打字本一大箱，這是未經刪改的初稿本，較聯經的鉛印本爲佳。我就坐我兒子的車去搬回來，送給胡適紀念館度藏。

在整理王院長日記時，我發現他曾修改過很多次，其中最重要的關鍵人物是其侄子王德芳先生，他爲王院長處理機要文件，後移民南美，早已逝世（如尚健在的話，他家中應尚保有一些資料）。爲何說王院長的檔案並不完整？王院長是在汪精衛任行政院長時擔任教育部長，而開始其政治生涯的，應該算是汪派的人。在汪組織偽政權後，王院長轉爲蔣中正先生所重用，襄贊中樞，成爲核心人物之一。業師吳湘相教授早年撰寫有關汪精衛的文章時，王院長曾特別約吳教授去看過汪的信件。但在給近史所的檔案中，怎麼找都找不到這些信件。我曾問王紀五先生的夫人及王秋華教授，他們都不知情。希望這些資料仍存在王德芳先生家屬處，未被燒燬。然而是否能有重見天日的一天，則很難說。

錢思亮院長檔案

錢院長的檔案實多屬例行公事，因爲他職務單純，任台大校長的檔案存台大；任研究院院長的公事均存在總辦事處；家中則多半爲別人致贈的書籍，或批閱存留的檔案，史料價值不是很高。我擔任秘書組主任是錢院

長找我去的，所以民國 72 年 9 月 15 日錢院長病逝時，自然義不容辭協助處理後事。錢院長的長公子錢純（伯玄）先生，時任中央銀行副總裁，次公子錢煦（仲和）先生是中研院生物組院士，三公子錢復（君復）先生則供職外交部。在處理錢院長後事時，我跟錢純先生說：

「貴府昆仲沒有人從事歷史研究工作，錢院長的檔案是否送交近史所代為整理、保管？」

錢純先生二話不講：「沒問題！」

我說：「要不要三兄弟商量一下？」

他很乾脆地回答：「這不需要。我們錢家的規矩，父親在父親作主，做兒子的不能有意見。現在爸爸走了，我是家裡面的兄長，我講可以，兩位弟弟不會反對。我同意了就可以了！」。

錢院長的秘書那廉君先生因自台大時期就跟隨他，了解錢院長往來關係，與錢家關係匪淺；我和另一位年輕同仁張正岡先生陪同那先生一塊去錢家整理。那秘書較謹慎，有些向錢院長告狀、批評的資料，他怕留下會惹禍，主張丟掉。我則主張檔案儘量不要丟，但是我工作忙沒辦法全天在那兒，最後他還是在院子中燒了一些資料。燒時不知裏面夾帶了什麼東西，可能類似 DDT 的罐子，發生一次小小的爆炸。他們回來跟我講這件事，我用開玩笑的語氣說：「那先生，別燒了，錢院長最重視檔案的保存，恐怕是錢院長在天之靈也不同意燒檔案吧！」他才未繼續燒。

資料整理好後，近史所派不出適當的車子來，因為書籍的數量很多，既然人家贈送，不能只要檔案，不要書籍，得全部拿回來。後來錢純先生說你們不必找車了，他派了中央印製廠的運鈔車將所有資料送到所裡。

朱家驊院長檔案

朱家驊院長檔案早已於民國 52 年送交近史所，在院史室的檔案中，這是最為完整、也最有價值的史料；但還有部分機密資料由其侄輩的朱受頤先生保管。朱受頤先生一直在本院秘書組負責監印的工作，資格很老。朱院長在大陸時期任組織部、教育部長時，他就替其保管電報密碼本，是朱院長最親信的人。朱院長過世後，有些檔案還存在他手中。

朱受頤先生保管的這部分檔案，可能家屬要收回還是其他原因，他利

用中午時間在秘書組的影印間影印。當時我正好在秘書組，我一去，他遮遮掩掩的不讓人看，好奇之下問他：「朱先生，你在印什麼？」他說：「朱老頭的檔案。」他們稱朱院長為朱老頭。朱受頤先生因為過去職務上的關係，保密功夫極佳，我雖然想看他到底在印什麼東西，也不便輕易開口，以免使他允拒兩難。有一次，看他在印蔡元培院長的檔案，我找個藉口說：「朱先生，你知道我是研究蔡元培先生的，與蔡院長有關的資料可否跟你要一份？」「那沒問題。」他就印了幾封信件給我。

朱受頤先生單身未婚，退休後不久，於民國 75 年 1 月 17 日中風，過世後由其乾兒子的父親來整理其辦公室的遺物，因其教育程度不高，不曉得資料的重要性。我看到朱先生印的檔案中有一部分還沒有送走，我說：「別的你拿走，這些檔案你沒有用，留下吧。」其中的「韓國獨立運動史料」，是已編好順序的完整資料。我便送給張玉法所長，向他說：「這是本所朱院長檔案中沒有而較完整的資料，你跟方志懋先生商量一下，應該可以出版。」方志懋先生是朱院長的秘書，朱院長家人丁單薄，檔案移送本所時，他是負責處理的人之一；他的夫人是張所長和我中學的同學，所以方先生立表同意。復徵得朱國勳先生（朱院長庶子）同意，後來這份資料請王聿均先生編輯，於民國 77 年由本所出版。

胡適院長檔案

胡院長檔案除早期留在大陸的檔卷現存於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外，晚年來台後檔案全集中在胡適紀念館裡，留在美國的部分檔案，也由紀念館陸續要了回來。我在秘書組工作，並不管紀念館的事務，但紀念館主任王志維先生跟我對門而居，碰到館裡有解決不了的問題，便找我協助處理，所以也參與了一些紀念館的工作。

紀念館管理委員會主委高去尋院士因年事已高，不勝繁劇，於民國 75 年 8 月請辭獲准。吳院長問我由誰接合適？我說容考慮好後再報告，即跟張玉法所長商量，結論是：「本所前所長呂實強先生是最適合的人選，如由呂先生接任，以後紀念館與近史所的關係將逐漸密切，近史所同仁利用紀念館的資料也更為方便。」經徵得呂先生首肯後，便建議吳院長致聘，於 9 月 23 日交接。

民國 82 年 7 月，王志維先生移民美國，以健康關係，不克再兼理館務，辭去主任職務。呂主任委員囑由我接充。當初是張玉法所長和我合力勸呂先生接下主任委員的重擔，現在他要我去協助他，自不便推辭。經報請吳院長核聘後，於 8 月 1 日接任，至今已六年多了。

我在秘書組時便常常想，紀念館存在的意義是什麼？總不應只是消極的展示一些胡先生用過的衣物或手稿，供小學生或學人走馬觀花的看看；真正的意義，應積極的把胡先生未發表的手稿印出來，讓所有的學人可以利用、研究，於是將淺見簽報吳院長。吳院長對我這個想法頗表贊同，可是他說：「整理胡先生的檔案，既沒有人，也沒有錢，如何進行？」我說：「辦法是人想出來的。」便向張玉法所長求救，可否從五年計畫尚未進用的名額中彈性撥出兩個，協助紀念館整理資料，此於所方並無損失，且名額不夠還可再向院方爭取。當時五年計畫實施未久，各所名額相當寬鬆。張所長表示支持。當呈報吳院長核可後，將此案於民國 76 年 5 月 23 日提至第十三屆評議會第一次會議討論，沒想到開會時史語所有異議，主張將二位編輯人員用他所裡的員額。我雖反對，但不便堅持，為息事寧人，就跟吳院長建議，這樣爭執不能解決問題，誰出員額均無不可，不如兩所各出一名額好了。吳院長即照此裁決。以後史語所晉用趙潤海先生，近史所晉用萬麗鵑小姐。這是在評議會中妥協的結果。沒想到趙先生和萬小姐現在都正式成為近史所的一員。

在紀念館中所珍藏的胡院長資料中，最受人注目的便是他的日記。該日記係王志維先生奉胡夫人之命，購著胡院長用普通相機拍的，洗了一套 355 的小照片，向不示人。王先生與我談了很多次這批日記無意中自美運來台灣及拍攝經過，我勸他設法印出來，供學人參考，不宜長期封存。王先生終於同意了，但仍要吳院長同意才行。於是我陪同吳院長到紀念館去看這些照片，吳院長嫌字太小，沒有辦法看。我請王先生派人到秘書組影印放大。他印了好幾份，吳院長分請毛子水、陳雪屏兩位先生先檢查一遍，以免印出後出問題。這時我已離開了秘書組，回到所裡來。後來由遠流出版公司影印出版，編得很不理想。大陸上有人想據以出版排印本，惟尚未定案。

紀念館的根本問題是如何長久維持下去？這就牽涉到在制度上的定位

問題。溯自民國 51 年 12 月 6 日 51 年度第 4 次院務會議議決成立以來，既未正式納入本院編制，亦未建立財團法人，僅賴外人捐贈之少數基金利息與本院支助維持。由於物價逐年增高，利息卻不斷降低，而本院之支助款項，又不能列入正式預算，終非長久之計。在吳院長主持院務時，曾多方設法謀求解決之道，但礙於法令規定，始終未能籌得良策。民國 82 年 12 月 9 日紀念館管理委員會舉行第 70 次會議時，吳院長即將卸任，復指示努力做到改隸為本院一正式單位。民國 83 年 7 月舉行第 21 次院士會議時，我正再度奉調兼任秘書組主任，特利用職務上的方便，委請人文組院士代為提案：「建議院方將胡適紀念館在制度上給予定位。有兩種可能方式，一是單獨編制，二是附屬在歷史語言研究所或近代史研究所之下。」決議是：「接受建議，院方將設法處理。」此後院方在研擬修改組織法時，仍因困難重重，未將紀念館納入正式編制。直到民國 86 年 10 月，奉到院方指示，先由紀念館管理委員會根據院士會議的決議案提出具體可行之辦法，再報院供採擇實行。管理委員會於 11 月 4 日舉行第 71 次會議，經充分交換意見後，獲致兩點共識報院：「(1)建議李院長於本院組織法修法時，將本館納入編制。(2)在納入本院正式編制之前，建議暫時將本館隸屬於近代史研究所，並保留紀念館原來名義及體制。」院方於 11 月 11 日即據此召集各有關單位主管舉行「胡適紀念館在制度上定位問題」協調會，決議將紀念館隸屬於近史所，惟原「管理委員會」則改為「指導委員會」。近史所於 86 年 11 月 27 日舉行 86 學年度第 5 次所務會議，決議：「通過納入本所編制」。再提報 12 月 18 日所舉行之 86 年第 6 次院務會議討論，決議：「通過」。民國 87 年 1 月 19 日，在近史所檔案館舉行交接儀式及茶會。至是，我跟呂實強先生、張玉法先生三個人默默耕耘了十年的心願，終於達成。

蔡元培院長檔案

蔡元培院長的檔案，均留在大陸，現存放在其上海華山路 303 巷 16 號故居者有數十箱。南京中國第二檔案館所藏本院 1927 至 1949 年檔案中，亦有蔡院長專檔。其故居的檔案我曾於民國 77 年 11 月去看過，那麼多箱子堆在一起，沒有專人整理，也沒有辦法閱覽，有無遭蟲蛀也不知曉。蔡

院長的公子懷新先生爲復旦大學物理系教授，女公子晬盎女士爲上海社科院計算中心主任，就住在那裡，他們雖對父親的檔案有興趣，但沒有時間整理，要整理或上架，空間都不夠大，人力、財力和空間都是問題。我也到其老家紹興的故居參觀過，現已改成紀念館，也保存了一些文物。

蒐集蔡院長資料最有貢獻的是天津南開大學的高平叔教授，他幾乎跑遍了大陸上所有藏有蔡院長檔案的機構，編印《蔡元培全集》七冊，最後之第八冊，原爲蔡院長的日記，已徵得家屬同意，並已排版，仍因故未能出版。可見徵集史料之不易。後來高教授再主編《蔡元培文集》時，才將日記收進去，由台灣錦繡文化出版社印行。在高教授主編上述兩書時，我均曾提供了一些我蒐集到的資料而爲他所缺的，所以在編《蔡元培文集》時，給我掛了一個副主編的名義，這是我多年來從事蒐集蔡院長有關史料的一點成績。

吳大猷院長檔案

本院前五位院長，依次爲：第一任蔡元培院長（任期爲民國 17 年 4 月至民國 29 年 3 月）、第二任朱家驊院長（民國 29 年 9 月至民國 46 年 10 月）、第三任胡適院長（民國 46 年 12 月至民國 51 年 2 月）、第四任王世杰院長（民國 51 年 5 月至國 59 年 4 月）、第五任錢思亮院長（民國 59 年 5 月至民國 72 年 9 月）。其有關檔案的事情，大致如上述。院史室徵集來的數量並不多，其中錢院長的史料比較單純，不像王院長曾參與政治、外交等之機密決策，雖然一些有價值的文件沒能取得，但能印行其日記也算是一大收穫。院史室目前沒有第六任吳大猷院長的檔案。吳院長因在海外工作多年，擔任院長只有十年的時間，對於院務只是維持大體，不過問細節，無爲而治，也不大看公事，故與院方有關的檔案實在不多；但與台灣科技的發展，則關係十分密切，而這部分資料已由他自己陸續爲文發表了。

吳院長的生活起居由其秘書董來志先生照顧。董先生是山東人，原在國家科學發展指導委員會擔任「人二室」的工作，科導會結束，吳院長仍聘其爲秘書。我與董先生是山東同鄉，吳院長住院時，常跟他在醫院碰面。我曾跟他說：「院長的檔案，請妥爲保管，不要散掉，若歸道山後，可送院裡珍藏、整理。」他答應儘量幫忙。但沒想到董秘書已於民國 87 年 4 月

病逝。現在經常去探視吳院長的是聯合報的王震邦先生，兩人可以說是忘年交。王先生跟吳院長家人也熟識。我跟他說：「吳院長所藏值錢的字畫，自應由其家人保管；但檔案最好送近史所保管整理，你是學歷史的人，這點不需要多講。」將來能否做到不曉得。這是我與六任院長檔案的一些關係。

因緣際會集檔案

檔案的徵集有時端賴機緣，刻意去求也不一定求得到。近史所的個人檔案很多是由不同的管道徵集來的。如「湘潭袁氏三代家藏名人手書」，陳三井所長獲知這批文件後，基於我對民國人物的史料有興趣和研究，便於民國 86 年 5 月 19 日找我陪他到袁孝俊先生處去了解。我一看這是寶貝啊！送給近史所當然再好不過了！袁家湖南人，我內人亦湖南人，因此也了解一些湖南人的脾氣，所以相談甚歡。後來此批書信編目後，送到所裡，請對編輯名人函札頗具經驗的王爾敏先生編注。在整編的過程中，王先生常將編的方式及進度等，讓我轉告袁孝儒和袁孝俊賢昆仲，無形中我又變成了居間聯絡人。

袁家的書信是珍藏三代的傳家之寶，尤其書法，可視為極好的藝術品，袁家三兄弟商量後，不要分文，即贈送近史所整理，在功利之風日盛之際，實為難能可貴。

又如臺靜農先生的書法，據說一字萬金，他所收藏的一幅蔡元培院長的字，是以自己四（或為四十，已記不清楚）幅字換來的。在大陸有一位以研究魯迅聞名的陳漱渝先生，應邀來台訪問，特去看臺先生，回大陸後為文報導，說在臺家看到所藏蔡元培先生的墨寶。蔡先生的公子懷新先生看到這篇文章，問我是否能至臺公館代拍一張照片？我大學一年級是中文系，時系主任為臺靜農先生，我是中文系的逃兵，與臺先生不熟，但可託人幫忙此事。後來一想，何必託人？即於民國 79 年 7 月 9 日直接寫信給臺先生，說明：蔡先生的後人希望要一張墨寶照片，敬請惠允。當時臺先生已病重，我並不知道，由他的一個學生回信給我，並附了一張臺先生在那幅字前的照片。信中又說臺先生有意物歸原主，如果蔡先生的公子打個收據，便無條件送給他。這實在令人感動！我就趕快寫信告訴蔡懷新先生，

請他趕快寫張收據寄來，以便我拿去領字。偏偏這封信又特別慢，而臺先生的病愈來愈重，臺先生的公子說：「蔡家既沒有回信，這幅字就留給我們作為紀念吧！」臺先生因患食道癌（或喉癌），講話困難，但仍示意：「不可以！我已經答應送蔡家，你們不能留下。」那麼託誰來催辦這件事呢？他們問到史語所的莊申慶先生：

「你認不認識陶英惠？」

「熟啊！我們還打過麻將呢！（其實我和他只在劉鳳翰先生家打過一次麻將，沒想到這一次麻將會，竟幫了我一個大忙。）什麼事？」莊先生獲知原委後，要我先替蔡懷新先生寫張收據。我馬上寫好交給莊申慶先生，由他拿到臺先生家，即把墨寶帶回來。多麼值錢的東西，就這麼簡單。

墨寶拿到了，但我在短時間內又不回去上海，放在我這兒，真怕會丟掉。民國 81 年 4 月 29 日，適逢上海社科院歷史所的湯志鈞教授到本所演講，不久就要回去，我問他說：

「你認不認識蔡元培先生的公子蔡懷新？」

他答：「認識啊！」

「你行李多不多？」

「不多，沒什麼行李。」

我便請他幫忙把蔡先生的墨寶帶回上海，送到蔡家，完成了一件愉快的工作。臺先生自己高價換來的蔡先生墨寶，在病重之際，蔡家後人只希望要一張照片，而他老人家不僅先送照片，並且一句話就原璧歸趙，在世風澆薄的今天，這種事太少見了。

我因工作之便，替所裡徵集到一些檔案，若不奉調總辦事處，這些工作或者都與我無關。民國 76 年 11 月 16 日，我奉命兼管近史所新設立之院史資料室事務，至民國 88 年 3 月 25 日交卸，計約十一年半。現將院史室檔案的來龍去脈作一簡述，讓以後使用的人，知道這些檔案是如何徵集來的；更重要的是藉此聊表對捐贈者感激之意，也讓他們的美意得以長存。

（1999 年 6 月 4 日訪談於陶英惠先生研究室）



新書評介

《二戰期間在日中國勞工問題研究》。陳景彥著。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1999年6月，424頁。

陳鵬仁*

—

陳先生出生於一九五五年，東北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畢業，吉林大學日本研究所碩士，從一九九二年至九三年，曾任日本關西學院客座研究員；現任吉林大學東北亞研究所副教授兼副所長。除本書外，曾參與編著《中日文化交流事典》、《滿鐵史》等書，並在中外刊物發表過四十多篇學術論文，算是一位研究日本的年輕學者。

—

本書除序言和後記外，分成九章。第一章「日本強擄中國勞工的開端」；第二章「日本強擄中國勞工的途徑與方法」；第三章「中國勞工被掠往日本的途中遭遇與“試驗移入”」；第四章「日本政府與企業“正式移入”中國勞工」；第五章「中國勞工在日本主要行業中的勞動狀況」；第六章「中國勞工的疾病、傷殘和死亡狀況」；第七章「中國勞工的反抗鬥爭」；第八章「中國勞工的歸國與日本朝野的態度」；第九章「沒有解決的歷史問題」。

讀其全書內容，我覺得作者真是花了許多時間、看了有關資料和下了很大功夫撰寫這本書。尤其是對於時間、文件都寫得相當正確和中肯。對

* 中國國民黨黨史會主任委員

於多少中國勞工，什麼時候，用什麼方法，從那裡被強擄；這些勞工從那一個港口，坐什麼船被帶到日本；在船中的遭遇；日本政府和企業如何配合，「引進」中國勞工；這些勞工到了日本之後，多少人在什麼地方的那個單位作工及其情形；中國勞工的生病、殘傷、死亡狀況；他們的待遇、所受虐待、反抗鬥爭都很詳細的介紹與分析。在這領域的中文著作，我尚未看過這樣深入敘述的著作，實在很難得。

本書指出，「供出」中國勞工的機構有華北勞工協會、日華勞務協會、華北運輸股份有限公司、福昌華工株式會社、汪偽政權。在將近四萬中國勞工中，華北勞工協會「供出」人數最多，為三萬四千七百一十七人，佔其總人數的 90%（頁 51-60）。

被強擄的中國勞工，從塘沽乘船前往日本者最多，其次是青島。此外還有從上海、大連、吳淞和連雲港赴日的，一共有三萬八千四百三十六人。有關日期、人數、出發港口、抵達日本那個單位等都有詳細的記載。如果加上不明港口出發的四百九十九人（其中在船中死亡六十八人），其被押至船上者共計為三萬八千九百三十五人（頁 69-72）。登陸地點最多的是下關，一百六十九批當中佔一百零八批。其次依序是門司、大阪、神戶、富山。

至於到達日本以後，他們被分送到什麼地方那一個單位作苦工，本書也都有詳細的記載，內容包括企業名稱、地點、行業種類和中國勞工人數（頁 83-98），他們被分配到北海道、九州、四國、本州四個大島，以行政區域而言，遍及一都二府二十七縣一百三十處所，其中佔居第一位的是北海道，達五十八處（頁 82）。

他們被分配去從事的行業，以礦山的人數最多，為一萬六千三百六十八人，分布於煤、鐵、銅、水銀、鎳、錳礦等七十處。土木建築業次之，為一萬五千二百五十三人，分布在發電站、機場、鐵路、港灣、建設地下工廠、挖掘隧道等三十六處；港灣裝卸業六千九十九人，分布在港碼頭、車站等二十五處；造船業最少，僅一千二百一十五人，分屬四個造船所（頁 98）。由此可見他們做的都是最「粗重」且危險的工作。

但如果按各企業實際使用的中國勞工人數來計算，則以土木建築業最多，為二萬四千八百三十七人；礦山業次之，為一萬七千五十六人；港灣

裝卸業八千七十三人；造船業一千二百一十人，總共五萬一千一百七十六人（頁 99）。

不過在這裡我有一個疑問，即前述有資料可稽，被押送至日本的中國勞工人數為三萬八千九百三十五人，而實際上在上述各企業作工的中國勞工卻有五萬一千一百七十六人，可見有一萬多人不知道如何被帶到日本的。

論他們的出身，以河北省最多，其次是山東、河南、山西等省。此外還有來自湖北、陝西、上海、廣東、江蘇、東北等地區和省。明確記載其出身地的一萬二千三百一十人當中，六千六百六十九人出身河北省，佔 54%；山東三千四百零五人，佔 28%；河南二千零八人，為 16%，以上三省共佔 98%。他們大多居住在鐵路沿線（頁 105）。

論職業，他們大多數是農民，此外有商人、被俘的中國官兵（包括國軍、八路軍官兵、游擊隊、汪偽軍、保安隊、警察）、原勞工、工員、醫師、教師與學生（頁 106）。年齡最小的只有十一歲，最大的七十八歲，二十歲至二十九歲者最多，佔總人數的 43.78%；其次是三十歲至三十九歲者，佔 27.24%，兩者加起來達 71.02%，可知日人抓的多是年輕力壯的青年和壯年單身漢（頁 3，106-109）。

在這裡，作者對「獨身」這個字的日語用法有點誤解，作者把他解釋為「未婚和沒有妻子」，沒有家的人（頁 106）。其實很單純，「獨身」就是未婚者、單身漢，沒有別的意義。

對於中國勞工，日本人有一套有如軍隊的管理辦法，住的宿舍有很高的圍牆，選擇特別的地點，分隊分班管制，上下班都要集體行動，不准獨來獨往，遠離同樣被強擄來日作工的朝鮮人。吃住都極端差和壞。其中的回憶，令當時同樣去日本作工的我不敢和不能相信。不過我還是認為相當接近事實。因為太殘忍，故不引述，請讀者有機會自己翻閱。

中國勞工在日本作苦工時，犧牲較多的是在煤礦。譬如在北海道炭礦汽船空知業所，三百勞工中就死了一百三十六人，死亡率達 45.3%（頁 106）。那時在很深的地下挖煤是最辛苦和最危險的工作。川口組蘆別礦業所的中國勞工六百人當中，死了兩百七十八人，死亡率更達 46.3%（頁 161）。而最多的乃是位於靜岡縣賀茂郡仁種村的明礬礦，二百人中竟死了一百零四人，死亡率達 52%（頁 188）。這是可怕的數字。比戰爭更為可

怕。最不危險的是從事修建飛機跑道和整地工程者，其死亡率分別為 0.3% 和 0.1%（頁 196-197）。

依據勞工的回憶，有時候是有些誇張。譬如郭振芳說：「我們中間每天都有好些人死去了」（頁 219）。但據他所工作的大阪船舶裝卸會社大阪築港華工管理所的資料（頁 210 最下面一項）顯示：四百六十一人當中死五十六人，死亡率 12.1%。他們是一九四四年十月十日，從塘沽出發，十月十八日到達大阪。從此時開始工作算起，到日本投降，不到十個月，如果一天死一人，十個月應該死九十人左右，何況「每天都有好些人死」，當不止此數。但這裡的資料是說死五十六人。所以只能勉強說幾乎每天死一人。

中國勞工，在日本的工作單位死亡者為五千九百九十九人；在由中國大陸輸往日本目的地中途身亡者為八百一十二人；集體送離後死亡者為十九人，共計六千八百三十人，佔總強擄送日本人數三萬八千九百三十五人的 17.5%（頁 259），其比率是相當高的。

至於其死亡的原因，大部分是因為疾病而死亡，即在六千八百三十人總死亡人數中，因疾病而死亡者有六千四百三十四人，佔死亡人數的 94.2%；傷害死亡者三百二十二；四十一人自殺，三十三人被殺（頁 263）。

有那麼多的中國勞工被強擄去日本作苦工，而且待遇又那麼差，甚至被虐待，所以有不少人反抗和抗爭，這是很自然的事。其方法不外乎逃亡、破壞機器和生產、怠工和罷工等等。其中規模最大和最著名的，就是發生於秋田縣鹿島組花岡礦山的暴動，史上簡稱花岡暴動。

在這裡工作的中國勞工，一共有九百七十九人，於一九四五年六月三十日晚上十時二十分左右，在華勞大隊長耿淳等的率領下，用鶴嘴鍋、鐵鍬、鐵鏟、棍棒等，襲擊了在寮內值班室睡覺中的小畑、猪谷、長崎、檜森四名指導員與華勞管理糧食者的任鳳歧而發生暴動（頁 301）。

結果被逮捕七百九十二人（迨至七月七日），大隊長耿淳等十三人，以違反日本國防保安法第十六條第二項「戰時騷擾殺人罪」罪名，被押進秋田監獄。其中十一人被起訴，於該年九月十一日，在秋田地方法院被判處一人無期徒刑，其他人處十年以下有期徒刑（頁 304）。

據耿淳說：一九四六年四月，國民政府代表團，接他們出獄，遣送我

戰俘回國時，他們三十六人留日，旋由中國法庭中國科，向橫濱國際法庭以日人和野正敏等虐待戰俘，提出控訴（頁 305）。此外還有木曾谷事件，因篇幅關係，在此不擬細說。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向盟軍無條件投降，中國勞工陸續獲得釋放。由於日本共產黨和其他左派政黨和團體，皆得到合法的地位，因此他們對於這些勞工給予相當的支援和協助。迄至一九四六年一月底，有三萬一千九百一十七人被遣送回中國（包括戰爭中的一千一百八十人），佔 82%；一百八十八人留在日本，為 0.5%（頁 335）。而從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至該年十二月九日，陸續又送回二千七百二十三人（頁 339-340）。

對於花岡事件和木曾谷事件的被害中國勞工，刻尚在向日本索賠中，但進行不是很順利。依我的判斷，與慰安婦一樣，日本政府是不會認帳的，所以這些事件的索賠恐怕要拖很長的時間，甚至不了了之。

三

我在日本追濱海空航空技術廠和橫須賀海軍工廠工作時，常常看到被強擄來的朝鮮人，我們稱他們為「阿朝仔」，他們都做工程方面工作，有時候日本監工用鐵鍬打他們，打得頭破血流，實在很可憐。不過據我觀察，朝鮮人比中國人兇悍，故很敢反抗日本人，因而被修理得更厲害。

一九七二年九月，我國與日本斷交，首任駐日代表馬樹禮先生，從紐約請我回東京幫他工作。開始時我擔任中國國民黨日本地區委員會書記長，一年多以後轉任亞東關係協會僑務組組長。因為工作關係，我認識了山梨縣親中共的華僑總會會長（或許是副會長）卓新來。他是台灣的客家人，在山梨做米粉的生意。他告訴我說，他因為送中國勞工的骨灰到北京而被我國政府列管，不能回台灣。因為牽涉到思想問題和政治問題，我想幫他讓他能回台灣省親。後來因為他也不積極，故沒有幫成。我介紹本書時，想起這件事，順便把它提出來。

我們因為是從台灣去日本的，而且在海軍軍需工廠工作，所以在待遇上一定比中國勞工好得多，不過吃不飽，吃得不好是事實。不過就我個人而言，我幾乎沒有這種感覺。這或許因為我不大注意生活品質所致。現在

我的生活也非常簡單，因而才不覺得那時的生活痛苦也說不定。

四

最後，我想指出本書的一些缺點。首先，作者引用資料時，尤其是本文中表格的資料，往往沒有註明作者或譯者姓名和出版社或書店名稱。譬如頁 8、9 便是。它只寫「日譯本」（其實應該是中譯本），但沒有譯者姓名和出版社名稱。頁 30 注一、頁 33 注一等也沒有譯者名字。

其次，人名錯誤太多。頁 1 注一的「木板」，似應為木坂。頁 3 注一的「栗屋」似應為粟屋；同頁一六行的「加琉沙」，似應為阿留申（Aleutian）。頁 7 注二「根津正【音譯】」，應註明姓名或名字是音譯，而且應說明清楚是日音譯還是中音譯。頁 21 第二行的人名「菅原恒覽」，在「序言」頁 1 第十八行卻為「菅原恒寬」，總是有一個是錯的。

頁 21 第二行「永井」的名字是柳太郎；同頁第五行的「左近寺」應為左近司，名字叫做政三；同頁同行至第六行「后生大臣小泉」，應為厚生大臣小泉親彥。頁 62 第三行「偽滿國國務總長」，應為總務廳長，日文為總務長官。頁 113 表格下第四行及頁 122 第三行的「日本政府次官會議」，應為內閣各省廳次官會議。

頁 122 第九行的「富永宮次」應為富永恭次；「澤本瀨雄」應為澤本賴雄；第十行的「重政試一」應為重政誠之；第十一行的「武井郡嗣」應為武井群嗣。頁 140 表二下面第一行的《昭日年鑑》應為《朝日年鑑》。

本書絕少有錯字，實在難得。我只發現了兩個地方，頁 111 第一行「這很能」應為很可能；頁 151 第三行「即便」應為即使，順便指出。最後，頁 1 第六行譯文說：「帝國陸海軍於本日清晨在西太平洋進入與美英的戰爭狀態」，如能將其寫成「帝國陸海軍……與美英進入戰爭狀態」，似乎更符合中文的表達方式。



新書評介

《滿族的婦女生活與婚姻制度研究》。定宜莊著。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384頁。

賴惠敏*

本書作者定宜莊教授是滿族人，父親是北大教授，她從小在北大校園長大。高中畢業時正逢文革，她以知識青年下鄉到內蒙古放羊六年，回北京後就讀北京師範大學、中央民族學院，現任職中國社科院歷史所研究員。由於定教授的家學淵源和文革時的際遇，所以懂滿文和蒙文，這對她研究滿族史是相當有利的條件。

《滿族的婦女生活與婚姻制度研究》主要敘述滿族的婚姻，討論早期北亞民族的婚姻習俗，以及滿族入關後漢化之婚姻情況。作者認為滿族雖受漢文化影響，仍保留部分滿族婚俗上的特色。本書共分三個主題，第一、早期婚俗及其在清代的遺存；第二、八旗制度下的婦女生活與婚姻；第三、通婚與融合。整體上來說，本書的標題雖是滿族，所涉及的範圍包括北亞的遊牧、漁獵民族，而且討論的時間也從上古至清代，故標題沒注明清代是有道理的，本書也是目前所見討論滿族婚姻制度最為詳細的新書。

關於早期婚俗的問題，作者在第一章討論收繼婚俗及其消亡。自古以來，北亞民族盛行收繼婚俗，在漢人看來收繼婚是一種「亂婚」，實際上收繼婚有它的規則性，如兒子可以妻庶母、叔可以收繼嫂、孫子可以收繼庶祖母，但是公公卻不可收繼兒媳，更不可收繼孫媳。收繼婚俗在皇太極時被禁止，他認為收繼婚為禽獸行爲，是傳統的陋俗。由收繼婚論及清初「太后下嫁」的疑案，作者認為按照收繼婚的習俗，多爾袞可收娶兄妻，而孝莊皇太后卻不是任人擺佈的弱女子，多爾袞一廂情願想娶皇太后，事實上並未成功。第二章討論滿族一夫多妻制的習俗。多妻的原因有三，一是收繼婚；二是姊妹婚；三是奴婢為主人生育後升格為妻。滿族人稱宮廷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后妃爲眾福晉，皇太極曾冊封五宮皇后，到康熙時才正式確立以皇后位居中宮的後宮體系。同時，在法律上確立一夫一妻制度，但從刑案資料顯現出滿族社會中仍存在一夫多妻的習俗。此外，由於滿族早期掠奪民女之多，形成家庭中各種名稱的妾，如「小福晉」、「小妻」、「閒散婦人」、「女伴」(gucihī)，而且妾的主要用途是爲主殉葬。入關後，滿族受漢人影響建立一夫一妻制，妾的地位從「小福晉」、「小妻」降爲奴婢，所生子女爲庶出，因而妻妾與嫡庶之子爲了地位和財產繼承權，製造家庭糾紛。

八旗制度下的婦女生活與婚姻之主題，在第三章討論滿族社會的貞節觀念。自古以來，通古斯人盛行早婚，而且滿族的觀念中「妻貞女淫」是一大特色。刑罰對於姦姦民婦相當嚴厲，相對來說誘拐未婚女子處罰不重。婦女貞節的觀念也影響寡婦再嫁的問題，在入關之前寡婦可以再嫁；或者選擇殉葬——亦即從死。皇太極因極力主張漢化，對寡婦再嫁或者從死都加以禁止。爲了仿照漢人寡婦守節的風氣，清初頒佈旌表貞節婦女的制度，當然也包括滿族婦女。在經濟上，清朝實施寡婦之優恤措施，即給予丈夫薪俸之半。寡婦自己也衡量實際生計問題，選擇守寡或者再嫁。第四章討論從交換到指婚。早期爲了政治上的理由，努爾哈齊（赤）利用交換的方式決定姊妹和女兒的婚姻對象。入關後，交換婚姻遂爲指婚所取代，乾隆年間頒行近支宗室之指婚諭旨，以控制皇族婚姻。指婚目的亦在建立清皇室的政治網絡，鞏固其與蒙古和滿族顯貴的關係。至於一般宗室和覺羅之婚嫁則須呈報宗人府，登錄成婚嫁冊、娶妻冊。第五章敘述八旗制度與旗人婚姻。在入關前，八旗官員家的女子婚嫁權屬於該管貝勒；旗下平民女子婚嫁權屬於佐領掌管。入關後對八旗婦女的婚嫁控制具體表現在於選秀女制度，目的是爲備內廷主位，或皇子、皇孫、親王、郡王等指婚。在八旗旗人之外，內務府包衣旗人家的女子須經選宮女後才能婚嫁；至於內務府所轄的莊頭、莊丁之女則係備選秀女。換言之，內務府女子需充當內廷使女，散布外地官莊的女子係挑選秀女。除此之外，作者也討論清朝對旗人婚嫁之管理，目的爲保障旗人的生活和人口繁衍，自皇族至一般旗人婚嫁都予以賞銀。這部分的研究是借助許多檔案，如〈八旗都統衙門檔案〉、〈內務府來文〉、刑罰類、《盛京內務府糧莊檔案匯編》、《清代西遷新疆察哈爾蒙古滿文檔案譯編》，因此討論的問題也比較有趣。像清朝伊犁

駐防官兵包辦婚姻，買寡婦和女子由官兵負責採買、解送，這種做法帶有濃厚的滿族傳統習俗。還有八旗婚姻制度之「良賤不婚」只是良女不得與賤男通婚，而賤女與良男通婚卻不禁。作者徵引新史料來描述旗人的婚姻，細密且獨到，為本書精華所在。

通婚與融合之主題所論述第六章為滿族與蒙古之政治聯婚。此議題雖為清史學界所關心的，但學者們大多強調滿蒙通婚的政治功能，作者從婦女生活層面來思考遠嫁皇女婚姻之不幸，由此看出婦女史研究較為細心之處。第七章討論滿漢民族的通婚，清初曾頒佈旗民通婚的禁令。隨著時間推移，此一禁令逐漸鬆弛。從康熙朝起，允許旗人娶民女為妻，禁止旗女嫁與民人。乾隆朝以後也只禁止滿洲旗人之女嫁與民人，對於漢軍旗人則採取聽之、任之的態度。又，清朝政府並無禁止八旗內滿漢通婚，另外納民女為妾也成為滿漢通婚的重要途徑。故滿漢民族透過通婚達到交流和融合。

《滿族的婦女生活與婚姻制度研究》一書的特色有以下幾點：

一、語文上的專長。懂滿文、蒙文。關鍵的問題必須有專精的語言基礎才能做詮釋，在頁 177 提到明人解釋古出為皂隸，作者指出這是錯誤的。按照滿文原意是朋友，也就是蒙古人所稱的那可兒（同伴之意）。此外，本書引用的清代重要檔案，像〈清初內國史院滿文檔案〉、〈八旗都統衙門檔案〉係滿文檔案，必須懂得滿文才能瞭解內容。

二、新史料的運用。現藏於北京第一歷史檔案館的清史檔案數量約有一千萬卷左右，令人望之生畏。作者很有耐心地在檔案館中抄錄相關檔案，本書中所引用的〈內務府來文〉、〈內國史院檔〉、〈宗人府來文〉、〈宗人府堂來文〉、〈軍機處滿文月摺檔〉、〈八旗都統衙門檔案〉，都是數量極多，有待研究的寶貴資料。據個人的經驗，這些檔案在文革整理時以紙繩捆綁成包，所以第一位借閱者解開檔案包常不小心將紙繩弄斷，當我們戰戰兢兢請教管理員怎麼辦？他們很慷慨地拿出布繩叫重綁，可見這些檔案還很少人閱讀。

三、看問題的角度較廣。本書有人類學的觀點、民族學的調查、歷史學的考證。作者以前寫過《清代八旗駐防制度研究》，所以談滿族的範圍不侷限於京師的滿人，還包括各地駐防之滿族。作者自己曾到遼寧蓋州等

地調查屯居旗人的生活，訪談中作者詢問婦女的婚姻、生育等家庭生活，此作品已出版成書《最後的記憶—十六名旗人婦女的口述歷史》，內容生動有趣。

四、國際化的學術觀。大陸學者研究家族史的論著很多，但有關婦女史的研究卻極少，作者因長期與美國學者進行研究，有機緣接觸婦女史之領域，對拓展中國婦女史研究，在大陸可謂先進。

然而，作者在論述過程中也難免前後矛盾之處，或者值得再進一步探討，以下是個人閱讀後的疑惑：

一、作者下鄉遼寧蓋州做田野調查以及訪問，但其口述訪問的作品《最後的記憶—十六名旗人婦女的口述歷史》，有關婦女的生活經驗和特殊家庭組成，卻未放在本書中。譬如頁 32 作者認為滿人家戶基本上「以一對夫妻為核心組成的家庭」，在蓋州的訪問中卻有數十代為「一戶」的單位，故關於滿人的家戶問題仍值得進一步研究。

二、史料方面。本書滿族婦女，用的檔案多數為〈內務府來文〉，對象為上三旗包衣佐領，〈宗人府來文〉對象為皇族。至於一般八旗家庭的婚姻案件應是在〈刑科題本〉中可以找到。〈戶口冊〉可以看到滿族家庭中，寡婦的比例很高，可作為她論證旗人守貞的傳統。其次，作者在頁 267 提及內務府旗人很少和外八旗的正身旗人通婚，在〈戶口冊〉中的記錄卻不盡然如此。故有關旗人的通婚情形仍須做進一步的觀察。

三、有關數量的問題。作者搜尋官書或檔案並採列表方式來證明通婚具體事例，這做法其實還有許多遺漏之處。因為幾十個案例並不足以證明通婚的狀況，而必須借助統計資料，譬如《玉牒》、〈戶口冊〉所登錄的家庭資料既完整、數量又多，比較能做出完整的統計。

四、本書的標題為婦女生活，然而論述生活層面卻不多。此應可參考文集、筆記小說的記載。例如，滿族婦女在入關前和入關後的生活形態應有重大改變，由「執鞭馳馬」變成「深藏閨閣」，婦女如何調適新的生活環境。又，滿人特別敬老尊賢，公公婆婆如何要求兒媳婦盡孝。還有，在家未嫁的姑娘受家人寵愛，言行舉止有何特殊之處。在〈刑科題本〉有婆婆不滿意媳婦不善於理家而時常打罵；媳婦回娘家居住，甚至慫恿母親變賣家產，引起家庭糾紛。

五、論證部分。譬如第四章標題為從交換到“指婚”。但是乾隆皇帝指婚限於「皇上伯叔輩王貝勒等子女」，也就是康熙皇帝的後代，屬於皇室近親，皇族包括努爾哈齊（赤）兄弟以下的愛新覺羅氏，這些人並非實施指婚，故標題所稱指婚實際上只是少數的近支宗室而已。若本章標題改為「宗室、覺羅之婚姻」較符合內文所述。頁 262 引述「包衣管領下女子不准聘與包衣佐領下人，包衣佐領下女子不准聘與八旗之人」，那麼包衣管領、佐領的女子究竟該嫁給誰？由字面上看來，清朝似乎規定地位較高的八旗不准娶地位較低的女子，但是在頁 267 作者卻說「發遣至盛京的宗室覺羅與內務府莊丁通婚的比例高」。又說「上至皇帝，下至下層皇室，他們與內務府旗人甚至內府中的旗人漢姓通婚現象，要遠較與八旗漢軍通婚更為普遍。」這又怎麼一回事呢？

總之，就像作者所說滿族的婦女史料相當分散凌亂，常令人有掛一漏萬之嘆，不過作者蒐集百餘種檔案、文獻，且參考許多中外學者論著，又親自到滿族村落作田野調查，這樣的努力都呈現在這本書上，其貢獻是有目共睹的。



新書評介

《陳炯明與聯省自治運動》(*Chen Jiongming and the Federalist Movement: Regional Leadership and Nation Building in Early Republican China.*)。陳定炎 (Leslie H. Dingyan Chen) 著。密西根：密西根大學，1999 年，357 頁。

張世瑛*

自從 20 年代國共兩黨先後躍居政治舞台的主角後，近代中國的歷史論述，始終籠罩在革命史觀的陰影下。這使得民國史上許多革命以外的人物或團體，遭到有意無意的漠視；即使在革命陣營之中，也是有著高度的選擇性，在以孫中山和蔣中正為核心的正統標準下，凡是與孫、蔣兩氏相左或背叛者，都被抹煞在革命之外，陳炯明就是一個極佳的例子。在臺灣的中學課本裡，他被描述成是一個謀害領袖的叛徒，這樣的既定印象在陳定炎先生 (Leslie H. Dingyan Chen) 的力著《陳炯明與聯省自治運動》(*Chen Jiongming and the Federalist Movement: Regional Leadership and Nation Building in Early Republican China*) 出版後，才有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

本書的作者陳定炎先生是陳炯明的次子，作者的背景本身就帶有強烈的傳奇色彩，作者也不諱言他是要用歷史為父親翻案，試圖撥去籠罩多年的霸權論述，重新找回歷史的真相。作者寫作的宗旨卻也讓讀者得窺歷史的堂奧，雖然政治舞台上的成王敗寇早已註定，但史學家的春秋之筆，卻能為失敗者掙回一點版圖。為了本書的寫作，作者早在十多年前，就開始積極進行基礎史學的準備工作，首先從英、美等國的國家檔案局，整理出約一百二十萬字的《有關陳炯明的史料輯錄》(*A Collection of Historiographic Materials for a Biography of Chen Chiung-ming*)，在史料的蒐集大致完備後，作者的研究也逐漸開花結果。1993 年，作者率先在臺灣的《傳記文學》雜誌長篇連載與高宗魯先生合著的〈陳炯明：聯省自治的實行者〉，繼而由李敖出版社於 1995 年出版《陳競存(炯明)先生年譜》(共

*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生

兩冊)；1997年，作者又在香港出版《一宗現代史實大翻案—陳炯明與孫中山、蔣介石的恩怨真相》。至於本書的出版，可以說是為作者過去多年的研究，劃上了圓滿的句點，也為陳炯明個人的歷史，甚至近代中國的革命史，重新提供了一個思考的方向。

本書除前言、結論外，共分為九章，第一章「早年生活」，第二章「改革與革命」，敘述陳炯明在辛亥革命前的活動，重點是放在陳炯明如何從一個地方上的菁英士紳(陳曾經考中秀才，並擔任過立憲派大本營的諮議局議員)，義無反顧地走向革命的心路歷程。第三章「二次革命與護法運動」，描述辛亥革命後陳炯明出任廣東副都督及代都督的作為、投身國民黨二次革命的號召、失敗後流亡海外的歲月，以及1917年跟隨孫中山南下護法的一段艱辛歷史。第四章「閩南的模範小中國」，敘述1918年陳炯明率領援閩粵軍攻下閩南，以漳州為中心推動各項地方建設，熱烈呼應當時席捲全國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如何以這塊僻壤之地，贏得「閩南的俄羅斯」的稱號，而陳的開明作風也得到當時國內外輿論的一致好評。

第五章「廣東模範省的建立」，敘述1920年粵軍回粵後，陳炯明在廣東揭起聯省自治「粵人治粵」的大旗，希望將廣東推動為中國的模範省，陳的各項新措施，如禁煙禁賭、縣長民選、教育改革、支持工運、婦運等，營造出時人矚目的革命實驗地，這段時期也是陳一生事業的最高峰。第六章「六一六事變的爆發」，這一章是以發生在1922年的六一六事變做為討論的焦點。過去海峽兩岸學界普遍的說法，都把這個事件解釋成是陳炯明為了破壞孫中山的北伐大業，唆使他的部下發動兵變，砲轟廣州觀音山的總統府。此後的陳炯明被國民黨說成是叛國叛黨、謀害領袖的千古罪人，等到北伐勝利、國民黨取得全國的政權後，這樣的霸權論述更是深刻的烙印在國人的印象裡。因此，作者花了較多的篇幅討論這場事變的前因後果，特別是推翻了過去許多國民黨的說詞。例如，1922年3月粵軍第一軍軍長鄧鏗被刺，向來被視為是孫陳關係急遽惡化的導火線，而國民黨官方都把暗殺的主謀推到陳炯明的身上，但作者根據英美駐華使領的報告，指出主謀者應是孫派中人，再嫁禍給陳炯明，且鄧是陳的得力助手，作者認為陳炯明應無暗殺鄧鏗的動機。其次，作者指出六一六事件的爆發，跟孫中山的挑釁行為有著極大的關聯，1922年6月13日，孫對廣州記者發表言論，

表示如果粵軍不撤出廣州，他就要先發制人，用毒氣彈把粵軍驅離，在孫的一再威脅下，粵軍為求自保才發動這場兵變。此外，這場兵變在同時代的人眼中，和日後國民黨的宣傳有著南轅北轍的落差，由於直系掌握的北京政府，正以恢復舊國會、黎元洪復任為口號，這使得孫中山的護法運動，失去繼續存在的正當性，而且當時輿論的主流聲浪，幾乎是一面倒的要求北方的「非法」總統徐世昌，和南方的「非常」總統孫中山一齊下台，讓分裂的國家重回統一。因此，陳派粵軍的武力政變，在當時的人並不見得都是以綱常名教的標準來看待，反倒是贏得了相當的肯定與支持。

第七章「中挫的希望」，敘述六一六事變後，陳炯明回到廣州收拾殘局，但這短暫的機會，很快的就被孫中山指使的傭兵—滇桂軍所打破，1923年1月，陳炯明被逐出廣州，陳派粵軍退回東江惠州，形成孫陳相持的局面。第八章「聯省自治的失敗」，談及1923年初至1925年底陳派粵軍被蔣中正的黃埔黨軍擊潰為止，這段期間的廣東一直處於硝煙瀰漫之中，其間特別值得注意的是1924年底發生的廣州商團事件(本書稱之為西關屠城事件)，作者認為這個事件是孫中山晚年的一大污點。為了鎮壓商民，孫中山竟然命令軍隊向廣州居民密集的市區開砲，造成嚴重的傷亡。第九章「在香港的最後努力」，敘述陳炯明在失敗後定居香港，出任由華僑所組織的致公黨總理，並在1927年發表了他對中國政局的看法—《中國統一芻議》一書，1933年，陳炯明潦倒地死於香港，享年五十六歲。

以上是本書內容的簡要說明，從章節的安排不難看出，作者所採取的寫作手法是傳統人物傳記的書寫模式，根據傳主的生平，依照時序臚列排比，試圖達到重建史實的目的。由於過去學術界始終沒有一本介紹陳炯明生平的完整傳記(嚴格說來，僅有大陸段雲章、陳敏、倪俊明合撰的一本《陳炯明的一生》)，本書的問世，適時的填補了這個空隙。尤其是以往對於六一六事變後，陳炯明的政治活動，幾乎是一片空白，透過作者細心的拼湊、耙梳，終於可以對陳炯明一生的事蹟，描繪出一個詳實而清楚的輪廓，這也是本書最大的貢獻所在。

然而，本書的目的既然是要重建史實(依照作者的解釋，應該是推翻過去國民黨版的歷史，還原被埋沒的歷史)，則作者所根據的史料，無疑地將會決定重建史實的可信度，就這點來看，作者依賴的史料以及得出的觀點，

恰好與過去國民黨版的歷史分據兩端。作者非常頻繁的使用香港《華字日報》，作為重建史實的根據，在談到當時人的評論時，多引用英美駐華領事及武官的報告，至於口述歷史的資料，則泰半引用莫紀彭、黃強等態度明顯親陳的訪問稿。固然，挖掘出這些過去被忽視的史料，對於還原完整的歷史，有著不可抹滅的價值，但過度地運用某些特定史料，難免會讓讀者對於作者選用史料的廣度，以及篩選史料所根據的標準，產生若干的疑慮。

以書中所描繪的孫中山和陳炯明的形象為例，就呈現出截然二分的大翻轉，讀者幾乎很難把書中的孫中山，和教科書裡的國父聯想在一起，這樣的書寫模式固然達到了為歷史翻案的目的，但把黑白重新顛倒過來，就一定更接近真實的歷史嗎？站在世紀末後現代主義正大舉侵襲傳統史學的浪頭，歷史學家可能需要更保守的看待史料與史實的關係，史家既然無法鉅細靡遺地將史料一網打盡，則根據有限的材料所繪製出的歷史地圖，自然也不見得盡符事件的原貌。今天來重新評估陳炯明的歷史地位，除了重建史實外，是不是可以站在更寬廣的角度，提供讀者不同以往的思考方向呢？

二十世紀的中國是一個革命的時代，多少熱血青年都曾夢想經由暴力的革命手段，使這頭睡獅甦醒過來，但百年一夢，驀然回首才發覺為革命付出的代價實在太過沈重，於是對於原本被視為典範價值的革命，開始出現鬆動，甚至發出「告別革命」的呼喊。重回革命的現場，當前史家可以嘗試的，應該不再只是重鎚一敲，分清好人、壞人就告了事。不管是孫中山、陳炯明，抑或是其他曾在民初舞台駐足的政治人物，他們的終極目標無非都是想讓中國脫離貧困與愚昧，只是手段上互有差異罷了。對於陳炯明的再認識，除了需要擺脫勝者為王、敗者為寇的霸權論述外，他反對武力革命（孫中山的北伐）、主張聯省自治、模範起信的想法，雖然沒有能夠付諸實行，但是不是另一條更適合中國的道路呢？

由於作者的論述大都集中在史事的舖陳上，對於陳炯明在中國革命史上的角色，究竟扮演何種意義？難免顯得有些著墨不足。過去針對國民黨史的研究，往往將革命陣營視為鐵板一塊，忽視革命內部其實也是眾聲喧嘩。從興中會到國民黨時代，黨人內部對於革命路線的看法，始終存在著

多元的聲音，以陳炯明來說，他對黨向來沒有太高的期待與評價，在《中國統一芻議》中提到：「一黨專政，實與民主政治，根本不能相容。」對於國民黨在北伐後的政策，他更是不以為然：「至於黨化已屬不通，黨化教育更屬荒謬絕倫，蓋黨者不過團體之謂，絕無神妙之說，即凡主義政綱，亦以一時之要求，而非為化民成俗之妙用。」陳炯明的這些看法，似乎也註定他和基本教義派分道揚鑣的結局。如果不因人廢言，陳炯明的政治主張，特別是他對聯省自治的看法，(陳也是當時地方實力派中，唯一對聯省自治提出具體施行藍圖的政治人物)，是不是有一些見解值得重新去挖掘？為什麼在革命的過程中，以俄為師的主張會逐漸壓倒議會式的民主政治，而在越來越激進的革命浪潮中，中國的革命又到底失去了些什麼？

孫陳之爭還可讓讀者重新去反思中國近代政治思想中的保守與激進。六一六事變後，國民黨就以叛黨叛國、謀害領袖的大帽子加在陳炯明的頭上，(如 1923 年 1 月，親國民黨的廣州晨報記者李睡仙等人寫成《陳炯明叛國史》一書)，當時任北京大學教授的胡適，即在《努力週報》上著文反對國民黨用舊道德的標準來攻擊陳炯明，胡適認為這次的政變，在本質上根本是一次革命的行動。過去齊錫生和陳志讓教授對軍閥時期的研究，都同意北京政府走馬燈似的政權轉換，反映的是一種開放式的競爭模式，就這點來看，孫中山及國民黨建立正統道德權威的做法，反倒是較為保守而倒退的。國民黨與舊傳統的聯繫，在孫中山死後更趨明顯。

至於陳炯明和他周圍這批所謂陳派人物的關係，也是本書交待的比較不清楚之處，由於這批人幾乎都不見容於日後的歷史，到底陳炯明和馬育航、葉舉、洪兆麟、鍾秀南等人的關係如何？都是值得進一步釐清的問題。(由於作者曾提到他和葉舉的兒子見過面，以作者的背景應該可以對這個方面多所發揮。)在陳炯明的政治思想裡，帶有無政府主義等非常激進的一面，然而陳炯明的人際網絡卻又是非常的傳統，這批在他左右的人物，不是他的同鄉戚族，就是故舊好友，究竟這些人對陳炯明的政治判斷，發揮了什麼樣的影響力？相信這也是了解陳炯明一生的重要管道。



新書評介

《晚清七十年》。唐德剛著。臺北：遠流出版公司，1998年6月，五冊。

洪健榮、范純武、吳美鳳*

唐德剛教授素以學兼中西、貫通古今的學術成就而享譽國際，尤在史學界久負盛名。著有《李宗仁回憶錄》、《胡適口述自傳》、《史學與紅學》、《中美外交百年史 1784-1911》等多部膾炙人口的作品。其近作《晚清七十年》作為「民國通史」著述計畫的開場，全書根據「中國社會文化轉型論」的觀點，探討鴉片戰爭（1839-1842）至民國肇建七十年間的動盪波折。唐氏除了運用轉型論檢證李鴻章、袁世凱、孫文、胡適、郭廷以、袁同禮等人的歷史地位之外，並藉以通觀這段時期的幾項重大事件如鴉片戰爭、太平天國、甲午戰爭、戊戌變法、義和團、八國聯軍暨辛亥革命的歷史意義，橫向穿插與事件相關的清政府、皇室成員與朝野人物之間的折衝起伏。作者本其治史過半世紀的豐厚學養，信手拈出，娓娓道來，編織成這部包括《中國社會文化轉型綜論》、《太平天國》、《甲午戰爭與戊戌變法》、《義和團與八國聯軍》、《袁世凱、孫文與辛亥革命》等皇皇五冊的巨著，所呈現的正是唐氏在政治史研究與外交史分析的專長。

本書第一冊綜論中國社會文化轉型的歷史過程，是為全書的總提綱。作者在自序〈告別帝制五千年〉中首先陳述其對於中華民族四千年來社會政治發展型態的詮釋，也就是封建、帝制與民治三大階段及其兩次轉型的見解。他認為「從封建轉帝制，發生於商鞅與秦皇漢武之間，歷時約三百年。從帝制轉民治則發生於鴉片戰爭之後，吾儕及身而見之中國近現代史之階段也。筆者鄙見認為此一轉型至少亦非二百年以上難見膚功也。換言之，我民族於近代中國所受之苦難，至少需至下一世紀之中期，方可略見鬆動。此不學所謂兩大轉型也」（頁 8-9）。就促成文化變遷的動力因素而

*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生。

* 感謝王爾敏老師、王曾惠先生的指導與協助。

論，這兩次轉型期的主要差別在於：第一次轉型乃傳統社會政治結構自發演變的結果，是主動性的；第二次轉型則幾乎是出自晚清西力東漸的挑戰（challenge）所造成的反應（response）結果，係被動性的（頁 20）。在〈中國現代化運動的各階段〉裡他依此論點將「同治中興」、「戊戌變法」、「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北伐」、「抗戰」迄今大陸方興未艾的「民主自由」運動，整體視為中國經西方文明挑戰之下所產生的「現代化運動」，「也就是近代中國的政治、社會文化的『轉型運動』」（頁 4-5）。另外在〈論帝國與民國之蛻變〉中更明白地點出：「一部中國近代史便是一部『傳統中國』向『現代西方』轉變的『轉變史』」（頁 155）。而這次轉型後可能產生的定型，據唐氏的推測大抵不出化君權為民權、化農業經濟為工商業經濟以及在文化發展上化控制思想為開放思想等三項主要原則（頁 244-246）。至於在國家大政、學術文化等各行各業中先知先覺的領導人，亦即轉型時代的發言人，也就順理成章地成為「開風氣」的啓蒙大師（頁 287-288）。

基於對近代中西文明演進史的深刻理解，唐氏強調：自鴉片戰爭揭開晚清變局的序幕以降，近代中國的歷史發展趨向從原本「國家強於社會」的東方傳統模式，轉變為「社會重於國家」的西方式現代社會；從千年不變的帝國體制，過渡到十年一變的社會型態（頁 205-218）。此轉型的過程有如通過長江三峽般，在歷經險象環生的驚濤駭浪中，逐步邁向風平浪靜的太平盛世（頁 35-36）。作者精心獨到地運用其「歷史三峽」的宏觀視野，一以貫之於全書的整體分析架構，綱舉目張，前呼後應，具體落實在各分冊的論述脈絡中。

本書第二冊專論太平天國的興亡史。太平天國，這個被唐先生稱為「四不像」的政權，長期以來基於政治觀點上的不同，使得它有時被視為漢族反滿的「民族革命」，也曾被看成是「階級革命」。作者認為歷史研究沒有替政治宣傳而服務的必要性，我們討論太平天國的歷史所當注意的是其中的「實然面」，而非「應然面」，亦即就史實而論史。有鑑於此，他大略從三個方向分析太平天國。首先，他基本上認為太平天國所代表的是近二千年來中國社會第二次轉型的第一階段（頁 76），係中國內在的週期性內亂的現象（頁 5）。這種週期的形成徵候乃地方不靖、盜匪橫行。太平天

國正如同明末李自成、張獻忠式的「農民起義」，基本上還是依循著中國傳統政治上的新陳代謝過程而進行（頁 9-10）。

太平軍能夠從廣西西江貴縣、桂平金田村一帶風湧而起，在於原本地瘠民貧的該地區正處於社會衝突高漲之際。當洪秀全等採取流寇般的作戰方式席捲東南後，在戰略上雖未建立根據地，武力及氣勢上卻有可能直搗京畿（頁 54-57）。然而，洪楊諸人在入主南京後就不再北上，這是因為其內在的體質所限。唐氏稱洪楊諸人是屬於「渣滓普羅階級」（*lumpenproletariat*）的層次，有著低下的政治與社會品味，卻又強加進行著「改朝換制」，自然會引起傳統士大夫的反彈。譬如「長毛」之所以被稱為長毛，就在於平日披頭散髮，公然違反了當時的日常生活習慣，理所當然地會被拒斥（頁 108-112）。正是透過明白易曉的講述，唐氏呈現出太平天國這個以「流寇主義」作為本質、想不亡也難的歷史。美國學者孔復禮（Philip A. Kuhn）所說太平天國時期令原有的地方軍事團練武力進行整合，而讓長毛潰敗¹，這種強調社會架構的分析，在唐著中似乎已變得不那麼重要了。

不過，這並不意謂著唐氏沒有一個宏觀的歷史視野；正相反地，他以「轉型期」所發生的歷史現象來觀察這之間的轉變，讓他有更多面與多角度的詮釋空間。譬如他認為中國社會第二次轉型的過程中，在經濟上的轉變，讓太平天國有著進一步發展的契機。雖然沒有精確的數據顯示，但自鴉片戰爭五口通商之後，由原本廣州的一口貿易擴及五口之後，上海成為五口之首，全國的外貿進出中心至此移至長江下游，廣州十三行的壟斷事業紛告結束。廣州的衰落所導致的失業現象引發民怨，自然提供太平天國的「基本隊伍」（頁 20）。作者還認為太平天國是靠工商業打仗的一個小朝廷，這是因為就太平天國的經濟基礎而言，所謂「天朝田畝制度」並沒有實施過，而是依賴在南京的「百工衙」與「諸匠營」。十八、九世紀中國的國際貿易係以絲、茶貿易為主，一直是對外出超的，而在鴉片貿易後則轉為嚴重的入超。一八五三年天王底定金陵，即頒定禁煙令。而在鴉片

¹ 見 Philip A. Kuhn, *Rebellion and its Enem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Militariza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1796-1864*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

停止進口、絲茶貿易如舊的情形下，經一位漢口絲綢商吳復誠的組織下，南京成爲大型的國營工廠。藉由對外貿易，太平天國獲得極大的經濟支助（頁 115-118）。然而歷史的弔詭是：因爲鴉片貿易中斷的問題，使英國組織常勝軍轉與太平天國相抗。唐氏引以申明美國哈佛學派所謂鴉片戰爭不是爲鴉片而打的說法，並不正確，從中國海關帳目來看至爲明顯（頁 120）。

第二個路徑，唐氏把太平天國還原到宗教的本質面來看待。傳統和過去的史家忽略了宗教原本的「狂熱」層面，其實太平天國並不是以宗教偽裝來進行「農民大革命」，而是一個真確的狂熱教門，捲入了清末改朝換代的機運中，而化宗教信仰爲政治造反力量而已（頁 30-31）。作者認爲太平天國純粹是一種宗教運動，是面對西方異文化挑戰的「造反小頑童」（頁 71-72）；洪秀全所扮演的是神跡的角色，其所著《原道救世歌》即是以一神論取代中國傳統的泛神論。以有神的西學傳統向泛神的中學傳統挑戰，洪楊可以說是中國社會轉型期最明顯的表徵。由於洪楊政權難以單純地歸類於基督教政權、社會主義國家、民族革命、農民起義或神權國家的範疇內，所以作者稱之爲「四不像」（頁 87）。而此種「四不像」正是轉型期常見的現象。

第三個方向，作者從縱橫古今的比較中論說歷史的某種必然性。其實本冊不應單純地視爲是講述太平天國史事之書。在作者宏廓的史識中，太平天國與中共的萬里長征相類，毛澤東最後則擺脫流寇主義的戰略，改以紮根盤存，終歸成功，二者優劣立判（頁 148-151）。此外，毛組織運動「紅衛兵」和太平軍中以幼童殘忍行事如出一轍。這些比附都在說明歷史進展中的某些必然性，唐氏也由此彰顯歷史所存有的「鑑往知來」的作用。

本書第三冊焦點放在甲午戰爭的來龍去脈與戊戌變法的前因後果。以唐氏的觀點，甲午戰爭與國共決戰是中國近現代史上「該敗者勝、該勝者敗」的關鍵性戰爭（頁 4）。一八九四年七月二十五日甲午開戰之前清政府所擁有的新制海軍，大約位居世界第八，當時歷經明治維新後的日本也僅列第十六。然而戰爭爆發後不過數週，清軍竟一敗塗地、土崩瓦解。爲能深入探討中國戰敗的緣由，唐氏採取轉型論的見解歸結甲午戰爭的階段性；首先在背景方面，鴉片戰爭前後以林則徐爲首的「原始四化，先炮後船」的政策，其中反映當時主政者對於西方傳統船砲不分的失識。其次，

日本在同治末期的侵台及其後覬覦朝鮮的挑釁行爲，促成中國新式海軍的建立；成軍以後，主事的北洋大臣李鴻章以前淮軍水師提督丁汝昌轉任海軍提督，統率北洋艦隊。唐氏緊接著剖析北洋艦隊的物質條件，包括一八七五年李鴻章委託海關總稅務司英人赫德（Robert Hart）向英國購進砲艇數艘，六年後再向德國採買了當時縱橫五大洲的最新戰艦兩艘，此後又陸續向英、德添購輕快的巡洋艦五艘，加上一八六六年成立的福州船政局自製的木製戰艦與魚雷快艇（頁 15-27）。作者在敘述北洋建軍的同時，也以慈禧太后與頤和園爲題，細說李鴻章與赫德的權力鬥爭下，使得滿族醇親王奕環成爲「海軍衙門」首任總理大臣，部分海軍經費嗣後在奕環以慈禧「萬壽」、頤和園的「造園」等名義下不知去向。以至於一八八八年之後日本海軍軍備全力向前進展時，中國海軍卻一艦未購，連快砲的採購亦相當勉強，最後並於一八九二年正式因太后萬壽需款爲由，停購船艦兩年。而此時的日本正以侵華爲第一目標，積極擴軍備戰。至大戰前夕，日本海軍已擁有英、德最新型的快速巡洋艦（頁 65-68）。

在分析了戰爭前清廷的顛頂、帝派后黨的傾軋、滿員大臣的貪污中飽以及惡鄰日本的處心積慮、虎視眈眈等等時空因素之後，作者總結甲午戰敗的主因在於：以北洋主力艦之「厚重」對日本聯合艦隊之「輕快」、「五分鐘打一砲和一分鐘打五砲的區別」（頁 66），面對疾駛速射的快艇快砲，敵我優劣，勝負已分。最後自殺殉國的劉步蟾、林泰曾和鄧世昌等將領們，其慘敗實乃非戰之罪（頁 109-111）。甲午戰爭之後的割地賠款震撼了中國，朝野上下有如大夢初醒——原來鴉片戰爭以來數十年船堅砲利的「科技現代化」仍不足恃，政治運作、思想觀念也須要「現代化」（頁 80）。作者因此認爲甲午一戰爲中國傳統社會政治第二次轉型中相當重要的階段（頁 15），戊戌變法便是「歷史三峽」裡的大小舵手及船伕們憑一葉扁舟要設法通過激流險灘的一個場景；而康有爲與梁啓超師徒兩人的「船伕」角色，終究在波翻浪滾中觸礁滅頂（頁 118）。

唐氏將戊戌變法定位在中國社會文化第二次轉型期中的「第二階段」，有別於第一階段對洋務科技的強調，此階段所關注的主題在於政治改革（頁 125）。而推動變法的關鍵人物之一康有爲，作者基本上認爲他雖然博通中國經史，但對於西學的認識其實是很原始、很啓蒙性的。然而康有爲卻以

此幼稚的西學認知，配合自己對傳統學術思想和政治社會制度的瞭解，發展出一套變法思想，刻劃出「以君權行民權」的政治藍圖，成為近代中國第一位受西學衝擊而力圖政治改制的改革家（頁 149-150）。不幸的是，以康有為對西學的認識，既不具備知道的條件，亦不知如何去進行中西文化之間的融匯，而其對於今古文教條的堅持，最終竟構成變法維新的致命傷（頁 168）。一八九八年間康有為一方面上奏議設「制度局」，從事舊法與官制的更動；一方面成立「保國會」，以「保國保種保教」為宗旨，在方法上主張「講求變法、研究外交、謀求經濟實效」。整體的改革論政卻未將當時有實力的東南三督劉坤一、張之洞、李鴻章納入，也未及於一般的開明派；其教條主義和過激作風雖能說服急於改革的光緒皇帝，卻激起保守派和投機派的聯合反擊，不但吏部主事洪嘉與、御史潘慶瀾交章彈劾，頑固派如剛毅、榮祿等更於太后面前力陳保國會「只保中國、不保大清」。於是，以光緒為首的過激派既讓開明而強大的中間派靠邊站，便直接和以慈禧太后為後盾的頑固保守派短兵相接，形成所謂的帝、后兩黨之爭（頁 194-196）。

戊戌變法的開端，亦即百日維新的第一天，光緒皇帝下「定國是詔」與召見康有為。康有為師徒的主張是「小變不如大變」、「緩變不如急變」，並建議在表面上保留一切高官厚祿的名位和王公大臣的職權，同時重用小臣主持實政以推動諸如裁汰冗員、撤銷無職衙門、廢八股、試策論、開學堂、練新軍、裁釐廢漕、滿漢平等、滿族人民自謀生計等改革事宜（頁 224）。作者在此申明康、梁二人自認獨創此種重用小臣、架空大臣的方式，其實早就史有前例。遠自漢、唐的尚書取代九卿，近及明代廢宰相改用內閣學士，清初雍正以軍機處架空內閣大學士，凡此架空政治一再重演。只不過企圖架空的當事者一定要有「最後決定權」，主持變法改制的光緒欲「以兒皇帝的『小臣』去架空老太后的『權臣』，則成敗之數，豈待蓍龜？」（頁 225-227）。最後，唐氏總結戊戌變法的失敗，係中國自鴉片戰爭以後近代化轉型過程中的一個「必然」，而此「必然」往往又為「偶然」所左右，這些「偶然」有時又「必然」成為下一階段發展的「基因」（頁 242）。左右戊戌變法這個歷史「必然」的最主要「偶然」為康有為操切浮躁的「人格」，縱然光緒皇帝勵精圖治、為國為民，但徒善不足以自行，其經驗不

足，又碰上故步自封、為人處事相當偏激的康有為，變法的理想唯有以失敗而告終，不啻第二次社會文化轉型期中「政治現代化」的歷史頓挫（頁243-247）。

本書第四冊主要探討義和團與八國聯軍的起落浮沉。眾所周知的，義和團之暴動（riot）所導致的八國聯軍，幾乎瓜分中國，影響甚鉅。唐氏在分析這場嚴重的事件時指出：如果太平天國代表的是中國社會轉型期中內在的社會宗教運動，是學習西方下的產物，那麼同為宗教運動的義和團之亂，卻是排外運動，所牽涉到的國際外交層面更廣。它是中國社會轉型期「戊戌政變」的後遺症（頁3）。拳變就歷史事實發生的經過本身已無多大的爭議，但在史實的解釋部份所引起的爭論卻是紛紛擾擾、莫衷一是。作者首先即把治這段歷史的基本立場點出：

我們應該承認，作為一個華裔史學工作者，對這件驚天動地而是非難分的歷史事件，要想筆端不帶感情，而據實直書，也幾乎是不可能的。但我們也相信，古今中外，任何驚天動地的歷史大事，都應該有其基本上的公是公非的。戴有色眼鏡、作曲筆之言，都是不對的；其紀錄也是不能傳之後世的。……是其是、非其非，找出它比較接近真理的「公是公非」，作為定論（頁4）。

由此可知作者的史觀，「公是公非」的「公」字當然不無疑義。如果照英國史學家 Keith Jenkins 的說法：歷史是一種權力運作的產物，「是一種移動的、有問題的論述」²，如何能說其「公」即非曲筆，亦非積非以成「公」呢？作者通曉此理，所以才要找出「比較」接近「真理」的「公是公非」。

本冊首以一八九七年十一月發生於山東曹州鉅野的「曹州教案」為始。一般而言，教民與當地民眾所發生的衝突乃至於傳教文化中所具有的排他性，是明清以來中西文化交融變遷史的縮影。而曹州教案時德國兩名傳教士被殺一事，官府在洋人的要求下殺戮華民，加以民教衝突的死傷慘重以及外國勢力的橫行無度，不免引起民情激憤（頁5-10）。因此，當時山東巡撫毓賢所說的「民可用，團應撫，匪必勦」三原則，把起亂的各個民團整合組織成「義和團」，並以此作為「扶清滅洋」的思考主流很快成型（頁

² Keith Jenkins 著，賈士衡譯，《歷史的再思考》（台北：麥田出版公司，1996），頁87-88。

37-39)。如同《太平天國》中的跨時代比較，慈禧太后下的載漪等輩與六十六年後毛澤東所搞的「興無滅資」，恍若歷史重演（頁 51）。唐氏很清楚地剖析了當時的政治形勢與外交生態：內政上在北洋大臣李鴻章等人被排擠而去後，慈禧太后仍繼續將權力緊縮，調董福祥的「甘軍」進城節制，政權乃集中於西太后與一小綽滿清權貴的手中。由於太后長久以來有著畏懼洋人干政的心態，而這時山東地方的拳民在巡撫袁世凱的剿迫下轉向直隸發展，直隸總督裕祿復揣摩上意，遂讓「義和團」蔓延成了「紅衛兵」。只不過對於民間組織力量的掌握，西太后遠遠不及毛主席，終至「大權旁落，一發不可收拾」，衍生出禍國殃民的歷史慘劇（頁 59-69）。

慈禧太后之所以向十一國宣戰，主要是受到羅嘉傑對《北華捷報》（*North-China Daily News*）中一篇社論誤譯的影響，或有心人士特意渲染「外人要求太后歸政」的結果。在李鴻章等外交長才不在京內，對此又未加求證，於是冒然開戰（頁 95-98）。唐氏對此事的析論所呈現的是此一國際事件中各種權力的糾葛，舉凡戰力堅強的武衛軍竟攻不下小小的使館區，而進佔北京、橫行華北的八國聯軍原不過是一堆七拼八湊的紙老虎！北京長老會牧師佔領王府謀財，以至美國作家馬克吐溫（Mark Twain, 1835-1910）仗義執言；此外如美國的門戶開放政策（Open Door Policy）實乃美國擴張主義遭英國玩弄的結果，源起於列強瓜分威脅的拳亂則以拳亂的告終促使瓜分威脅的結束等等。歷史在唐氏的生花妙筆中變得非常的弔詭，卻都又有了合理的解釋。那麼這百年間的動盪又是為何？他認為「我國近百餘年的動亂，是一種歷史上社會『轉型』的現象。文化不論中西，都是要從落後的『中古型態』轉入『現代型態』」（頁 32）。而義和團與八國聯軍的影響，也正推動了傳統社會型態的根本轉變。

在本書最後一冊中，唐氏透過新舊史料的解讀和其對於傳統觀點的商榷，重新評價袁世凱、孫文的歷史功過，並且從社會政治轉型期的角度提出辛亥革命的再詮釋。就袁世凱的歷史地位而論，其一生的事業適與甲午戰爭前後近代中國的變局息息相關。從朝鮮監國時期抗拒日俄等國窺伺的作為、甲午戰後小站練兵以至進入清帝國統治核心、戊戌政變背棄維新派的行徑、鎮壓山東義和團不意引發八國聯軍到領導庚子後的變法改制，在這一連串重大事件中的袁世凱一再展現「治世能臣、亂世奸雄」般的本領

(頁 77)，也因此不斷遭受後世毀譽交加的評判；然而，不論正面性的肯定或是負面性的批斥，皆足以反映他在晚清社會政治轉型期中佔有舉足輕重的有力位置。唐氏在此相當推崇袁世凱不世出的軍政才能，他認為如果我們「把清末民初所有的高層風雲人物」依其將相之「才」加以排列，那麼「諸公幾乎無出其右者」(頁 115)。至於在辛亥革命之後所形成「非袁不可」的政治局勢中，唐氏根據共和政體的「法統」(legitimacy)論點，陳述袁世凱作為中華民國第一任正式大總統的合法性，而這項合法性卻是在他之後歷任的國家元首所難以媲美的(頁 10-11)。袁世凱遺臭青史的主要關鍵，便是他回頭想當皇帝、違背民主共和的一念之差。相較於袁世凱的侷限與失敗，孫文的睿智和偉大正在於他領導了「辛亥革命」及「聯俄容共」這兩個中國現代化運動的重要階段(頁 129)。

辛亥革命首要之一孫文的「驅除韃虜、建立民國」的口號，在庚子拳亂、「日俄戰爭」前後紛至沓來的內憂外患之中，逐漸形成「全國人民的共同意志」(頁 204)，同盟會於焉成為眾星所拱的革命團體。驅除韃虜、建立民國這兩項任務最後經由辛亥革命而完成，直接促成中國朝向「政治現代化」的轉型。在唐氏別開生面的三峽史觀中，「廣義的『辛亥革命』(1890-1912)，是我國歷史上從君主到民主這個轉型期的『開始』。狹義的『辛亥革命』(1911年10月10日至1912年1月1日)，則是這個『開始的結束』(The End of a Beginning)」(頁 246-247)。作者就在這段透視民國肇建之歷史意義的文字中，結束了全書疏通知遠、發微闡幽的論述。

唐氏浸淫美國國務院等中國涉外檔案多年，充分在本書展露其吸收這些資料後所含攝人的媚力。綜覽全書可以體會他博古通今的才學配合上別出心裁的史識，對於晚清七十年間的重大事件，以深入淺出的方式娓娓道來，有別於傳統上一般學者對於史事論述的嚴肅與拘謹，尤其對夾雜其間人物之刻劃剖析與條陳縷述，更如小說般的高潮迭起，令人耳目一新，讀之不忍釋卷。全書在「古今多少事，盡付笑談中」的詼諧氣氛中，也刻意突顯出懲惡勸善的殷鑑作用，如其敘說孫文從晚清後期奔走革命、救國救民的過程到民國初期「不擇手段的獨裁專制，甚至喪權辱國亦在所不惜」的轉折(冊 5，頁 146)，陳述毛、蔣之流假民主憲政、人民共和之名而行寡頭政治、帝王獨裁之實的手段，鞭辟入裡且發人深省。唐氏亦莊亦諧、

婉而成章的筆調和其縱橫於古今中外的歷史詮釋，也正體現如曾鞏〈南齊書序〉所謂「其明必足以周萬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適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難知之意，其文必足以發難顯之情」的良史標準。

本書的整體學術貢獻是有目共睹的，然而基於讀者求全責備的立場，在此試以提出幾點淺見就教於學界先進。首先就內容的編排而言，由於本書各篇章大多陸續分期發表在《傳記文學》以及《海外論壇》、《史學彙刊》、《中外雜誌》等刊物或其他學術研討會論文中，爾後統編與篩選成冊的作業過程或許略乏刪削潤飾、整齊體例的考慮。因此，讀者若是一氣呵成地讀完全書，將會感受其中某些部分論述有前後重複、似曾相識的情形。在技巧上，以唐氏的才學，這是不難改進的細節。

其次針對書中史實或專業知識上的些許瑕疵，例如甲午海戰所出現的船艦，「每艦有二十二磅(火藥)退管砲二至五門。……『艾模塞隆』(Epsilon)型新艦的最大特點是雙向航行」(冊3，頁24)。文中所謂「二十二磅」等重量之敘述，源自帆駛戰艦的時代，英國對小口徑砲的通稱，指的是彈頭重量而非火藥重量。若以美制5"x38倍彈頭重52磅計算，二十二磅砲的口徑約為2"上下；而「退管砲」可能為「後膛砲」之誤，或指裝有復退裝置的後膛砲，此種戰艦的砲配備應為五門。故此段或為「每艦有二十二磅口徑的後膛砲五門」。又Epsilon型艦的裝備可以倒車，以利於操縱與靠泊，並非可以「雙向航行」，如同汽車可以倒車，但無法「雙向航行」。同樣的，定遠、鎮遠兩艦所用的複式螺推進機(Twin Screw)乃指船尾裝置兩具便於操縱及增加動力的螺旋槳，可倒車後退，亦非雙向航行。

至於清軍落敗後，「堂堂主力艦，最後為敵方所擄，竟被拖回三島，充當海邊碼頭上的商用躉船」的說法(冊3，頁6)，恐與事實有所出入。躉船通指停泊於碼頭用以囤積貨物、不能開航的船。此處所提到的「主力艦」鎮遠艦，如依日本海軍史方面的記載，這艘戰艦在一八九五年二月十七日遭擄獲，一八九八年三月日本海軍將其定為二等戰艦，納入常備艦隊編制，至一九〇五年十二月復改歸一等海防艦。其間參加過日俄戰爭(1904-1905)，屬於日本聯合艦隊中的第三艦隊第五戰隊。³故用於躉船一

³ 片桐大自著，陳寶蓮等譯，《聯合艦隊軍艦大全》(台北：麥田出版公司，1997)，頁198-200；

事，也應是該艦除役後的事。而一般除役的軍艦，依世界各國的通例，常當作廢鐵處理，還能充當躉船，也算是「身後哀榮」了。

另外有關史實的解釋方面，一般說來，史學研究者自覺或不自覺地受到既有學養、時代意識與政治立場差異的影響，而對歷史人物做出符合個別理想標準的詮釋；但是人物優、缺點與長、短處的價值判斷，往往是一體兩面的。唐氏對戊戌政變的看法以及對康有為、光緒皇帝的分析，如果從另一個角度加以考察，其結論可能有所分歧。試若康有為缺乏那些「驕傲不群、木訥乖僻；又頑固急躁」的特質，或者光緒皇帝不是那麼「愛國愛民、犧牲小我」，乃至於二人皆具「略通古今之變、粗識中西之長」之學養，也就不會有「戊戌變法」的產生了；若仍有「戊戌變法」的話，也就沒有「那變不了法的一百天」了。這樣看來，「偶然」也是「必然」，康有為的「人格」是戊戌變法的催化劑，而「百日維新」也可能就是今日大中國的「基因」。換句話說，沒有康有為，沒有光緒皇帝，就不會有戊戌變法；大清帝國何時壽終，或中國竟被長久瓜分、至今仍為各列強的次殖民地，或者各色旗幟飄揚，中土又回復兩千五百年前的春秋戰國時代，凡此皆難以預料。雖然，「後事還須問後人」，但於此去古不遠的「前事」，唐氏所謂「把康有為換成康無為，則『戊戌變法』這段歷史失敗的過程，和它對下一階段所發生的基因作用，可能就完全不同了」的評斷（冊3，頁243），是值得商榷的。我們可以這麼說：康有為一旦成了「康無為」，「戊戌變法」就不再是「戊戌變法」了。

本書容有前述一些有待斟酌的問題，但瑕不掩瑜，從近代中國史研究趨勢的角度，唐氏這部「詳人之所略，異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輕，而忽人之所謹」以成一家之言的主題式作品，可說是在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費正清(J. K. Fairbank)等《劍橋中國史·晚清篇(1800-1911)》以及 Immanuel C. Y. Hsu(徐中約)所著 *The Rise of Modern China* 等通論性的近代史著作之外，提供我們另一種體察中國近代變局的思考面向。尤其是「社會文化轉型」的分析架構與「歷史三峽」的精闢見解，如果參照美國學者 Paul A.

許桐生編譯，《日本海軍史》（海軍學術月刊社，民國78年），第2卷，頁167及第3卷，頁93。

Cohen 在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 中，對於美國學界以哈佛學派為主所秉持「傳統中國的近代化仰賴於西力衝擊」之理論模式的重新審度、轉入以中國社會的內部因素為研究重心的學術取向⁴，也將有助於我們獲取更多元寬廣的歷史視野。

時值國共分裂、海峽兩岸分治五十年之際，兩岸會談推遲延宕，莫說政策性議題晦澀曖昧，連事務性的討論也因層出不窮的枝節之爭而趑趄不前。身為「晚清七十年」的後世子孫，撫今追昔，唐氏此時此書，更具有古為今用的時代意義。歷史研究的生命往往來自其與現實社會、時代脈動的聲息相通，他山之石，可以攻錯；察古識今，亦得以鑑往知來，就讓我們透過這部雅俗共賞、寓意良深的近代中國史作品，徜徉於晚清七十年中國社會文化轉型的歷史巨流中，共同為二十一世紀中國的未來發展趨向尋求答案。

⁴ 見 Paul A. Cohen,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 9-96。



新書評介

《晚清經濟政策與改革措施》。朱英著。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年。

趙建國*

晚清的經濟政策與改革措施，是一個既有學術價值，又具有現實意義的研究課題。遺憾的是學術界對此重視不夠，在該領域的探索缺乏系統分析和應有的力度。朱英教授的力作《晚清經濟政策與改革措施》（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正好彌補了這一缺憾。作者在十餘年堅實研究的基礎上，對這一課題作了相當深入的探求，不僅在宏觀方面勾勒出甲午戰後清政府經濟政策的變化和影響，而且在諸如財政、金融、農業、貿易、礦物、鐵路等微觀方面對清政府政策的變化以及採用的一系列新的措施作了具體的闡述，提出了許多令人信服的獨特見解。爲了加強對晚清社會更爲全面的了解，作者對晚清地方自治也作了較細緻的剖析。本文主要對該書有關地方自治的內容即第十章〈晚清的地方自治政策〉進行分析、討論，進而探討該書的特色，並給予應有的評價。

通覽全書，精讀〈晚清的地方自治政策〉一章，我認爲朱英教授著《晚清經濟政策與改革措施》有以下特色：

一、研究視角的轉換與更新

地方自治是西歐資產階級革命初期，爲反對封建專制，要求參與政權而提出來的一種地方政治設制。它有利於防止獨裁與暴政的出現，是民主政治的表現之一。伴隨著西學東漸的影響，地方自治思潮在十九世紀四、五十年代開始傳入中國，受到地主階級經世派、早期維新派的關注，並在晚清乃至民國初期都產生過相當廣泛的影響，故而地方自治問題是研究中

* 華中師大歷史研究所

國近代政治史、思想史、社會史的一個不容忽視的課題。近年來國內學界對清末地方自治問題日見重視，作了一些研究，並取得了一定的成績：鄭永福《一九〇五年以前中國的地方自治思潮》，從近代思想啓蒙方面分析了地方自治思潮在中國傳播、興起的過程，並分析了資產階級革命派與立憲派關於地方自治主張的異同。吳桂龍《清末上海地方自治運動述論》，指出上海自治運動是甲午戰後中國資產階級要求學習西方政治制度的產物，由於上海資產階級力量雄厚，政治意識較強，故能將自治付諸實踐，上海自治運動是一場資產階級參與政權的民主運動和愛國運動。余子明《清末地方自治與城市近代化》，認為地方自治促進了城鎮工商業的繁榮和市政建設的發展，改變了城鎮統治模式，使現代市制得以萌芽。由曉璠、馬嵐合寫的《清末東三省地方自治運動述評》，對東北三省的地方自治進行區域性研究，認為東三省愛國救亡的自治活動打擊了帝國主義侵略，傳播了資產階級民主思想，促進了紳士階層的轉化，引起了社會結構深層變動，為辛亥革命準備了條件。馬敏在《官商之間—社會劇變中的近代紳商》一書中分析了城市自治中商人的作用和一系列的影響。馬小泉《地方自治：晚清新式紳商的公民意識與政治參與》和《清末地方自治論綱》分別從紳商與早期地方政治現代化的角度探討了晚清地方自治。

綜觀以往的研究，其視角多侷限於立憲派、革命派以及資產階級的角度，或採用個案分析、區域分析的方法，或從某一側面如紳商、大眾的政治參與，早期現代化對清末地方自治加以解讀，但對於地方自治有力的倡導者，實際的推動者和執行者—晚清政府卻重視不夠，要麼是未曾涉及，要麼是涉足尚淺。在前此研究的基礎之上，朱英教授以史家特有的睿智眼光，另闢蹊徑，從晚清政府的角度重新解讀晚清地方自治，並將地方自治置於晚清政策調整，實施新政的整體歷史背景下加以考察。實現了研究視角的轉換與突破，進而開闊了人們的視野，增加了對地方自治更深層的理解。這一新視角的切入印證了作者對晚清地方自治的基本觀點。實際上，地方自治在清末的最後幾年已成為清政府的一項重要國策，而且地方自治普遍推行於全國各地，也是在清政府由上而下的倡導之後。所以，研究地方自治不能只是注重立憲派、改革派，而置清政府於不顧。通過研究視角的轉換，還使我們認識到：(1)地方自治的興盛與清政府有著密切關係。首

開其端對地方自治付諸實踐的是商人，清政府並不是近代中國地方自治的發起者，但在 1909 年《城鎮鄉地方自治章程》頒佈以前，地方自治僅限於上海、天津等幾個大城市。只有當清政府為維護自身統治，決定以行政手段大力推行自治之時，地方自治真正才走向興盛。(2)地方自治的推行，表明清政府的內部發生了值得重視的變化。一部分官僚甚至是最高統治者都已明顯意識到傳統的專制極權無力適應時代的要求，實行自治，以革除中國積重難返的弊端已成必然；為推行地方自治，清政府將部分權力下移民間，並允許各種帶有自治傾向的社團有一定程度的自主發展，使其專制極權空前削弱，開始具備某些近代政權色彩。(3)清政府出面倡導，使地方自治在許多方面產生了令人矚目的影響。如增強了資產階級的社會影響；促進了工商業的發展，推動了許多城市的市政建設。

二、對傳統觀念的突破

研究視角的轉換體現了作者對歷史的尊重，力求客觀、公正地再現歷史的真象，這樣勢必引起對傳統觀點的衝擊。傳統觀點認為清政府實行地方自治主要是為了抵制革命，籠絡資產階級上層，因而完全是一場騙局，對地方自治運動中清政府的作用給予完全否定。

朱英教授在掌握大量第一手資料的基礎上進行了紮實的研究工作，發現傳統的解釋與史實不無出入，帶有明顯的偏向性，存在著簡單化、片面化的傾向，只是強調了晚清政府衰朽反動的一面，忽視其在政策上的新變化以及這些變化所帶來的影響，為此作者主張進行全面的考察，給清政府以實事求是的評價，反對借用革命黨人的話語將清政府罵得一無是處，認為：「無可否認，近代中國社會在許多領域中明顯出現從傳統向近代的過度轉化，實際上始於 19 世紀末 20 世紀初，而這種轉化與清政府實施的新政策與改革措施有著密切的聯繫。」基於這樣的認識，作者將清政府推行地方自治的動機與立憲派、革命派作了如實的比照，發現清政府推行地方自治的著眼點在很多方面與立憲派、改革派存在相通之處，如「學習西方國家的社會制度，施行地方自治以致強救亡」，「推行地方自治制，奠創立憲基礎」，「通過實施地方自治，使官民上下相通，補官治之不足」。

由此可見，清政府推行地方自治目的與當時的社會輿論大體相同，並非完全是一場騙局。通過對清末地方自治具體內容的考察，作者認為地方自治是晚清政府的一項國策，絕非權宜之計或緩兵之計。至於晚清地方自治政策的影響，作者認為它不僅使「資產階級借地方自治取得了過去所沒有的一系列權利，社會影響隨之更為突出」，而且「對於改變許多城市的落後面貌，促進工商業發展，也有一定的積極影響，確定起到了彌補官治不足的作用」，並「反映其（清政府）專制政權開始出現了前所未有的變化。」從而對傳統的解釋模式形成全面的挑戰，更為重要的是對傳統解釋的突破是建立在詳盡的考證基礎之上，其結論不得不令人信服，而敢於突破成見的勇氣，更令人嘆服。

三、注重實證研究

目前史學界存在一種較明顯的傾向，即借用西方理論模式與概念來套用中國歷史，往往從理論到理論，從模式到模式，缺乏堅實的研究基礎，借用眾多的社會學、人類學、政治學的專業術語來掩飾其內容的空乏，使原本活生生的歷史成為術語與華麗辭藻的堆砌。傳統史學所注重的言之有據、言之有物倍受冷落，朱英教授在考察晚清地方自治政策之時，並沒有提出所謂的理論框架，沒有嘩眾取寵的模式。在其平實的語言、嚴密的邏輯推理和大量認真細緻的考證之中，我們能體會到其思想的亮點，如在分析晚清地方自治積極影響的最突出表現之時，作者便以自己接觸頗多的上海、蘇州商會檔材料為例加以佐證，在剖析清朝統治者推行地方自治政策動機之時，也以大量史實為依據，避免空發議論。在反對對清政府全盤否定的同時，作者沒有對其地方自治政策給予過高的頌揚，而是在考證基礎上，給予恰如其分的評價，體現了歷史學家追求真理的應有良知。

四、體例的獨特

大多數的學術專著往往有相當嚴密而又完整的體系，對所涉及的問題

往往面面俱到，朱英教授一反傳統的著書慣例，整本書採用專題研究的方式。在對晚清地方自治的研究中也不例外，作者並沒有對有關地方自治的眾多問題一一涉足，只是選擇了一個較新的視角—晚清政府，集中筆墨專注於對晚清政府推行地方自治的動機、地方自治的內容及影響的探討，避免了大、全、泛而力度不夠的弊病，使讀者從晚清政府這一角度加深了對地方自治的理解。作者把地方自治政策看作是晚清的一項國策，也使本章與整本書融為一個整體，專題研究的弊端作者在前言中有所提及，但專題研究雖使整本書看起來零散，實則仍有其貫穿全書的主線，亦可使研究更深入、更詳細，我認為體例獨特使本書自為經緯、成一家言的風格表露無遺。

章開沅先生在為朱英教授另一力作《轉型時期的社會與國家》作序時曾說過：「歷史是已經畫上句號的過去，史學則是永無止境的遠航」，朱英教授著《晚清經濟政策與改革措施》，確如又一次遠航，在其無涯的學海中增添了一張乘風破浪的帆。

本通訊歡迎世界各地學者，撰文介紹各該地區近代中國史研究情形、出版狀況、會議消息，及傑出學人之貢獻，以廣學術交流。



大事紀要

近代中國史研究大事紀要 (1999.10-2000.3)

蕭郁雯* 輯

10.01 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座談會，由山東大學哲學系顏炳罡教授主講：〈近代以來儒耶之衝突及化解之道〉。

10.08 中研院「明清一九九九第七次聚會」，由南加大歷史系費俠莉教授(Charlotte Furth)主講：〈Language, Gender, and the Body in Ming Dynasty Medicine〉。

10.12 中研院東南亞區域研究計畫八十九年度午餐研討會，由雪梨科技大學國際研究學院博士候選人馬騰(Mr. Martin Williams)主講：〈原住民與二二八事件：參與與後果〉。

10.14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學術討論會，由研究員朱宏源先生主講：〈從行國、行省、到精省：一個政治制度的觀察〉。

10.18 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學術講論會，由研究員王汎森先生主講：〈汪悔翁與《乙炳日記》— 兼論清季歷史的潛流〉。

10.27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海外華人研究群學術演講座談會，由Rutgers大學副教授陳國霖先生主講：〈人蛇集團與大陸偷渡客〉。

10.28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學術討論會，由研究員謝國興先生主講：〈終戰前後的台灣士紳：以台南辛氏家族為例〉。

11.04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婦女與性別史研究群演講，由日本大妻女子大學專任講師、日本宋慶齡基金會常任理事石川照子女士主講：〈日本學界有關中國婦女史的研究現狀〉。

11.04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學術討論會，由日本宋慶齡基金會事務局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約聘助理

局長久保田博子先生主講：〈宋慶齡の政治思想の原點について〉。

11.04 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生命醫療史研究室演講，由東京順天堂大學醫史系酒井靜教授主講：〈解體新書的翻譯與出版〉。

11.06 聯合報系文化基金會主辦(跨世紀的文化反省與展望論壇之六)「近百年來中國的歷史學發展軌跡」，假台灣大學思亮館國際會議廳，由中研院院士許倬雲教授、中研院近史所兼任研究員李國祁教授主講。議題大綱：〈1949年以前的中國：民族史觀、唯物史觀、考證學與實證史學、新出的史料；1949年以後的台灣：社會科學與史學、檔案史料研究、台灣史研究；1949年以後的大陸：官定課題、新出史料、最近解脫束縛的可能性〉。

11.08 中研院東北亞區域研究學術演講，由文化大學日本研究所所長徐興慶教授主講：〈我國的日本研究現況及其未來展望〉。

11.18 中研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學術討論會，由研究員張彬村先生主講：〈Chinese Migration to Taiwan in the Mid-Qing: A Paradox〉。

11.19 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主辦「第二屆國際暨第六屆全國清代學術研討會」，共發表論文 48 篇(至 21 日止)。

11.19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午餐會，由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邢義田先生主講：〈圖像與真實：歷史研究的另類途徑〉。

11.20 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近代中外關係研讀會，由中興大學歷史系教授唐啓華先生主講：〈歐戰後德國對華戰事賠償問題研究〉，北京，中國社科院美國研究所研究員牛軍先生主講：〈1950-1954年中共對外關係〉。

11.22 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學術討論會，由助研究員劉斐玟女士主講：〈What can Female(Oral) Literature Offer? Nushu, Nuge and Peasant Women's Conception of Widowhood in Southern China〉。

11.23 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主辦，由哈佛大學美術與建築史系名譽退休教授羅森福(John Rosenfield)先生主講：〈A New Art Form of the Modern Age: Buddhist Paintings and Statues〉，〈The Indian Origins of Paradise Imagery, Especially that of Maitreya〉，〈Portraits of the Kushan Emperors of India and the Imagery of Buddhist Kingship〉，〈Sung Influences in the Renaissance of Japanese Buddhist Art in the Thirteenth Century〉，〈Nihonga and the Scorching Drought of Modern Vulgarity〉(至 26 日)。

11.23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婦女與性別史研究群演講，由南加大歷史

系教授 Charlotte Furth 主講：〈Doing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the Body〉。

11.23 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研討會，由研究員兼主任劉翠溶教授主講：〈試論日治後期台灣農業倉庫的設立及其作用〉。

11.25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學術討論會，由助理研究員張秋雯小姐主講：〈趙爾豐與鄉城之役〉。

11.26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午餐會，由蘇格蘭愛丁堡大學東亞研究系主任杜博妮 (Bonnie S McDougall) 教授主講：〈Modern Chinese Letters〉。

11.27 中華民國韓國研究學會與國立政治大學東語系，假政治大學共同主辦「第十屆中韓文化關係」國際學術會議，共發表論文 20 篇。

12.04 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兩性與社會研究室主辦「亞洲婦女研究課程國際研討會」，發表論文：Chang Pilwha, Lee Jae Kyung：〈Towards a Common Understanding of Conceptual Frameworks of Women's Studies Curriculum〉；Elizabeth Kennedy：〈Rethinking Women's Studies as an Interdisciplinary Field〉；Kuniko Funabashi：〈Women's Studies in Japan〉；鄭新蓉：〈我國師範院校學生性別意識現狀與對策分析〉；張珣：〈困境與突圍：從台大婦女研究室談婦研機構的建制化〉；謝臥龍：〈這是一個開始：性別教育研究所課程規劃之理念〉；林淑蓉、傅大為、謝小芬：〈性別知識與女性主義教學：清華大學性別研究的課程與教學〉；陳惠馨：〈台灣的另類性別課程：從女性學學會的活動內容談起〉；丁乃非：〈位移與游動：女性主義教室裡的貓狗和蒼蠅〉。

12.04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學系和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主辦「台灣合作運動史學術研討會」，假逢甲大學商學大樓舉辦，共發表論文 9 篇。

12.09 中國近代史學會假南港中央研究院學術活動中心，舉辦「一九四九年：中國的關鍵年代」學術討論會（至 10 日），共發表論文 25 篇（參閱本期張世瑛會議報導）。

12.14 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研討會，由副研究員周婉窈女士主講：〈明清文獻中「台灣非明版圖」例證〉。

12.16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學術討論會，由南加大歷史系教授 Charlotte Furth 主講：〈Producing Medical Knowledge Through Case Histories(醫案): History, Narrative, Evidence〉。

12.16 國史館假國家圖書館舉辦「國史上中央與地方的關係－中華民國史專題第五屆討論會」（至 18 日），共宣讀論文 54 篇。

12.17 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學術演講，由台灣大學社會系副教授汪宏倫先生主講：〈全球化浪潮下的國族問題：從制度論觀點對台灣的個案分析〉。

12.18 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文化思想史研究室討論會，由加州柏克萊大學歷史系博士班學生馬禮彬(Mark McNicholas)先生主講：〈清中葉「詐偽」案件初探〉(A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of Mid-Qing "Fraud and Counterfeiting" Cases)。

12.20 由聯合報系文化基金會、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主辦，北大歷史系歐陽哲生教授主講：〈在傳統與現代之間—以五四新文化運動與儒學關係為中心〉。

12.25 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近代中外關係研讀會，由上海復旦大學歷史系金光耀教授主講：〈顧維鈞與民國外交〉，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研究生陳群元主講：〈廣田弘毅對華政策思考〉。

12.30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學術討論會，由助研究員李達嘉先生主講：〈一九二〇年代初期上海商人的民治運動：對軍閥時期商人政治力量的重新評估〉。

01.06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召開「二十世紀的中國與世界」國際學術研討會(至8日)(參閱本期張寧會議報導)。

01.08 由台灣社會研究季刊、文化研究學會、清華大學亞太文化研究室主辦「亞際文化研究系列(II)」，假台北市金華街110號清大月涵樓，由杜克大學歷史系教授 Arif Dirlik 主講：〈Culture against History? The Politics of East Asian Identity〉。

01.10 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學術討論會，由副研究員余安邦先生主講：〈傳統台灣和人的成就觀與生命追求—文化心理學的觀點〉。

01.10 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禮俗宗教研究室演講，由東吳大學物理系教授陳國鎮先生、史語所研究員宋光宇先生主講：〈經絡、信息與宗教—穴道電檢儀的理論及其應用〉。

01.11 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研討會，由御茶の水女子大學人間文化研究科博士班宮崎聖子小姐主講：〈日治時期台灣的「青年」論述與「青年團」(1920-1930)初探〉。

01.11 國父紀念館主辦「第三屆孫中山與現代中國」學術研討會(至13日)，共發表論文30篇。

01.12 中研院東北亞區域研究計畫與近代史研究所政治外交史組主辦，由紐約大學政治經濟系教授 David Dennon 主講：〈Strategic Competition between China, Japan and Taiwan〉，〈Economic Recovery in East Asia, especially Focus on Thailand, Indonesia and South Korea〉。

01.13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學術討論會，由副研究員陳儀深先生主講：〈自由民族主義之一例：論《獨立評論》對中日關係的處理〉。

01.14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婦女與性別研究群演講，由紐約州立大學助理教授牛瓊瑜博士主講：〈Representing Asian American and Asian-Pacific Women in Film, Video, and Television〉。

01.14 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文化思想研究室討論會，由哈佛大學博士候選人宋家復先生主講：〈歷史與理論：介紹的介紹〉。

01.15 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近代中外關係研讀會，由北大歷史系茅海建教授主講：〈晚清的外使駐京問題探討〉。

01.20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戰爭與社會研究群學術演講，由北大歷史系茅海建教授主講：〈五十年來中國近代軍事史研究評述〉。

01.20 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台灣考古研究室專題演講，由研究員臧振華先生主講：〈台灣考古遺址保存工作的問題—從英國的例子談起〉。

01.20 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生命醫療史研究室討論會，由台史所籌備處研究助理劉士永先生主講：〈當前的醫學史研究與個人之研究計畫〉。

01.25 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研討會，由澳洲國立大學亞太研究學院博士候選人戴杰銘(Jeremy Taylor)先生主講：〈從工商大都到「東方明珠」：清末高雄歷史呈現之初探〉。

01.26 中研院東南亞區域研究計畫研討會，由越南駐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副主任周功逢先生主講：〈台越政經關係的發展〉。

01.26 香港珠海大學亞洲研究中心主辦「五十年來的香港、中國與亞洲」學術研討會（至 27 日）。

01.27 中研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歷史與思想組學術研討會，由研究員張炎憲先生主講：〈台灣共和國事件〉。

02.01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學術討論會，由加州柏克萊大學中國研究中心主任葉文心教授主講：〈現代性與近代中國〉。

02.14 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學術討論會，由東海大學社會系助理教授趙彥寧女士主講：〈戴著草帽到處旅行：試論 40、50 年代流亡、女性主體

與記憶建構的關係)。

02.17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學術討論會，由助理研究員洪秋芬小姐主講：〈從「水竹居主人日記」看日治前期保甲之實施〉。

02.24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海外華人研究群學術演講座談會，由美國阿肯色大學蔡石山教授主講：〈Policy Impacts from the Two Regimes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on the Chinese Americans: A Developmental Point of View〉。

03.03 中研院東南亞區域研究計畫「東南亞與香港專題講演系列(五)」，由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系教授呂大樂先生主講：〈香港回歸後的流行文化〉。

03.03 美國日本侵華研究學會假舊金山舉辦「第六屆中日關係國際學術研討會」(至5日)，共發表論文80篇(參閱本期李恩涵會議報導)。

03.04 中研院東南亞區域研究計畫、中研院近史所海外華人研究群等合辦「宗教與全球華人系列座談」，由中原大學人文與教育學院教授兼院長林治平先生主講：〈台灣基督教與金三角地區的華人〉。

03.06 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座談會，由輔仁大學比較文學研究所所長劉紀蕙教授主講：〈三十年代中國文化論述中的法西斯妄想以及壓抑：從幾個文本徵狀談起〉。

03.09 中研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學術討論會，由助研究員周玉慧小姐主講：〈災變與社會支持：以九二一集集震災為例〉。

03.09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學術討論會，由琉球大學教授赤嶺守先生主講：〈琉中關係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

03.10 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生命醫療史研究室討論會，由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助理教授雷祥麟先生主講：〈國醫運動的誕生〉。

03.14 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學術討論會，由助研究員蕭阿勤先生主講：〈民族主義與台灣1970年代的「鄉土文學」：一個文化(集體)記憶變遷的探討〉。

03.16 中研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歷史與思想組學術研討會，由院士曹永和先生主講：〈十七、十八世紀海外華人慘案初探〉。

03.16 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演講，由京都大學地域生活空間計畫學教授布野修司先生主講：〈殖民都市支建設者—計畫理念支移植者們(The Builders of Colonial Cities...Planters of Western Urban Planning)〉。

03.16 由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新史學》雜誌社主辦之新史學講座，由美國哈佛大學東亞語言文明系主任包弼德教授主講：〈中國歷史或歷史？〉。

03.20 由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新史學》雜誌社主辦之新史學講座，由美國哈佛大學東亞語言文明系主任包弼德教授主講：〈智識型態、國家與文人〉。

03.21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文化思想組「近代中國的視覺表述與文化構圖，1600 迄今」系列演講，由輔仁大學比較文學研究所劉紀蕙教授主講：〈視覺圖像的徵狀式閱讀：兼談三十年代中國文化論述中的法西斯妄想以及壓抑〉。

03.22 由法國遠東學院台北中心、法國現代中國研究中心台北分部主辦，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協辦「法國研究學者來台訪問暨學術演講系列」，由國立東方語言學院名譽教授、法國高等社會科學院院士 Marie-Claire Bergere 主講：〈Sun Yat-sen as a communicator and a cross-cultural navigator〉（形象與真實之間：法國歷史學家對孫中山先生的評價）。

03.23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學術討論會，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楊奎松先生主講：〈毛澤東與印度支那戰爭〉。

03.23 曹永和文教基金會主辦，台灣大學歷史系協辦，由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教授濱下武志先生主講：〈從海洋與陸地看亞洲〉。

03.23 中研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學術研討會，由復旦大學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兼所長葛劍雄先生主講：〈移民與中國歷史〉。

03.25 由中華民國世界和平教授學會主辦，假台灣大學視聽教育館舉行的「國際問題研討會」，由淡江大學國際研究院院長李本京，文化大學美國研究所所長陳毓鈞，台灣大學政治系教授葛永光，政治大學外交系教授周煦，政治大學外交系教授趙國材，中研院歐美研究所研究員裘兆琳主講〈華府、台北與北京三角關係：新政府之新挑戰新契機〉。

03.25 由台灣法律史學會、台灣法學會主辦之「日治時期台灣立法權運作實況」座談會，由台灣大學歷史學系吳密察教授主持，台灣大學法律學系王泰升教授引言：〈日治時期台灣法權運作實況－以日本國立公文書館檔案為中心〉。

03.27 由中研院東北亞區域研究主辦之「琉球認同與歸屬的論爭」國

際學術研討會，由西里喜行、黃智慧、張啓雄、上里賢一、赤嶺守、比屋根照夫、David Wolff、仲地博等主講。

03.30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學術討論會，由復旦大學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所所長葛劍雄教授主講：〈面對新世紀的中國歷史地理學〉。

《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稿約

- (1)本通訊蒐集近代中國史研究之各項資料，俾供研究參考，園地公開，歡迎各界惠賜未出版之稿件，中、英文不拘。
- (2)本通訊為半年刊，每年三、九月各出刊一期，一、七月底截稿。
- (3)來稿除特約者外，以不超過五千字為宜，請以 Word 文書處理軟體打字後，併同 3.5 吋磁碟片送交本所通訊編輯委員會。
- (4)來稿請署真實姓名、服務機關及職稱、詳細地址和聯絡電話。
- (5)本通訊編輯委員會對於來稿文字有酌改之權。
- (6)採用之稿件，致贈作者當期通訊五份。
- (7)來稿請寄台北市南港 11529 中央研究院 76 近代史研究所《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收。



中研院近史所呂芳上所長（左）頒紀念牌給該所陶英惠研究員（右）

以研究中國外交史起家，治日軍在華暴行著稱，著作等身的李恩涵教授



一生致力於中國近現代史的教學和研究，尤以抗日根據地史的造詣聞名中外的魏宏運教授

本期要目

- 「二十世紀的中國與世界」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報導
- 「一九四九年：中國的關鍵年代學術討論會」會議紀要
- 「第六屆中日關係」國際學術研討會
- 退休茶話：把酒話桑麻
- 學人簡介——李恩涵、魏宏運
- 琉中關係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
- 「南開大學周恩來研究中心」簡介
- 「蔣介石先生與日本」研究計畫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進行之專案研究計畫
- 平津「取經」行紀聞
- 史料介紹一種
- 新書評介五本

